

清华校友通讯

二零二零
冬季号
复八十四期

84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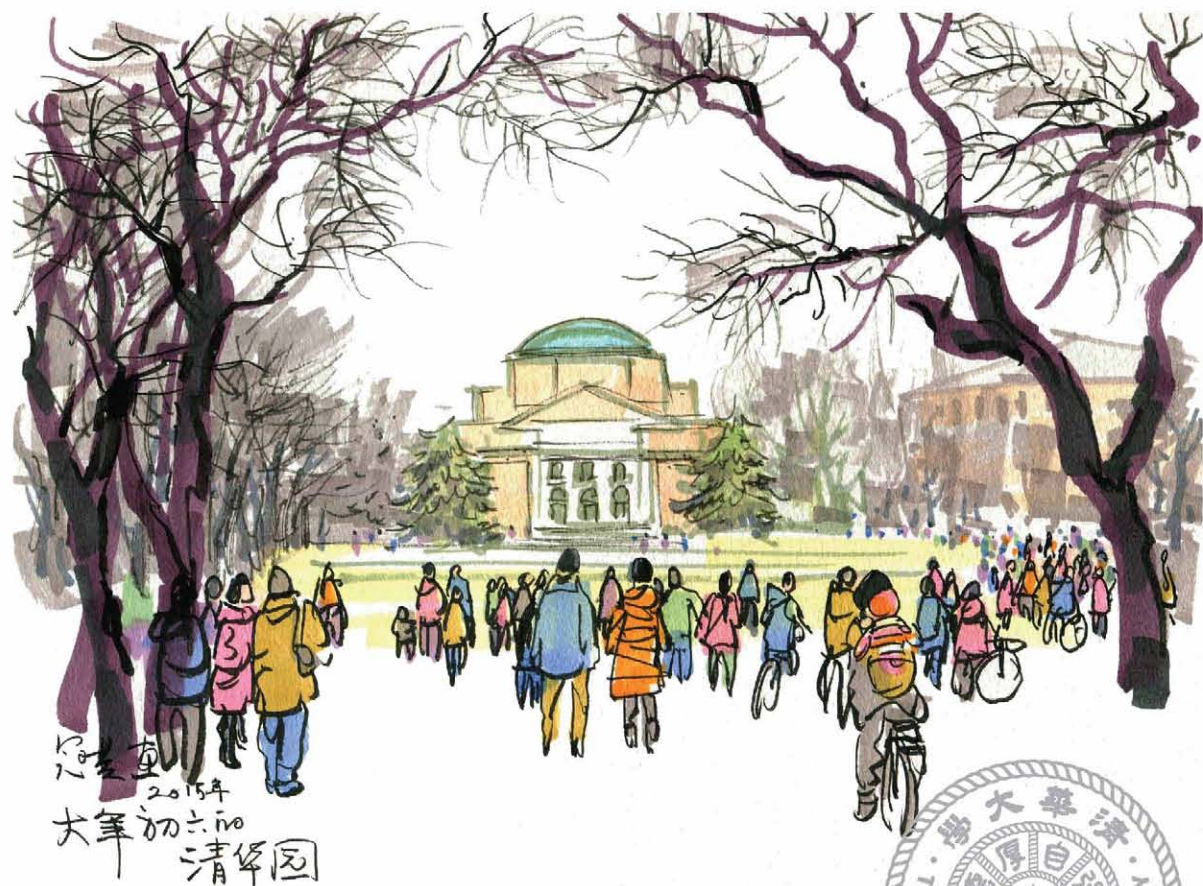
84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二零二零
冬季号

清华校友总会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9 771006 766207

刊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清华大学第22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

2020年10月24—25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清华校友助力合肥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清华校友创新论坛同期举行。200余位来自海内外校友会、院系分会、专业委员会等校友组织负责人以及产学研各领域校友代表参加活动。



▲ 常务副校长王希勤讲话



▲ 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在论坛上致辞



▲ 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作工作汇报



▲ 主题对话



▲ 分组讨论



▲ 清华校友助力合肥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清华校友创新论坛现场



▲ “全球同跑接力 母校百十献礼” 参会校友用奔跑献礼母校



▲ 与会人员合影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

2020年11月7日，《清华校友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甲所第三会议室举行。《清华校友通讯》指导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成员，读者、作者、校友代表，以及校友总会和编辑部工作人员28人参加了座谈会。



▲ 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史宗恺主持会议



▲ 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清华校友通讯》执行主编唐杰汇报工作



▲ 方惠坚



▲ 贺美英



▲ 向波涛



▲ 袁帆



▲ 编辑部三位前辈，左起：孙哲、周家恣、钱锡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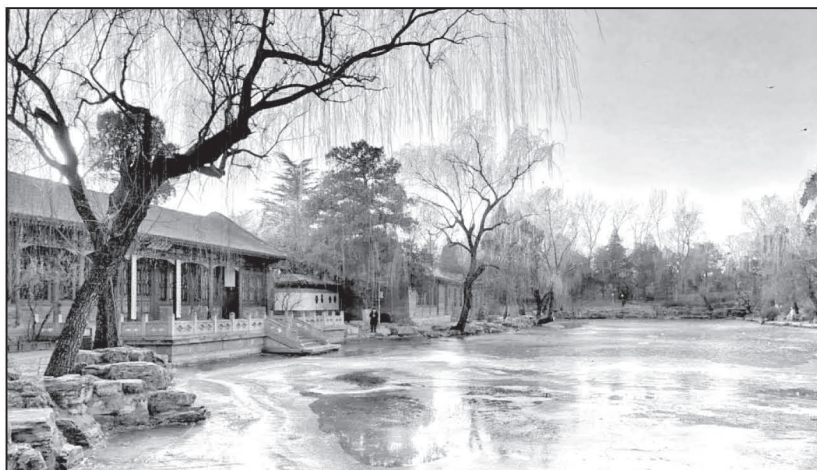
▲ 合影



▲ 座谈会会场

清华校友通讯

二零二零
冬季号
复八十四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 不忘初心 牢记校训（任国周）
- ◆ 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二三事（俞纯洁）
- ◆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访“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
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冯冠平（解红岩）
- ◆ 张宗亮：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高 燕）
- ◆ 你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纪念童诗白先生（胡东成）
- ◆ 追忆核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
- ◆ 亲历一张“经典”照片的前前后后（邓 勇）

清华校友总会 2020年12月

清华校友通讯

84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复冬二
八零
十季二
四二
期号零



刊 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 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叶宏开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 芊
周家惠 孙 哲

编辑委员会 史宗恺 向波涛 唐 杰 宗俊峰 覃 川
周明胜 范宝龙 胡 钰 杨士强 李 军
郭 谦

刊名题字 刘 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 编 史宗恺
常务副主编 袁浩歌
执行主编 宋述强
副 主 编 杨 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 辑 田 阳 郭田珍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 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一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大学同方部
发行电话 010-62782238

目录

Contents

迎接清华 110 华诞

- 7 不忘初心 牢记校训 / 任国周 (1964 届力学)
- 12 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二三事 / 俞纯洁 (1968 届工化)
- 16 大国工匠 / 彭伟民 (1970 届工化)
- 18 重拾大学生活和同学的泛黄记忆 / 吕恩民 (1953 届电机)
- 23 临江仙·110 周年校庆抒怀 / 江希霖 (1973 级无线电)
- 24 情系蓝天 不变的初心 / 王怀民 (2011 级航院)
- 27 从清华园到五道口 / 杨绍利 (2006 级人文)
- 30 念奴娇·贺清华 110 周年校庆 / 高光华 (1970 届工化)
- 30 谱写新篇——纪念清华建校 110 周年 / 孙道祥 (1970 届精仪)
- 30 书法 / 徐万铮 (1958 届土木)

今日清华

- 3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2020 年会议举行 / 经管学院
- 32 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学联合举行
全球创新学院 (GIX) 在线签约仪式 / 龙新力 刘书田
- 32 首届世界慕课大会在我校举行 清华大学担任联盟首届主席单位 / 曲田
- 33 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成功举办 聚焦“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 / 规划院
- 34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SC20 总冠军 / 计算机系
- 34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拾)》成果发布会召开 / 出土文献中心

值年园地

- 35 我在清华走上革命道路 / 李京华 (1950 届法律)
- 36 50 年岁月半世情
——说说我们的水工 02 班 / 李仲奎 傅耀良 张学学 (1970 届水利)
- 41 践行清华精神 追求身心健康 / 罗建北 (1970 届自控)
- 45 我们的峥嵘岁月 / 高红卫 (1976 级精仪)
- 47 自强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 / 唐晓明 (1985 级电机)
- 49 三十而立 / 王川 (1986 级美院)
- 52 把记忆串个串 / 刘崇茹 (1996 级电机)

清芬挺秀

榜上有名

- 55 清华 7 位教师 9 位校友荣获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 田阳

- 55 5位清华校友荣获2020年何梁何利基金奖 / 田 阳
- 56 清华大学5位教师5位校友当选2021 IEEE FELLOW / 田 阳
- 56 我校3位教师4位校友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 田 阳
- 57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访“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
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 冯冠平 / 解红岩
- 61 李屹：让中国的科创之光照亮世界殿堂 / 叶思佳
- 65 一个逐梦电网的清华博士
——记全国劳动模范、清华大学电机系校友夏德明 / 庞佳毅
- 69 张宗亮：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 / 高 燕
- 72 全国劳模是怎样炼成的
——记东方电气集团赵永智校友 / 刘广德

校友联络

- 74 清华大学第二十二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 / 曾卓巍
- 75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 / 田 阳
- 77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暨2020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 宋述强
- 77 校友总会召开三创大赛秘书处工作会议 / 三创秘书处
- 78 校友总会院系分会、专委会2020年校友工作交流会举行 / 黄 婧
- 78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学习日两周年
暨2000届校友秩年论坛举办 / 宗 慧

院系工作

- 79 建筑学院第一期校友导师计划结业分享会举办 / 建筑学院分会
- 79 电子系举办校友论坛云端研讨 / 电子系分会

各地校友会简讯

- 80 深圳校友会2020年重阳节敬老团拜会举办 / 深圳校友会
- 80 南京校友会2020年迎接新校友座谈会举办 / 南京校友会
- 80 德国校友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在线举行 / 德国校友会
- 80 山东校友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 山东校友会
- 81 全英校友会2020年换届会议举行 / 全英校友会
- 81 河南校友会庆祝母校109周年华诞
并召开2020年理事会、迎新会 / 河南校友会
- 81 广州校友会喜迎2020届新校友 / 广州校友会

名师轶事

- 82 一本父亲钱伟长写给我的书 / 钱元凯
- 85 暮年漫谈（节选） / 费孝通（1935 届研）
- 89 你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纪念童诗白先生 / 胡东成（1970 届电机）
- 95 钱钟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
——以 1948 年《东南日报》报道为线索 / 肖伊绯

回忆录

- 99 科学攀登 55 年历程回忆——吕应中口述 / 郑小惠 童庆钧 高瑄 整理
- 106 过往征程 铭刻于心 / 傅珉（1950 届外文）

史料一页

- 113 一张被放弃的早期清华入学证 / 袁帆（1975 级建工）
- 118 故园魂牵 同窗梦绕
——从孙立人参加上海清华同学会活动谈起 / 袁帆（1975 级建工）

怀念师友

- 124 为人为学 爱国奉献
——在刘仙洲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贺美英（1961 届电机）
- 126 陈定昌院士：毕生追梦的战略科学家 / 苗珊珊 张铁柱 付毅飞
- 128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逝世 享年 100 岁
- 129 追忆核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
- 132 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 / 钟秀斌
- 133 我校体育部老教授王维屏逝世 享年 104 岁
- 134 我的爷爷王凯 / 方世宽
- 137 落叶满空山
——忆父亲徐义生 / 徐大元 口述 谢喆平 整理
- 143 追忆刘炯朗校长二三事 / 李军（1980 级自动化）
- 145 怀念遇平静同学 / 吴永新（1966 届土建）
- 146 西南联大老学长陈雨波逝世 享年 98 岁
- 146 沉痛悼念韩至骏教授

荷花池

- 147 历史前排的固七班同学 / 贾海东（1977 级力学）
- 150 亲历一张“经典”照片的前前后后 / 邓勇（1977 级力学）

新书推荐

154 边走边画“游世界” / 吴冠英 (1978 级美院)

诗词书画选登

156 沁园春·续谱华章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 / 徐友春 (1970 届精仪)

156 贺清华大学 110 周年华诞 / 傅水根 (1970 届动农)

156 清华 110 周年校庆三首 / 王东光 (1970 届工物)

156 楷书 母校校训 / 宗家源 (1954 届水利)

157 水调歌头·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庆 / 王伯雄 (1970 届精仪)

54 百字令·纪念清华 110 华诞 / 李同振 (1970 届工化)

珍藏之窗

157 联大同学旧照 / 彭珮云 (1949 届社会) 珍藏

158 清华航海多项运动队老照片 / 毛乐山 (1970 届精仪) 珍藏

159 《清华校友通讯》基金捐赠录 (2020 年)

112 读者·编者

封面 冬天里远看清华大礼堂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鹏

封二 清华大学第 22 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

封三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 4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

插页 今日清华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暨 2020 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校友联络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纪念刘仙洲先生诞辰 130 周年

纪念华罗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摄影 石加东 李派 解红岩等

插页设计、电子排版 吴振鹏

不忘初心 牢记校训

○任国周（1964届力学）

1958年7月，我由武汉二中保送免试进入清华大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清华对我的培养教育时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值此清华110周年华诞，我想唱出对母校的赞美之歌、感恩之歌。

母校铸就厚德载物

1958年9月1日，我到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410专业报到，本科学制6年。入学时60人，有两个小班（410-41、410-42）。后来又调整到工程力学数学系热物理专业，合成一个班，力404，到1964年毕业时有46人。在当时，专业是保密的，是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培养高科技人才的。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堂课是听马约翰教授讲“体育运动之重要性”。马老号召我们要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有劲儿”；要全面发展，这样才能“长寿”，成为健康的学问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些谆谆教诲使我们大受启发，终生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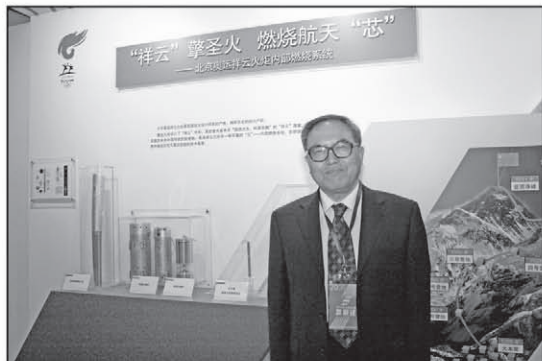
蒋南翔校长号召我们又红又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他亲自给我们学生作报告，精辟地论述什么是又红又专。专，就是要学好每一门功课，包括理论和实践，并能运用这些知识去为人民服务；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从大学毕业分配。

六年的大学生活，好像弹指一挥间，我选择了又红又专的道路，1962年12月在电机馆312房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支部副书记，系学生会年级总干事，系分团委安全组组长。把一切献给党、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我的理想与追求。

清华的学风与附近其他高校不同。清华主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没有用更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学生。例如上晚自习，清华从不考勤，学生可以在教室、图书馆，也可以在宿舍。清华教室总是灯火通明，图书馆座无虚席，在宿舍也少有嬉笑声。等到宿舍熄灯铃声响起，方听到楼道里快跑的脚步声。能形成这样一种自觉的学习氛围，是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解未来应承担的时代责任，珍惜党和人民提供的如此良好的学习条件。

清华学生不死读书，源于清华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授“传热学”的王补宣教授和讲授“燃烧学”的周力行老师，他们能深入浅出、启



任国周学长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发性地导读，教会了我分析理解、融会贯通、勤于思考、善于归纳的学习方法，使我受益一辈子。

清华学生知识面较广，适应性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承担多么复杂的任务，都能很快适应，理出头绪，抓住“牛鼻子”，提出破解方案来。

清华学生爱好广泛，有多种社团活动培养学生读书之余的多种爱好。正是清华文艺社诗社的诗词讲座启迪了我的诗兴，促使我学习创作诗歌，使我思想活跃，生活充满朝气。

清华朴实的校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大家很少去追求虚表浮华，而更多注重内在厚重。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反映出的忠诚、勤奋、执着、奉献的精神风貌，正是清华校风所铸成。

大学六年，有三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标准降至最低，男生每月33斤，女生每月30斤。有的同学吃不饱，得了浮肿病，但同学们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我寒暑假回河南农村老家，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缺吃少穿。父母亲省吃俭用，把从自己口粮中省下来的一些农产品让我带回学校分给同学们吃。我上清华大学，对我父母亲来说是好事又是难事，难就难在经济困难。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的，每月14.5元，正是人民的血汗养育了我，我终生难忘。

大学最后一年做毕业设计。当时教研室主任周力行老师把我和沈寿福、刘荣亮、张志华分到一个小组，指定我为毕业设计小组长，傅维镡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毕业设计单位在沈阳国防科委六院606所，毕业设计题目是《米格21飞机加力燃烧室燃油雾化粒度测试及理论研究》（当

时属保密课题）。学校对毕业设计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真刀真枪”，理论分析、实验研究和数值计算都有明确要求。我们经过7个月（1963.11—1964.5）的团结奋斗，在科研单位老师指导下，完成了试验件设计加工和雾化粒度测试。然后，傅老师给各人指定不同的论文题目，不同的俄文、英文文献资料目录，由各人独立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在全班总评中获得“优秀”。

1964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敬爱的周总理和彭真市长接见了1964届毕业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大礼堂前的草坪上与我们应届毕业生照了合影。这样，我在清华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140部队。

为中国航天奋斗46年

1964年9月1日，我到总字140部队（沈阳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报到入伍，后到福建前线炮三师十二团下连当兵。1965年部院合并至五机部六所，搬迁至甘肃天水三线，参加反导工程研制。

天水大院地处大山沟，原来是马步芳部队的一座被服厂，石子路，土坯房，没有自来水，电也是临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更艰苦的是根本没有科研条件，把靠山的两排白墙灰瓦的土坯房，划成了绝密科研区，但没有科研设备，没有参考资料。这里交通闭塞，搞尖端技术科研谈何容易？党号召我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在天水，我在五室总体组，担任副组长。主要从事炮射式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的预先研究。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是钱学森倡导的项目。为了加强技术力量，他

还把他的爱将——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位副主任熊尚义副研究员调来天水担任五室主任。

我负责贫氧固体燃料配方设计及性能计算、固冲发动机内弹道性能计算和炮射式固冲发动机外弹道性能计算。那时国门紧闭，世界上许多先进技术对中国都是封锁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废寝忘食地查阅资料，从探索基本的计算方法，到提出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从完成某单一技术状态的计算分析，到实现炮射式固冲发动机的内弹道性能及其外弹道的性能计算。一开始用手拉式计算尺计算，后来用手摇式计算机和电动计算机计算，最后到北京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大型自动计算机上反复计算与验证，有力指导了贫氧固体燃料配方研制和炮射式固冲发动机的总体方案设计。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开创性和创新性，受到领导的关注和广泛好评。

同时，在水院大院参加点火试验台的方案论证和初步设计，在靠近山根处建成了小型点火试验台，并配合北航大型试验台，对固冲发动机试验件进行了多次直连式试验和自由射流式的燃烧性能模拟试验。炮射式固冲发动机的预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971年8月，国防科工委发文中止炮射式固冲发动机研制，科研人员航天部内调整，所名改称航天部二院210所。

1973年8月，按航天部四院调令，我和夫人赵瑞湘同时到北京四院45室报到。该研究室是按国防科委文件新组建的，任务是高能推进剂及固液双组元火箭发动机研制。我属航天部调整调入人员，户口暂落内蒙四院，在发动机设计试验大工程组担任点火组组长，负责不同尺寸固液火箭



任国周学长为迎接母校一百一十华诞撰写的书法作品

发动机点火器设计试验、点火特性研究和试车台固液火箭发动机性能试验。

面对新单位、新任务，我虽然已到中年，但是作为清华学子决心开创新局面，干出科研新成果。当时全室团结奋斗，展开对高能推进剂，对点火器、喷注器、装药、隔板和喷管设计，以及发动机总体设计技术攻关，对直径为120、240和500毫米的固液火箭发动机设计加工，总装测试。在101站5号台进行了近两百次地面点火燃烧试验，攻克了炮式起动、震荡燃烧、燃烧效率低、残药量多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非自燃固液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性的突破，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正当具备上型号研制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大调整。1981年航天部发文三线停建，45室全体人员落户北京，在北京部内调整分配工作，终结了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在北京工作十年却无北京户口的历史。1984年4月，我和赵瑞湘同时调整到航天三院31所。

此前20年，我都是从事预研工作，有着思路开阔、理论扎实的优势，有较强计算分析能力和较高英语水平，以及设计加工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型号研究蓄势待发。又一次从头开始，时年46岁，已过不惑之年，压力很大。在31所连续工作的26年（含退休返聘12年）中，我担任工程组副组长，历任三个型号导弹助推器主管设计师，对总体设计、装药、燃烧室、喷管保险机构和压力开关组件设计，坚持自主创新，着重解决了三型助推器装药脱粘、鼓泡、烧穿、爆炸、解体、掉弹等关键故障的技术难题。开创性地研制成功整体模压玻璃钢喷管，装机、装弹飞行，直至最后成功。有时为帮助总体设计解决推阻矛盾、弹体超重等问题，我主动承担设计风险，修改发动机设计，从而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增加设计难度和风险，确保总体方案优化，服从全局需要，受到

总体部和军方赞扬。

我们完成三个型号导弹设计定型，量产海军列装，有两个型号导弹展示于国庆天安门阅兵方阵，荣立个人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荣获两次航天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国防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及奖章。在型号研制过程中，我开创性地提出了两项边缘性预研课题，在航天部立项成功，并按时完成，又分别荣获两项航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评上研究员后，荣获所党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在退休后连续返聘12年。

我们执行“9911”任务时，中央军委首长亲临某海军基地，观看海军联合实弹演习。三院设计团队承担技术保障任务，我是成员之一。“9911”任务圆满完成，三院设计团队的技术保障工作受到中央军委首长好评。

我还有幸遇上了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2006年1月，受北京奥组委的委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成立了以刘兴洲院士（1951入学，航空）为总设计师，

薛利副总经理为总指挥的奥运火炬设计团队，为北京奥运会自主研发了新颖、独特、能够充分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奥运系列祥云火炬，该火炬科技含量高，包括地面火炬、珠峰火炬系统和鸟巢主火炬。我是奥运火炬设计团队主要成员，分工负责珠峰火炬系统总体设计和珠峰火种灯主设计，参加航天科工集团鸟巢主火炬立项报



奥运珠峰火炬揭幕暨珠峰火炬技术保障团队出征仪式上，前排持花人，左2任国周，左4刘兴洲

告评审，并对这个设计团队中的15位年轻人进行传帮带，在设计上把关。珠峰火炬系统包含有珠峰火炬、珠峰火种灯、引火器、高原火种灯和高原圣火台五大系列产品，以及地面火炬燃烧系统研制。

历时两年多，经过多方论证、多方案创新设计和试验，我们新建了强风低压试验舱，改建了二号台高空模拟试验舱，对珠峰环境条件实现全模拟。两次专程到西藏珠峰大本营实地测试，又到黑龙江漠河低温测试，在怀柔登山基地培训中国登山队珠峰传递火炬手，克服了珠峰地区大风、低温、低压、缺氧等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研制成功，按时向北京奥组委交出了首批合格的祥云火炬产品。这些火炬现存于瑞士洛桑奥运博物馆。

2008年3月24日起，祥云地面火炬在五大洲激情传递，5月8日，珠峰火炬让奥运圣火第一次在世界之巅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上熊熊燃烧，兑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8月8日，鸟巢主火炬顺利点燃，火焰形态壮观飘逸，将奥运会开幕式的热烈气氛推向最高潮。五千年的中华灿烂文明与现代航天高科技相结合的奥运系列火炬成为奥运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史册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08年7月，奥运火炬设计团队荣获国家先进集体荣誉奖。我荣立个人一等功，珠峰火炬系统科研成果荣获2008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航天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奥运火炬设计团队进行了多次全方位报道。在《中国航天报》2008年5月9日专题报道中，火炬项目副总设计师邵文清感慨地对记者说：“整个火炬系统，珠峰火种灯是研制历程最为坎坷的一项，整个

队伍中，任老师是功劳最大的一位！”

2008年7月12日，我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出席CCTV-3由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设计奥运》专题节目，向全国人民展现了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设计团队和航天人的风采。

2009年5月8日，是珠峰火炬登顶一周年纪念日。刘兴洲院士在办公室将其亲笔写成的长诗《珠峰火炬颂》赠给我，并深情地回忆说：“在火炬设计团队中如果没有你的参加，可能将会走更多的弯路，是否能按时完成任务，当时我心有疑虑。好在我们团结奋斗，克服了各种困难，按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航天科工集团领导和北京奥组委领导都非常满意。”

2010年4月，我时年72岁，完全退休回家休息。2011年，中国空军委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为其在北京的中国航空博物馆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设计“胜利之光”长明火炬，我受邀参加了长明火炬设计团队，负责评审总体设计方案，对技术把关。后又担任该项目验收及鉴定委员会主任。如今，屹立在燕山南麓胜利广场之上的长明火炬，日夜燃烧的熊熊火焰照耀着中国空军的胜利征程。

我在航天科研一线奋斗了46年，所取得的点滴成绩源于有党的领导，源于有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源于坚持过硬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常教育儿子力欣（1999级研，计算机）说，你的姥爷赵殿奎是1935年入清华土木系、1939年在西南联大毕业的，我家堪称三代清华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校训，发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清华精神，薪火相传，永闪光辉。

2020年11月于北京

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二三事

○俞洁纯（1968届工化）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深圳，参加盛大庆祝活动，并发表历史性重要讲话，总结40年创业史，发出新时代动员令。作为一个与深圳经济特区同步奋斗40年的创业者，回顾深圳特区和大亚湾核电站40年的峥嵘岁月，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我是清华工程化学系核材料专业1962年入学的学生。当年清华设立工程化学系和工程物理系的目的是为我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培养人才，因此，相关专业都是保密专业，我所在的专业就命名为110专业，内容是核燃料前处理。毛主席在1956年曾发出豪言壮语：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经全国人民共同奋斗，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正在新水利馆自习，有同学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顿时，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的同学都涌到操场上，敲饭盆，敲脸盆，欢呼雀跃，热烈庆祝。

1968年毕业后，按照当时“四个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江西铜业公司，曾当过钳工、球磨机工。后因工伤到了子弟中学当了校长。从1978年起，开始投入中国核电事业，全程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

原子弹是将核能用于战争，而将核能用于和平就是核电站。当人们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时隔30年，1994年2月和4



1994年2月6日，俞洁纯学长在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投产庆典现场

月，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才先后投入商业运行，而英国、苏联、法国、美国则分别用了4年、5年、7年和12年走完同样的历程。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严峻的历史事实。

1984年9月，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飞雄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第28届大会，在会场上中国被视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坐在前排。蒋飞雄非常诧异，会下一问被告知：你们中国的台湾省不是有核电站吗？蒋飞雄恍然大悟，这是借了台湾的光！这是蒋飞雄亲口告诉我的故事，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两弹一舰”上得那么快，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却举步维艰？中国大陆核电起步的路在何方？

杀出一片血路来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广东省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大胆提出：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说办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大陆的核电起步困局何在？自己建，能力不够；引进，资金不足，特别是外汇短缺，1978年国家外汇储备只有区区1.67亿美元。1978年12月邓小平曾向世界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建造苏南核电站，最后也因外汇不足而被迫下马。深圳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同样中国核电的起步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核电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终于在历史的转折点，勾划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借贷建设，售电还贷，合资经营，在国家投资为零的条件下，建设一座40亿美元的大亚湾核电站，打开了中国核电高起点起步的广阔通道。曾有人批评这条道路是“卖国主义”，曾有人批评引进消化吸收的道路不存在，但是中国核电起步的创业者们用不朽的功绩告诉人们，大亚湾核电站也是中国核电高起点起步的一个奇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说，大亚湾核

电站的工作可以用三句话来概论，那就是：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我曾任广东核电合营公司价格谈判团秘书长，个中艰辛难以忘怀。

一槌定音

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震惊世界的核事故，距大亚湾核电站50公里的香港也因此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产生严重关注。香港56个社会团体关于“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征集公众签名，据称签名人数达到102万人。在此关键时刻，7月6日广东核电合营公司王全国董事长直接致电中央，力陈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坚决态度。7月10日，小平同志指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公司董事会也认识到公共关系工作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十分重要，决定成立公共关系处。我很荣幸地担任了广东核电合营公司首任公共关系处处长、对外发言人，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金人”逸事

李鹏总理多次告诫大亚湾，建设好一个核电站不容易，运行好一个核电站更难，要建设运行世界一流的核电站必须有世界一流的管理人才。因此，大亚湾核电站决定选拔派遣培训人员115人，成建制地按国际标准到法国培训。

由于培训要求高，因此费用也很高，培训合同费用平均每人26万美元。由于这笔费用相当于几十公斤黄金，因此这批培训学员被戏称为“黄金人”。我作为保健物理处处长，也成为“黄金人”之一。

所有培训人员先在国内学习英文、法



2020年10月14日，俞洁纯学长（前左2）在深圳清华校友会纪念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 迎接清华110华诞



俞洁纯学长在中法建交 55 周年系列活动之“黄金人”30周年纪念仪式上留影

文，用外文学习核电站技术文件，每两周考试一次，成绩为D就淘汰出局，全部考试通过再去国外培训，平均时间是一年。到国外培训，每个学员都有师傅，徒弟跟着师傅进行影子培训，也是两周考试一次，得D终止培训。

我是第三批培训学员，共30多人。我们从深圳出发，在香港乘机到巴黎。令我奇怪的是，我们这30多人却分乘两班飞机。询问之下才知道，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怕万一飞机失事我们这些“黄金人”全军覆没。

虽然法国是世界第一旅游胜地，但我们的学习还是非常艰苦的，我们都是单身出行。在我们之前，韩国人员也在那里培训，他们都是带家属的。法国人问，你们怎么都不带家属？我回答，为了专业学习，其实是为了节省费用。有一位同事刚刚结婚就出来培训了，思念心切，于是就想打电话。当时100法郎（相当于20美元）可以买5分钟电话卡，就咬咬牙买了一张电话卡，半夜三更（法国与中国有6小时时差）到街边电话亭打电话。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人家中是没有电话的，只能

打到夫人的医院，拨通电话再去叫人，刚讲上话3分钟已经过去了！

法国人民是十分热爱生活的，他们最喜欢请客吃饭，喝酒聊天。为了增进友谊，搞好培训，我也请法国师傅吃饭。当时我们的费用有限，因此就在我们的驻地自己做饭。我们的菜单中有一道甜食豆沙汤圆，法国人非常喜欢吃，大呼好吃。但是他们看着汤圆向我发问：这个雪白的汤圆一丝缝也没有，里面的豆沙是怎么放进去的？于是我就幽默地回答：当年马可波罗到中国，中国人已经把这门技术传授给他了，遗憾的是，当他返回意大利时，在途中把这门技术忘记了，于是你们现在的披萨、汉堡、三明治的佐料都是放在面上的！而我们到法国来学习核电技术，回去后一定不会把你们教给我们的技术给忘了！我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

今天，当年的“黄金人”都已经成为中核集团的骨干，从集团到各核电站的董事长、总经理大多由这些“黄金人”担任，不愧为中国核电的栋梁之才。我作为其中一员也深感光荣。

欢呼的除夕

经过七年的奋斗，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终于成功建成。1994年2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在这个喜庆的时刻，为了感谢小平同志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关怀和支持，一幅在苏州定制的描绘大亚湾核电站美好风光的苏绣赠送给了小平同志。2月9日正值除夕，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邓小平同志得知大亚湾核电站顺利投产的消息后，很高兴。他请李鹏同

志转达他的祝贺，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科技人员表示感谢！”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大亚湾核电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巨大的荣誉，在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的大亚湾工地，人们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历史性的跨越

40年前，在大亚湾核电站起步之时，李鹏同志曾告诫我们：万事开头难，关键在起步。确实如此！从1980年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到2020年，40年过去，中国核电事业实现了从起步到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到今天，我国大陆已有48台核电机组运行，10台机组在建，总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位列美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可以预见，再过10—15年，中国核电必将跃居世界首位。大亚湾核电站以国家“零”投资起步，今天，中国广核集团的总资产已近8000亿元人民币，为“以核养核，滚动发展”，为改革开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资产。

从香港公众出于对核安全的关注而引发1986年香港反核风波，到今天，大亚湾运行26年了没有发生一次核安全事故，我们向香港同胞，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大亚湾核电站引进法国压水堆M310机组技术开始，我们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我们先后有了CPR、CPR+、ACPR、ACPR+这些堆型，直到完全自主化的华龙一号。中国核电技术实现了从高起点起步到自主化发展的伟大变革。从大亚湾核电站设备99%进口，到今天华龙一号实现90%国产化，中国核电达到了令世人瞩目的国产化水平。虽然美国玩弄霸权，把中广核列入它的所谓“黑名单”，但是，这已经完全不能阻

挡中国核电前进的脚步。

当年，在香港反核风波中，我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首任公共关系处处长曾专程访问过香港皇家天文台。他们告诉我，为了监测大亚湾核电站对香港的影响，他们建立了针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十三个放射性监测站。20年后，我再次访问香港天文台，我请他们给我看一看20年来的监测报告。当我看到这些由香港方面监测的结果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所有的监测数据形成的是一条条直线！这表明，大亚湾核电站的大气排放对香港地区的放射性本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各方来宾参观大亚湾核电站。我最喜欢参观的是到材料码头观看大亚湾的海水。站在大亚湾海滨，遥望那一碧如洗的澄蓝、清澈见底的海水，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大亚湾基地六台机组冷却水的排放量是300秒立方，一天就是260万吨，一年约为8亿吨。年复一年，十年就是80亿吨。如此巨大的排水在海水中循环，而大亚湾的海水却比号称“蓝色海岸”的法国地中海之滨更加清澈透明。浩瀚的大海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明，美丽的大亚湾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环保纪念碑！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大亚湾核电站时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大亚湾是中国最美丽的厂址。

中广核集团的LOGO是一只翩翩起舞的白鹭。当年，大亚湾核电站投产后，一群白鹭飞到了核电站旁的草坪上，有人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场景。我看到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镜头：白鹭与大亚湾核电站和谐共处，这不是最有力地说明核电是安全、清洁的能源吗？于是，白鹭就成为了大亚湾核电站和中广核集团的

□ 迎接清华110华诞

LOGO。

夜色下的大亚湾核电站，海浪轻卷，海风习习。米黄色和橙红色相间的厂房环抱在静谧的海湾里，被滨海大道上乳白色的灯光染上了温暖的色彩。正是这座静静矗立的核电站，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艰难曲折中奋然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为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翻开了历史的一页，为我国改革开放增添了璀璨的光辉。40年过去了，大亚湾核电站还将继续前行，中国核电事业还将继续前行，改革开放事业还将继续前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继续前行！

2020年10月20日

大国工匠

○ 彭伟民（1970届工化）

彭伟民，1946年出生，湖南澧县人，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0年毕业后先后在河北省新河县化工厂、新河县糖厂、河北工学院等单位工作。1984年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4年参与创立时代集团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2000年，获香港“紫荆花杯”内地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家称号，北京民营科技创业20周年百名创业英才奖。

明年是母校110年华诞。一百一十载风雨，造就精英无数，一百一十载沧桑，培育桃李满园。作为一名从清华毕业50年的“老学生”，从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到决定“下海”，兜兜转转，不懈奋斗，也到了该向母校汇报的时候了。

20世纪80年代，很多学会或协会都开始办公司，我所在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也不例外，它在1984年办了一个公司——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时代集团前身），专门帮助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人员去实现成果转化。那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就到了这个发明公司。一开始，这家公司只帮很多

发明人联系生产厂家，后来发现，绝大多数发明过于简单，做转化工作很难，因此这项中介工作根本赚不到钱。我们很快意识到，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是难以存活的。当步履蹒跚地走过企业初创的两年后，我们的转折点来了！

1986年，在原公司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时代（TIME）公司，TIME的意思，就是技（Technology）工（Industry）贸（Marketing）展（Exhibition），技工贸的意思不必多解释，而“展”就是办展览会。从那时候起，该公司每年都要办一到



彭伟民学长（右2）向国务委员宋健（右3）介绍公司的新产品

两个国际展览会，这种办展览会的做法一直延续了五年。

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四通、万科、时代、联想、海尔依次创建，其中三家企业来自中关村。在这个中国顶尖高新技术企业荟萃之地，在声势浩荡的新兴企业汪洋之中，当年的大多数企业现已淹没在浪潮之下，但时代集团是个例外。作为第一批在中关村土生土长的企业，能凭借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抵挡时代的更迭，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中存活下来的企业，仅剩联想、四通和时代。

1987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德国的埃森国际展览公司合作，在北京办了一个国际焊接技术展览会。我们受命负责展览会的留购工作，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组织展览会。通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及对展品的推广工作，发现其中很多产品在国内有市场，却又是国内市场上的空白。我们选中了“里氏硬度计”，确定以此作为公司要开发的产品方向。然而我对这个技术是外行，但是又看到了市场，于是便开始招聘开发人员，引进瑞士的探头，采用日本电脑，然后自己开发软件和AD转换器。仅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就成功开发了自己的里氏硬度仪，填补了国内硬度测试领域的空白，在中国里氏硬度测试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现在的时代检测仪器产业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积累，使便携式仪器达12个系列近百种型号，出口至60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跨国经营的庞大体系。2005年，时代超声波探伤仪TUD210成功进入奥运工程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工程。

还是在这次展览会上，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机遇。传统的焊接是采用大功率的机

械类焊机，而在80年代，焊接技术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电子类的新焊接技术，这就是逆变技术，采用逆变技术的焊机体积小、节电。我们看准这个划时代的变化，也投入了开发力量，研制出中国自己的逆变焊机，用了几年的时间，最后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市场。时代逆变焊机的产销量连续五年居全国之首，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中，时代焊机的使用率达80%以上。2003年，时代集团控股的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深交所，成为中国焊机制造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多年来，时代集团的产品主要就是这两大方向：检测仪器和焊接设备。时代公司坚持走“技术创新和专业化”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为振兴中国工业贡献一些力量，创造中国品牌。

曾有人问我累吗？我不累。我是造势的，大家是做事的。让所有人忙得团团转，我闲一点就可以了，至于有的人不会干，不要紧，学学就会了。那么多企业、公司亏损，重要原因就是带头人决策不对路。而我只是一个负责在关键时刻负责点头或摇头的人。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期，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时代作为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一员，必将继续在智能化制造产业继续发力，将工匠精神沁入到每一滴血液中，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打造新时代的“隐形冠军”企业，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020年11月

重拾大学生生活和同学的泛黄记忆

○ 吕恩民（1953届电机）

我今年89岁了，70年前考入清华电机系。明年将迎来母校建校110周年，心潮起伏，无比激动……

1950年春天，我和挚友何德全即将从北师大附中毕业，正在选择上哪所大学。班主任毛鹤玲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考清华大学，因为我俩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作为年轻人，我们心里还是不太踏实，就又去征求毛老师的意见。30多岁还未成家的毛老师对学生真是好，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们到清华大学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清华大学门口集合，毛老师领着我们两个18岁小伙子走进了清华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清华园，真是开眼了。春天的校园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大学生们在校园里穿梭，几个人夹着大三角尺一边走路，还一边辩论着什么。教授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教案，赶往上课的教室。这学校也太漂亮了，大礼堂、图书馆、二校门、水木清华等，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就这样我们俩下定了决心考清华。

我当时还看过一部纪录片《解放后的新旅大》，对旅大（现为大连）这座城市也挺向往，就报考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和清华两所学校。大连工学院先发榜，并到学校来招生，我这时便将决定权交给了父亲。早年留日、身为电气工程师的父亲坚持等待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年轻时的吕恩民学长

便放弃了大连工学院。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清华电机系的三年学生生涯（国家需要学制缩短）。我的师大附中同学何德全、张慕萍、王森、孙明达、李阿中等很多人也都进了清华，何德全是清华新生中高考第一名。我印象中，电机系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电力机械制造三个专业共有新生约100人，其中女生7人。全校学生约2000人，其中机、电、航是三大系，土、水、建次之，物理、化学、生、气、地、文、史、哲、外是小系。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主持全校工作。

到秋天我们入学时正开始抗美援朝，我们几个大一学生到大四同学宿舍听他们讨论，看到宿舍里一位白白瘦瘦的学生会主席坐在上铺正慷慨激昂地演讲，从鸦片战争讲到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他表示美帝没什么可怕，我们只有反抗，没有退路，一定会取得胜利。其神态和口才让我们这些小学弟十分钦佩和仰慕。这位演讲人就是朱镕基，他那年即将毕业，在学校

时只见过他这一次。

当时爱国浪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清华学子的心，那些激愤、怒吼的情景犹在眼前。全校师生高举红旗成群结队去海淀和石景山钢厂、黄土岗农村，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感受他们在旧中国的艰难生活，听取他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爱国觉悟。在参军参干热潮中，我和王森、张慕萍、杨吟梅、孙明达、李阿中等都踊跃报名，要为祖国献身，但学校没通过。班里同一大组的程穆、田垚同学首批获准参加军校，大家依依惜别。不久后便收到程穆的来信和英姿飒爽的军装相片，信中说：“离开清华我流了泪，看着同学们送我一直追到校门，看着清华离开我的视线。清华曾经是我废寝忘食追求的目标，现在我却离开了她，我是在那个时候才感到留恋。不过你莫误会，这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个人的事情决不能与国家安危相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我，你是知道的。”

1951年7月4日，吴辅仁、陈书鸽、彭文怡、周曾德、袁曾慰、程建宁等是第二批被批准参加军干校的同学，吴辅仁在给我的留言中说：“怎样才能使青春的生命开出灿烂的光辉？我的回答是：只有把自己完全献给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这些人中，有的命运多舛，被错划为“右派”或“反革命”，后来都平了反。最成功的要属程建宁，他后来的军衔是中将，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我们没有参军的同学在送走他们时的心情是羡慕和敬仰，他们能够为祖国献身沙场，我们也要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记得亲自登台讲的教授中黄眉教电厂及变电所，王宗淦教电网

稳定，刘仙洲主讲机械，王先冲教电工基础，张维主讲力学，孟昭英主讲电子学，孙绍先教输电工程，杨津基教高压工程。老师们十分敬业，这时教材已经不采用之前的美国版了，都是老师自己编和从苏联翻译过来。其他院系的知名教授也常在校园里碰见，如张奚若、叶企孙、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费孝通、潘光旦、章名涛，真是名师荟萃。

这个时期国家对清华和北大十分关注，知名学者、国家部委领导经常到学校给大家讲课。印象深刻的有伍修权主讲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面对的局面，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激战时期，我们为志愿军的胜利而欢呼；钱正英讲中国的能源形势，我第一次知道了三峡水电站这个远景规划；艾思奇讲学习马列主义树立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胡乔木讲党史，让我们了解党诞生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全国的解放；魏巍介绍志愿军用生命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蒋南翔作关于苏联问题的报告；范长江作中苏友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报告。每次他们来讲课大礼堂都是满满的，有时北大的学生也来听，大礼堂都装不下。回想那个年代真是激动万分，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望。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高年级留校的辅导员。这时校学生会主席已经换成了凌瑞骥，辅导员是张凤祥和徐士珩，他们三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士珩是我最早接触的，他是电四班的学长，和蔼、朴素、稳重，经常来到班里。虽然仅仅相处了三个月，他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思想经常茫然起落，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也要实事求是地要求自己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己……不要以为自己不如别人而苦恼，踏踏实实工作就会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请他将这几句话写在了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一直保留到今天。

张凤祥也曾是电四班留校的辅导员，不久调到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前身北京电力设计院工作，他对我帮助也很大。记得有一次学校要组织“了解社会”的活动，我是班里的政治干事，进城找他请教。他给我介绍了社会形势。当时国家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的主基调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社会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他讲得我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他后来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我在东北电管局外事处和东电职工大学工作期间，他来沈阳出差，每次都来看我。

凌瑞骥也是电四班的老大哥，他任学生会主席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是同学们崇拜的偶像。还记得我们前往唐山电厂实习时，他在动员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革命的，不革命的，以及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水火岭就看其是否愿意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光明大路。”

在我们班上有好几位师大附中的同学，其中最要好的是挚友何德全，我们俩从小在一起学习玩耍，他经常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父亲好像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曾为新中国建立出过力，家里生活条件比较阔绰。上了清华大学，他在物理系，我在电机系，还经常见面。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他被分到北京大学，我留在清华大学，从那时

至今60多年没有再见面。1969年“文革”期间，我刚刚被专政出来在农场劳动，一天两位军人突然找到我，是中央军委派来的外调人员，调查何德全的情况。军人还算是礼貌客气，大体了解了何的基本情况和在学校的表现，我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来人十分满意。改革开放后，各种同学会相继举行，但无论中学还是大学聚会，我都没有再见到他。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他是从事国家高级安全机密科技工作的特高级专家，由于工作性质限制，各种同学会从来不参加。2001年儿子有次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何德全正在给朱镕基等国务院领导讲课。我赶紧打开电视，看到老同学相貌基本没变。得知他一直在安全机密单位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同学曾在医院看病邂逅他，想和他说话，他挥手回避了。在电视上露面真是不容易，后来也没有联系上他。

张慕萍也是师大附中的同学，我们在电车上看到彼此的师大附中校服开始认识，他父亲是师大教授。进入清华大学的



2018年4月，在班级纪念碑前合影。左起：钱家骧、吴维韩、吕恩民、张慕萍

后，我们都在电机系，而且住在一个寝室，不久他就入了党，后来还担任过学校团委书记。他的进步给予我无形的影响，是我心中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他一度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参赞、衔领事、教育组长，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退休后中学和大学同学举行聚会，每次他都参加，还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

王森也是师大附中同学，又是清华电机系校友。他个子很高，帅气逼人，不仅学习好，唱歌、文笔、演讲、体育样样都能力非凡。到了清华大学，他成为我们的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和我无话不谈。上中学时遇到了一个心上人，后来对方到沈阳东北工学院上学。在大学期间和北大联欢时，一位北大女生看上了他，他也有些动心，问我的意见，我说还是原来那个好，这就成就了他们夫妻两个的幸福姻缘。由于他父亲王化一的地下党身份和公开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身份，社会关系复杂，因此迟迟没有入党。直到毕业后，经过党组织的调查考验，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外甥20世纪80年代就读自动化系时他正担任系主任，之后还担任过清华教务长，可惜1998年7月10日不幸去世。

当年在师大男附中读书时，王森、孙明达、张慕萍、李阿中还有我，我们五人 是名震北平的男附中“冈底斯”排球队队员，被称为“五星上将”。只可惜在清华上学时虽然组织了“金刚队”，却仅参加过一场比赛。我们一起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又一同考进清华电机系，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不仅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在思想进步方面大家也互相鼓励。北



跨越时空的合影，左起王森（PS上去的）、吕恩民、孙明达、张慕萍、李阿中

京夏日炎热的夜晚，我们坐在宿舍外的草坪上谈天说地，那时北京西郊的星空清晰高远，偶尔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煞是好看，那是充满梦想的年代。

2003年我们班毕业50年聚会，五人中尚健在的四位同学在清华主楼前合影留念。为弥补遗憾、怀念老友，我将王森的照片也PS在其中，我们再次跨时空相聚。

当年，我们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到工厂农村去。1951年7月8日，我们班几名团员到农村支持青年团的工作。经过两天培训我和本班同学沈以清，物理系的李庆忠、刘慈群，以及北京女一中两位高中学生万音和刘秀英，组成一个小组，我任组长，来到香山附近的门头沟。与当地农民接触后才发现农民虽然刚刚分到土地，但生活仍是十分贫困，土坯房、一盘炕、一个饭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吃的是粗粮和咸菜，衣衫褴褛。但在他们略带疾愁的脸上，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非常高兴，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八月的北京烈日炎炎，我们来往于三个自然村，每天步行几十里，汗流浹

□ 迎接清华110华诞

背，气喘吁吁。我们在田间、河边、炕头上、屋檐下，和农民促膝交谈，访贫问苦，办夜校，讲文化，讲形势，他们也和我们有一说一，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八一”建军节欢庆会上，我们写标语，练节目，张灯结彩，万音琵琶伴奏，我唱了《杨柳青小调》。晚会气氛热烈，农民们都很高兴。

在一个月的活动中，清华大学和区委领导以及同学们两次来看望我们，文学宓和唐泽圣同学给我们送来当时还是很奢侈的糖果。王森和我住在漆黑的小学教室里，我们从下乡的收获到青年的进步，再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史，一直聊到深夜。

8月10日，在清华团组织杨吟梅同学带领下，在颐和园和我们下乡同学联欢，看到近一个月未见的清华同学格外亲切。回到学校，由于小组活动非常成功，学校安排我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讲述这次活动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大礼堂讲台上，是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

1952年8月13日，也是暑假期间，我们到唐山发电厂实习。当时的唐山电厂总容量不到3万千瓦，链条炉、人工推煤、高大的锅炉和汽轮机，第一次看到这些现实中的发电设备，真是惊奇。但当时有一种感受，自己在城里享受电灯的光芒，一拉开关很方便，书本里的发电原理和发电厂图片也都是那么高大上，可现实中发电厂的工作环境真是十分艰苦。我们青年学生和工人

一起劳动，真正融入了工人阶级的氛围中。

厂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厂长”路岩，后来曾任电力部生产司司长，厂党委书记是她丈夫季成龙，后来曾任水电总局局长。他们都是延安来的干部，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常常看到路岩穿着工作服，深入现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多年后，路岩到我工作的鞍山电业局检查工作，仍然是那么可亲可敬。

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变得非常紧张，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非常需要人才，要求我们这届四年的大学学习压缩到三年，因此课程安排十分紧张，社会活动相对少了。很多。

1953年3月3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日记里写到：“永远不会忘记高举党员的旗帜，终生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切乃至献出生命。”



1953届电机系发电班毕业时与老师合影

1953年秋天我们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是分配制度，我被分配到位于国家最大重工业基地的东北电管局，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校。正是中秋之时，清华大学20多名毕业生由我带队乘上北上的列车，我们班有冯和洁、李万达、郗常骥、连敦厚、孟英、刘大卫、孙佳祯、毛锦庆和我共九人，我们九人为东北的电力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本人在“一五”“二五”时期，跟随苏联专家参与过吉林、富拉尔基、阜新、抚顺、大连新建电厂和老厂改扩建的设计管理。那是拼搏的年代、火红的年代。

毕业几十年中，大家都历经很多磨难。我本人在“反右”中被认为同情右派，“文革”中被打成“保皇派”黑干将，关进“牛棚”。一家四口从东电机关下放，九年间辗转朝阳、盘锦、营口，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获得平反，我被破格提拔为鞍山电业局局长。这时，老同学们也大多焕发第二次青春，又投入到实现年轻时梦想的奋斗中。我于1984年被调回阔别15年的沈阳东北电管局，开始新的历程，曾担任东电外事处处长兼对外

公司经理。1987年受命筹建东北电业职工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97年退休。

经过几十年沧桑我与很多同学失去了联系，重新联系上李万达就非常巧合。我转战到鞍山电业局工作时，在临时住的单身宿舍里，有位服务员范阿姨，他的儿子据说也是清华毕业的，一打听原来叫李万达。我马上找到范阿姨，最终联系到当时在阜新工作的李万达，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在鞍山见面。他是鞍山人，很想回老家工作，我二话没说帮他调到了鞍山电业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最近一次回清华是2018年4月12日，毕业65年了。儿子陪我在校园里和张慕萍、钱家骊、吴维韩一起聊天畅谈，站在我们班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徜徉在留下青春记忆的校园里，真是感慨万千。当年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工程师，为国家电力事业贡献一生。几十年来，自己不敢懈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培养自己的母校。不管时光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每个学子对母校的情愫。

2020年10月8日于沈阳

临江仙·110周年校庆抒怀

○江希霖（1973级无线电）

丙辰腊月^①别名府，
怀存厚德自强。
初心奉献非功名。
水木清华境，
春风化雨情。

辛丑^②欢庆贺华诞，
新物象满学堂。
莘莘校友硕果呈。
拥抱新时代，
追梦砥砺前行。

注：①丙辰腊月，指1977年元月毕业离校。②辛丑，指2021年。

情系蓝天 不变的初心

○王怀民（2011级航院）



王怀民校友

王怀民，湖南衡阳人，首批清华大学与空军联合培养飞行学员，2015年在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专业本科毕业，2015—2017年，在空军飞行学院先后经历初教-6、教-8和歼-7改装训练，2017年12月因技术原因停飞，任河北某场站驱鸟队排长。2018年改学专业航空管制，9月分配至西南某机场任管制参谋。2020年3月，经考核被任命为所属部队首批塔台飞行管制员。

2019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同样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天。告别飞行两年半后，我再次和飞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塔台独立担负战斗机管制指挥，与蓝天再续前缘。下达完起飞口令，望着加力呼啸升空的战鹰和滚滚热浪，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回想这几年来的经历，一种慑人心魄的感动直触心房，往事历历犹如幻灯片回放浮现眼前。

高中毕业时，我怀揣着飞天的理想招

飞入伍，没有料想到挑战会来得如此突然，我接到了提前到军校参加选拔的通知。带着激动的心情和对未知的期待，我乘车辗转来到北国春城，一轮轮考评接踵而至。经过军事体育科目的训练，航空理论的学习，初教机的体验考核和文化成绩复试，我通过了选拔，成为首批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飞行学员的三十二分之一。

在长春的这段日子，紧张而短暂，忙碌又充实，充满了艰辛、苦涩和汗水，更有战胜挑战后的喜悦。对飞行事业的向往让我选择了勇敢面对和坚持到底，这段令我自豪的经历不仅磨练了意志，更提高了觉悟。依稀记得中学校园里立有一句标语：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立志绝不能简单考虑一己之得失，而应该思索如何将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只有这样人生才会跃迁到新的起点和高度，正确的人生航向才能被赋予生命航线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水木清华强军志，逐梦空天赤子心。”在清华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下，我们不仅获取航空航天专业知识，逐渐丰满搏击长空的羽翼，而且广泛涉猎各门类感兴趣的学科领域，努力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利用广阔的平台、优异的资源，去磨砺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在清华园里不断成长，完成了由一名普通青年向合格飞行学员的转变。大学带给我的，不只是知识框架的构建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清华飞行员班集体参观航天城

我想还有人格、价值观上的塑造。

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聆听了观点新颖的大师讲座，遇到让我们深受启发的同道中人。与优秀者同行，如同洞穴探微带着火把前行，足以驱散黑暗。点点滴滴、言传身教，宛如夏日夜空的点点繁星，倒映在我们的心田。当在“航空概论”课上听陈海昕教授讲述参与国产客机C919设计时，我体会到了清华人对于航空梦想的执着与热爱；当听完杨振宁先生深入浅出的“普通物理”课时，我领悟到清华人致知穷理的精神和学问笃实的作风；当在大操场看见社团招新“百团大战”的热闹场面时，我感受到清华人对于文化的开放包容；当看到92岁的黄克智院士热爱运动、坚持每天清晨打一场网球，我敬佩于清华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决心；当在清华英烈纪念碑前听到沈崇海驾机撞向日舰的英烈故事时，我体会到清华人穿越世纪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当我在杨村机场感受歼-10起飞的轰鸣，在成都飞机厂看到歼-20的飒爽英姿时，我叹服于飞行事业的宏伟，更无比感恩清华对我们这个集体的用心付出。这些付出，都在我心里深深刻下清华的印记，让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要

做什么，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时光追溯，回到2014年的转校季。临别时，校武装部熊剑平老师殷切叮嘱：“未来的人生航段风景瑰丽又充满挑战，或许有人会在征途上踟躇彷徨，甚至在困难面前退缩放弃，但无论平凡抑或伟大，我都希望你们的内心长明自强不息之灯，永远保持进取的姿态，把艰难困苦视作玉汝于成的机遇。”顺利完成联合培养阶段的学习任务，怀着对母校的依依不舍和无限眷恋，带着师长、亲友的厚望和寄托，我们踏上新的征程。作为飞行学员，我先后经历初教机训练、高教机训练和战斗机入门改装三个阶段，无论哪一种机型，我都认真钻研机型理论，全身心扑在飞行训练上。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我于2017年3月停飞了。“飞天”的梦想成为了破灭的“肥皂泡”。在心情低落的日子，我被安排到连队锻炼，任代理排长。作为驱鸟队的一分子，飞行时常伫立在跑道一侧，操作钛雷炮轰驱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禽。望着同期同学驾机升空，我思考着在人生变幻的旅途上，除了钟爱的飞行，还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才能重新构建起精神的大厦。目光随着腾空消逝的战机望向远方的天空，我回想起第一次飞高空科目时的情景。脚下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平日里常去的定兴县城小得微不足道，而东北处偌大的北京城、天津卫作为人类文明在黄土地上的结晶，与向西看去绵延万里的巍巍太行相比竟感觉如此渺小，天空的浩瀚壮阔，与人类征服蓝天事业的博大崇高相映得彰。这种感情提醒我，即使我不能飞行了，我也要紧密地与飞行联系在一起，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做一名为飞行服务的人员！就这样，停飞面临转往地面院校以及专业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航空管制，立志成为一名维护飞行秩序、保证飞行安全的“空中交警”。

2018年9月，我毕业分配到空军西南某机场，开始了我的飞行管制工作生涯。怀着一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积极学习航管相关法规，熟记每个空域的使用规定，熟悉区域内的每一条航路、航线，仔细琢磨值班中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法，很快开始单独担负机场管制值班，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飞行管制员。

踏着改革强军号角的鼓点，飞行组织指挥模式改革把飞行管制员推上了飞行指挥的前台，成为了塔台的核心。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我牢记守护蓝天的使命，欣然接受挑战。记得第一次拿起话筒指挥战斗机的时候，心中满是沉甸甸的责任感。我当过飞行员、连队排长、机关参谋，在军事飞行训练人前幕后的各个岗位流转，真正走向调度中枢，近距离体会组织飞行的严肃紧张，却是首次。通过手心里冒汗的红色话筒报出安全的归航方法，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监控器上的飞机光标，仿佛自己也置身于空域的返航路线上，俯瞰这云海茫茫下的苍茫大地。随着最后一架战机着陆滑回，首次见习指挥在指挥员的帮带下画上了句号。夜航飞行讲评结束，我带着体会一边反思品味，一边走回管制室准备组织复盘。夏季夜空繁星点点，机场的灯光更加绚烂，偶尔降落的民航班机提醒我，时间已经将近晚上12点，但飞行调配的魅力注定将今晚变得漫长。指挥中开车时机的掌握、地面滑行的观察、道面的管制、空域和航线的规划、指挥的用语等每个细节都与整个场次息息相关。从飞行决



王怀民校友在工作岗位上，目迎飞机返航着陆

策的参与者和建议者，转变为飞行指挥的决策者，不仅要求我掌握基本调配数据，还要清楚具体的实施方法；不仅要求我熟悉飞行诸元，还要了解基本的操纵原理，做到求其上，才能得其中，最终达到游刃有余。想到这里，我有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无论多晚结束回来学习讨教也成自觉，把每个场次当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能力的机会。

日晷上日影的转动提醒我们珍惜生命。回首我的青春航迹，我明白事业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永远坎坷不平。我们本都是极其普通的一人，仅仅是凭借了向往蓝天的初心和担当使命的决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投身到一份伟大的事业里，人生才创造出更大价值。是党和国家给了我优异的平台，锻造了我的思考能力、身体素质和综合品质等方方面面，我衷心感谢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个人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中不断激励自己，努力承载起背负的使命。正如清华校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110周年华诞！

从清华园到五道口

○杨绍利（2006级人文）

2011年，正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30周年。在这个历史的交汇点，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五道口金融学院。那年，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校庆日晚上，人潮拥挤，热闹非凡，我在大礼堂观看了校庆晚会直播。一首《瑶族舞曲》的大型管弦合奏，既深情婉转，又热情奔放，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五道口随后也举办了30周年庆典，我也有幸参加，校友云集，精英荟萃，蔚为壮观。也就是在那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签订协议，决定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共同建设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样，我又回到了清华的怀抱。

“夫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转眼近十年过去了，我也早已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回头看，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令人十分怀念；学校给我的滋养，仍然激励着我在生活和工作上继续前进。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学校的生活是安静的。林木茂密，树荫蔽日，听涛园旁边的情人坡一带，以前是民国大师们居住的北院，如今郁郁葱葱。清晨，带上一本书，来到这里，寻一处无人的地方，可以放声背单词、朗读英文，不用担心会吵到谁。春日暖阳里，坡上樱花盛开，随处席地而坐，便觉得自在惬意。旁边的长廊，缠满了紫罗兰，找一石



杨绍利校友

桌，读书或写作业，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有时，我喜欢晚上去水木清华与荷塘月色那一带走走，平复白天忙碌与浮躁的心情。有一次夏夜雨后实习归来，已是夜半，人迹寥寥。我逛至水木清华，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欣赏着水汽弥漫的夜色，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诗意：“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到了冬天，荷叶枯萎，水面结了厚厚的冰。下过雪后，走在冰面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整个校园仿佛都安静下来。

清华的教学楼众多，可以找到许多安静的自习场所。我常去的地方要属三教、六教、新旧水利馆等几个地方。人们从西门进校后，立马会感受到一股清静。一墙之隔，隔去了校园外的车水马龙，也隔去了社会的浮躁喧嚣，可以静下心来，努力吸取知识的营养。清华的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本科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新馆，翻阅人文社科区的藏书，沉浸在柏拉图、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大师的思想中。老馆的氛围也不错，窗棂上布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室内厚重而宽阔的木桌子，显示着它久远的年轮。想象着当年钱钟书、杨绛、曹禺等大师也曾在此学习过，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肃穆的敬意。到了研究生阶段，新建的图书馆对外开放后，环形的室内空间条件更好，自习的地方也更宽敞了。朱熹云：“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学校里无尘世纷扰，正是强化学习、构建知识体系、训练思维方式的大好时机，此谓猛火煮；待毕业后，在工作中应用构建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持续地解决各种问题，则是慢火温。

清华不仅强调读万卷书，也鼓励行万里路。每年暑假，学校都会组织社会实践，进行社会考察，主题自选。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通过实践调查，我们不仅可以运用书本知识分析社会，也可以通过社会活动丰富个人的认识。大一那年暑假，我和一群同学组成实践支队，赴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开展了乡土民俗信仰研究，研究成果后来还获得了学校创新大赛的一个集体奖项，也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研究生第一年暑假，我又随学院支队赴重庆巫山县进行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状况调研。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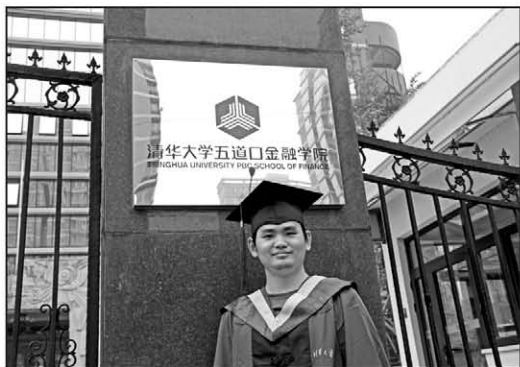
学校的生活既是安静的，也充满活力，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在学校体育馆的墙上，贴着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也深受影响，于

2007年秋季加入了清华大学山野协会，希望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山野协会成立于1994年，是学校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组织，平时带领大家跑步和力量训练，周末则组织队伍去北京周边山区徒步和野营；冬天进行云蒙山桃源仙谷攀冰训练，夏天则赴新疆、四川、西藏等地进行雪山攀登与科学考察。我在山野协会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经历，从一名普通会员，逐渐成为训练部长，担负起日常训练的任务，不仅锻炼了身体、磨砺了意志，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

2008年的夏天，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有幸被选拔进入登山队，和队友们一起攀登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新疆克孜勒峰，可惜未能登顶，带着遗憾下了山。2009年春节期间，我赴四川阿坝州毕棚沟攀登半脊峰，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登顶。2009年夏天，我再次赴新疆，攀登了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慕峰屹立在美丽的帕米尔高原上，是西昆仑山脉的第三高峰，与克孜勒峰隔湖相望，高大巍峨，雄伟壮丽。攀登慕峰的时候，我到达了海拔6820米的C3营地，可惜由于高



杨绍利校友登山途中



在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时留影

原反应，未能继续攀登。不过人生有此经历，亦已足矣。站在雪线之上，一览众山小。远处国境线上的雪山尽在眼底，白云从脚下掠过，那是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我慢慢懂得登山不是去征服雪山，而是征服自己，征服自己内心的脆弱，克服安逸舒适的环境，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去实现它，这不就是攀登人生这座雪山的过程吗？

将精神融入血脉， 成为精神传统的载体

经过一年考研生活，我终于考入五道口。五道口小院位于“宇宙中心”五道口地铁旁边，面积不大，却有“大隐隐于市”的超然之感。并入清华以后，道口小院进行了改造，草坪上铺了石板路，绿荫盎然，更有潺潺流水、小鱼游动。院内十分安静，但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道口自创立之初，就一直秉持实践化的教学方式，设立了财富管理讲座、普惠金融、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等特色课程，聘请业内一线的专家来校授课。因此，我们虽身在校园，却时刻触摸着中国金融业的脉动。同时学院还注重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设立了领导力训练、古诗文欣赏、政治哲学等课程，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高深的课程，如高级宏观经济学、金融资产定价等，其中Ramsy增长模型曾令我十分头痛。在道口小院生活了三年，节奏是忙碌的。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只争朝夕地畅游在金融知识的海洋里，身边也有一群上进的同学，相互砥砺进步；学习之余，则是忙碌的实习生活。

路遥的小说《人生》扉页上写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在清华和道口前后待了八年。从人生的长河来看，这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段。然而这小小的一段，却是我人生中的紧要处。特别是当工作了几年后，再回头来看，重要的不是当初从学校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继承了多少学校的精神传统。其实，每一位清华和道口毕业的学生，都应该将学校的精神融入血脉，使自己成为学校精神传统的载体。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像一粒种子，将这份精神传统播撒在那里，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将事业融入国家、 民族与时代的潮流中去

自创立之初，清华大学的命运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校歌里唱道：“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纪录片《以身许国》中清华园走出的“两弹一星”功勋们，他们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每位清华人都应该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工作中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

□ 迎接清华110华诞

断提升自我，永远精进不息；同时厚德载物，葆有家国情怀，将自己的事业主动融入国家、民族与时代的潮流中去。

在清华的时候，我时常去一教旁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读一读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工作以后，越发觉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性。保持开放的心态，提供专业的意见，坚持职业道德与独立判断，不人云亦云，才能在金融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一部五道口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金融改革史。五道口创始人刘鸿儒以及众多的师兄师姐们，通过自我奋斗，在促进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的五道口精神。作为后来人，我们应当继续保持作为改革先锋的锐气，不骄傲自满，不因循守旧，敢为天下先，引领金融实践。

2021年，清华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道口也将成立40周年。我衷心祝愿母校荟萃天下英才，越办越好！

念奴娇·贺清华110周年校庆

(新声韵)

○高光华(1970届工化)

洪波巨浪，自当有、名校中流砥柱。
水木清华何湛湛，不尽风流人物。大漠沙黄，昆仑叠雪，万丈核花树。荷塘南侧，几多前辈曾驻。

昔日风雨南国，滇池云暗，有凤凰香木。抚剑斜睨天下势，手挽长弓逐鹿。八斗英才，五车名宿，再把雄文著。击栏远望，如诗长卷谁述？

谱写新篇

——纪念清华建校110周年

(新声韵)

○孙道祥(1970届精仪)

健行砥砺数十年，身跻一流勇向前。
校庆百十迈新步，征程世纪更争先。
初心不忘撸袖干，瞄准顶尖书巨篇。
待到期颐建国日，再呈厚礼献忱丹。

书法 ○徐万铮(1958届土木)

求 严 厚 自
实 谨 德 强
创 勤 载 不
新 奋 物 息

一九五八届土木
徐万铮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2020年会议举行

12月3日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0年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作重要视频致辞，祝贺顾问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为此，中国愿继续加强教育和科技国际交流合作，希望各位委员积极为中国发展建言献策。12月4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致辞。她充分肯定委员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教育事业、促进交流合作所作的贡献。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对顾问委员会2020年会议相关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批示，对顾问委员会成立20周年暨2020年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向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以来对学院的进步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共有56位委员参加会议及相关活动，其中海外委员44位，是历届顾问委员会参与委员人数最多的一次。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清

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常振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学院第四任院长钱颖一等中方委员现场参会。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陈元，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等中方委员在线参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2000—2003）、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美国财政部原部长、高盛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顾问委员会第二任主席、L1能源执行主席、bp集团原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等海外委员在线参会。

邱勇主持会议。他在致辞中希望委员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华大学的各项工作，为全球经济管理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改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蒂姆·库克等委员表示愿继续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事业，增进中外相互了解作出贡献。委员们围绕过去一年学院各项工作进展和会议议题展开讨论交流。讨论交流环节由蒂姆·库克委托钱颖一教授主持。本次会议主题为“培育未来领袖——本科教育改革”。会议召开之前，经管学院向各位委员报送了白重恩院长、钟笑寒副院长的院情报告视频。

（经管学院）

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学联合举行 全球创新学院（GIX）在线签约仪式

北京时间12月3日上午，清华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举行全球创新学院（GIX）在线签约仪式。这是继2015年两校开创全球创新学院合作以来签署的第二个五年合作协议。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和华盛顿大学校长安娜·玛丽·科斯出席签约仪式。

邱勇在致辞中表示，五年前，全球创新学院的首个双学位硕士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这在当时对两所学校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今五年过去，两校共同见证了全球创新学院取得的诸多创新成果，他相信，全球创新学院将成为传承百年的事业。他特别向安娜·玛丽·科斯校长过去五年的辛勤工作表达了诚挚的谢意。科斯在致辞中指出，新冠疫情让我们发现，危机和创新是没有学科和地理边界的。因此，我们需要站在全球视角，鼓励创新。

在双方代表的见证下，邱勇与科斯

在线签署了全球创新学院（GIX）合作协议。随后，与会嘉宾们就项目发展情况进行交流。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分享了清华近年来在科学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成就。全球创新学院院长刘云浩表示，全球创新学院最重要的是强调了高等教育再定义的概念，期待未来与更多院系开展合作，开设更多双学位项目，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华盛顿大学代理执行主任施韦塔克·帕特尔回顾了全球创新学院在过去五年中取得的成就。签约仪式由清华大学国际处处长酆金梁主持。全球创新学院首任院长史元春、国际处副处长孟波、全球创新学院副院长饶培伦、全球创新学院副院长完强、华盛顿大学学术项目主任琳达·瓦格纳、华盛顿大学GIX项目临时副主任吉尔·芬特纳等也参加了本次签约仪式。

（龙新力 刘书田）

首届世界慕课大会在我校举行 清华大学担任联盟首届主席单位

12月9日—11日，由清华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世界慕课大会在我校成功举行。11日晚，世界慕课联盟在大会主会议上正式发布成立，《慕课发展北京宣言》同期发布。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并作主旨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尼尼，世界慕课联盟创始主席、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致辞。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出席主会议。

本次大会以“学习革命与高等教育变革”为主题，旨在将全球高校与在线教育平台团结起来，携手应对新冠疫情背景下智能互联网时代对全球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前沿科技在塑造高等教育未来中的作用，共同推动世界范围内慕课与在

线教育的建设、应用和共享，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实现。2020年9月，清华大学作为慕课与在线教育的重要贡献者，面向合作伙伴提出创建世界慕课联盟的倡议，得到世界6大洲14个国家的知名大学与在线教育机构的积极响应。大会联合发布了《慕课发展北京宣言》，面向世界发出关于慕课与在线教育的四项共识——稳定教学秩序、改变教学形态、化危机赢机遇、用教育传播爱，四点主要经验——公平、质量、创新、服务，以及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加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在

线教育开放与共享、以学为中心、规范管理与制定标准等慕课与在线教育发展愿景。

12月9日—10日，世界慕课大会四场分论坛相继举行，与会嘉宾分别围绕“慕课平台推动学习革命”“虚拟仿真：信息技术与教学变革”“慕课资源共享与全球高等教育合作”“慕课：以学习革命推动大学教育变革”等主题畅谈在线教育前沿理念，共话未来发展。来自全球2000余家国际组织、政府机构、高校和在线教育机构的代表和嘉宾，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参加大会。（曲田）

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成功举办 聚焦“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

11月28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发展规划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新阶段 新理念 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有关部门领导和权威专家深入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化各界对于中央关于“十四五”发展的方向和部署的认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向论坛发来书面致辞，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代为宣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朱之鑫，清华大学校长、规划研究院管委会副主任邱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江小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

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伟民，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等有关领导，以及学校领导姜胜耀、王希勤、吉俊民、李一兵、尤政、郑力、向波涛等出席论坛。副校长、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刚主持论坛开幕式。开幕式后，杨伟民、江小涓、王志军、王一鸣、任珑、许惊分别作主旨演讲。下午的论坛以专题讲座形式举行。来自中央财办、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林草局、国家邮政局等国家部委以及部分省市区发展改革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代表、新闻媒体记者朋友，以及清华大学干部、教师等8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规划研究院）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国际大学生 超级计算机竞赛 SC20 总冠军

11月20日凌晨，2020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SC20）总决赛结果公布，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组建的学生超算团队夺得总冠军，同时取得LINPACK基准测试最高性能奖，获得双料冠军。这也是清华在SC竞赛中首次夺得三连冠。

受疫情影响，本次竞赛改为线上举办。新规则要求各参赛队伍在3700美元的云计算预算限制下，在组委会提供的云计算平台中自行选取机器配置搭建计算集群系统。本次现场决赛共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19支队伍参赛。代表清华参加此次比赛的队伍是由6名来自计算机系的本科生组成，包括：张晨（计71）、陈嘉杰（计72）、王雨田（计73）、钟国鑫（计71）、宋泽宇（计84）、翟明书（计82），指导教师为计算机系副教授翟季冬、助理研究员韩文毅和助理研究员甘霖。学生超算团队成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凭借综合能力、现场发挥和资源调度获得总冠军。

（计算机系）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成果发布会召开

11月2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成果发布会首次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新址召开。由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西书局和“学堂在线”合作，开启了清华简整理报告发布会全球直播。线上近4500人次观看发布会，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通过“学堂在线”平台全程观看了发布会。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皆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四告》，这是清华简整理团队自《尹诰》《说命》《摄命》等篇之后，又一次整理发布的书类文献。《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记载的是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篇告辞。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立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

“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鸛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四篇告辞各自独立，依时代为序，体现了书类文献的编纂特点。发布会上，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孟延春副处长对清华简整理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社长秦志华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的编辑、出版情况。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三位青年教师程浩、石小力、贾连翔对五种文献分别进行了解读。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则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的研究整理情况，并回答了线上线下与会学者、记者的提问。

（出土文献中心）

我在清华走上革命道路

○李京华（1950届法律）



李京华学长夫妇近照

我叫李京华，现年94岁，云南昆明人。我是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法学系学习。

我本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在昆明昆华中学高中学习期间，我的国文老师是闻一多先生，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杀害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也使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考入清华大学以后，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党组织让我跟解放军一起入城，去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当时军管会的领导

是叶剑英同志。报到后，我被编入周仁小组，去接管东单区政府。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为新中国首都建设所做的工作。

解放初期，工作头绪多，干部很少，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先后干过东单区人民政府法庭审判员、东单区公安局第14派出所所长、东单区工会办公室主任等工作。后来各行各业建立工会，工会干部缺乏，我被调到市工会干部学校做工会干部培训工作。之后，市工会又开办了职工大学，我又当了几年大学校长，直到1988年我62岁离休。

我是1949年2月受组织派遣进城参加工作的，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后来清华给我补发了毕业证书。我是在清华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同母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年来，无论在哪里遇到清华校友，我都会感到非常亲切。我没有想到在燕达养护中心会遇到这么多清华校友，真是太好了。我衷心祝愿校友们健康长寿，生活快乐！祝福母校越办越好！

本文是李京华学长在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清华校友联谊会上的发言。



参加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清华校友联谊会的校友合影

50年岁月半世情

——说说我们的水工02班

○李仲奎 傅耀良 张学学（1970届水利）



1970年2月水工02班毕业照

1964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共和国已经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处处欣欣向荣，行行蒸蒸日上，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喜庆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就在这一年9月初，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1位同学，包括8位女同学和23位男同学，迎着二校门身后“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的巨型横幅，走进了日思梦想的清华园，组成了我们水工02这个团结友爱、积极进取的班集体。1963年8月华夏大地尤其华北地区的特大水灾，让这一年以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的学子增加不少。

风云不测，人生无常。虽然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这一届同学都只

上了不到两年的大学课程，就被卷入到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之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是当年用来描述我们此后三年半的大学历程的主旋律。1970年3月，我们以五年半的特定学制毕业，带着继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任务离开校园走入社会，被分配到各个单位。迎着未知的命运，开始了人生的独立前行。大家离开清华园

时，没有即将走上新单位的欢乐，只有依依惜别的泪水。

为了我们水工02班毕业50周年的聚会，去年8月就召开了返校筹备会。除了计划乘邮轮、出纪念册、参加学校校庆活动外，还有一项重要决议就是：50年聚会时要做到所有在世的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全班同学中，有一位由于工作调动联系不便，毕业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们发动班里同学多方查找，上网搜索、查询档案、找老家同乡、寻隔代亲友，终于联系到这位50年从未谋面的杨裕庭同学。当他的照片和信息出现在班微信群里时，全班同学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今年的疫情，原来的准备工作都泡了汤。但这些日子里，全班同学可以通过网络聚会，微信聊

天，发送老照片。回忆悲喜事，亦岂非乐事乎！

回首清华园中的班集体

很可惜我们班没有一张入学时的合影，这里只能看到我们的毕业照。“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奔向广阔天地前最响亮的口号。与同学们合影的也不是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而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和师傅们。但从我们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的意义来说，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班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才女张雪梅同学手中捧着的，是毛主席送给宣传队的“芒果”模型。这个场景也是那个时代的全方位的注释，值得我们永久记忆和珍视。

入学后，在1964年9月11日晚上，学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清华大学1964年新生入学典礼”，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老校长作报告，强调“四好”（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劳动好）是我们在校学生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又以“猎枪与干粮”的比喻教导我们深入理解清华大学学生的学习理念。德高望重的马约翰教授向新生们强调了健身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健身方法。这都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成为我们人生之路上永远的路标。

入校后，我们就认真学习蒋南翔校长“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开展红专大辩论，端正对红与专关系的认识。9月24日，当年“水利系‘三宝’（徐葆耕、谢宝栋、陈宝瑜）”榜首徐葆耕老师，带我们到圆明园上政治课，激励同学们的爱国情怀。进校之后，不少同学积极改造思想，要求进步，纷纷提出入团、入党

申请。

在学习方面，来自吉林的张学学同学，高考成绩全系新生第一，任02班学习委员。刚入学不久，他就在参加全校新生计算尺技能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还得到一把高级计算尺的奖励，令人羡慕。张学学、李常莲、吕福泉等同学还提前通过了一外考试，开始学习二外。他们都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人物。

体育方面最牛的是，在第一学期的新生运动会上，我们班来自安徽的郑继祖同学奋勇争先，一举拿下了分量最重的男子百米冠军。爱打篮球的傅耀良同学在中长跑项目上也多次取得好成绩。在他们的影响下，全班有几乎近半数同学参加了校系各种运动队，其中参加学校代表队的同学有：短跑队郑继祖，中长跑二队傅耀良、黄祖英，游泳二队何宇平、李常莲，自行车队杨之媛，射击队李庆贞；参加水利系代表队的有：中长跑队刘德义、杨裕庭，航海队胡汉穉，射击队朱小同、张雪梅。

响应学校的要求，全面发展成了全班同学的努力方向。入学第一学期，学校提倡结合专业特点上体育课。我们水利系同学，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在大冬天进入西大操场游泳馆学习游泳的机会。班上体育锻炼的氛围很浓，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都走出教室，聚集在西大操场，参加各类体育项目。航海队的胡汉穉在固定的铁架子上练习“划船”；喜欢体操的同学则常到游泳馆西边的体操馆里锻炼；单双杠动作至少到了二级运动员水平的林大炎同学，一次练双杠时竟然“雄心大作”冲击起一级动作来，不料却失手伤了无名指。喜欢跑越野的同学常在体育委员刘德义的带领下，选择去体育学院的路边，或圆明园中

□ 值年园地

起伏曲折的林间小路上跑步。那时的圆明园没有围墙，当然进去也不用买门票。

热爱艺术的和有专长的同学，则进入了学校文艺社团和宣传部门。班里能歌善舞的美女邱心伟同学一入学就被拉进文艺社团，在女生表演唱组成了主角，她不但演技一流，而且擅长导演。班里几次聚会活动就是由她参与指挥的。中学就自学了高等数学的张进平同学参加了学校小提琴队，遇上数学课时，我们就待在宿舍里蹭他的“歪脖拉”。毕业后他还曾被专业团体请去拉琴为样板戏伴奏。李庆贞同学在小学就是天津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播音员，还参加过天津国庆游行的现场直播，进校后则成为学校广播台的著名播音员。每天一到锻炼时间，她那甜美纯正的声音，就飘荡在清华园，陪伴着进行强身健体的清华学子。

毕业之前三年半的动乱，使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任何专业课程，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毕业之前，我们就比较多地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工农兵，经受了实践锻炼。班里同学都参加了昌平第三工程兵学院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体验了严酷的军事生活；参加了昌平响潭水库供水管线工



水工0字班女同学在河南三门峡大坝前的留影，右1为杨之媛

程的施工，在三九严寒中抡镐挥锹，开山凿石；参加了顺义高丽营村的农田建设，推车施肥，夯基盖房，卧土炕，睡通铺，听老贫农忆苦思甜，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毕业前的最后半年多，按照周总理对水利系的指示，我们又随系赴千里之外的三门峡水电站，参加水电站枢纽的改建工作。有的同学在冰冷的帐篷里做水力学模型试验，有的同学在大坝下潮湿的廊道里做原型观测；木工班的同学在四五十米高的进水口脚手架上，像猴子一样地攀上爬下；混凝土班的同学则浑身泥水，怀抱百斤风钻，震得双臂发麻，一个个顶风冒雪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班里的八位“巾帼女将”，干起脏活累活一点不输给男生。被尊称为“老大”的杨之媛同学，更是冲在前，干在前，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三门峡，全班同学还参加了到灵宝县百里行军拉练。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7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班九位同学和00字班两位女同学，不知天高地厚，竟利用工地放假，一大早黑灯瞎火地离开驻地，跨黄河、赴晋南，顶风雪、战严寒，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数十里，去征服中条山南麓高耸入云的锥子峰！

看看我们这五年半的经历，也够精彩的吧！

结束了半年多三门峡的工地生活，1970年2月13日我们回到了清华园。16日上午参加“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动员大会”，下午系里公布学习班计划安排。3月11日下午系里正式公布毕业分配结果，31位同学分到全国14个地区。从此，同学们依依惜别，各奔未知的前程。

五十年蹉跎岁月 难忘的清华情结

有人说“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也并非都是玩笑话。无论走到哪里，清华人都从未向命运低头，清华人的自强精神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毕业后几十年的风雨蹉跎，大家没有忘记母校老师的教诲，没有忘记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

我们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被分配到农场、工厂、工地当普通劳动力使用的难忘经历。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甚至七八年。但是02班中每个同学都没有自暴自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即使在普通的生产岗位上，艰苦脏累的体力劳动中，同学们也都能迅速掌握劳动技能，显露头角，不少人很快就由工人升为工长、技术员、技术负责人。更何况六年之后终于拨乱反正，为清华学子们打开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更给大家提供了进一步深造、发挥聪明才智的机遇和舞台。

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我们班31个人中，就有张进平、何宇平、俞铭华、林大炎、陈乃祥等8人在高校或研究院所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张雪梅、邱心伟同学曾远赴国外访问、进修或工作。汪大培、李仲奎、张学学等三人还分别于1987、1990、1991年在加拿大、奥地利、德国获得“洋博士”学位。李、张二位同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科研条件，立即回到了清华。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清华情结。

移居加拿大的汪大培同学和在美国的何宇平同学，虽身居海外，仍心系祖国和母校。曾任加拿大渥太华清华校友会会长

的汪大培，在任期间就率团回清华，就环境治理问题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经过不懈努力奋斗，很多同学都成为全国各地和各行业的领导者或技术骨干。例如，孙忠仁担任了大型国企中国航空建设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苗振达担任了江苏沛县计经委主任；朱小同担任了福建福鼎市政协副主席和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福泉担任了安徽淮南化学工程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郑继祖担任了淮南市二建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春芳在广东台山大江建筑工程公司担任了总工程师；胡汉穉曾任西北电建四公司科技室主任，以及江苏利港火电站技术总监；刘德义担任了河北保定市污水处理厂厂长等。02班第一任团支书李秀芬同学，历经28年的努力，实现了她入党的人生愿望，虽然48岁就办理了退休，但通过努力成为了经济师，几十年来进行了几百项工程预算的评审，为国家节约预算上亿元。

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但大家的凝聚力却越来越大，过去因不同观点造成的摩擦和隔阂也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和融洽。全班同学相互关心、互相爱护，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东北大汉、班里外号“刘大傻”的刘宗胤同学，毕业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班里张进平、黄祖英等同学在他病重期间，自发地为他治病组织了捐款。王世国同学是我们班第一任老班长，毕业40年聚会时因病未能回校。大家听说他的困难后就主动发起捐款，并选派陈乃祥、李仲奎、李秀芬三人前往他的家乡河南新乡，到医院把几万元善款送到他的病床前，鼓励他战胜病魔，

□ 值年园地

回清华参加百年校庆。后来同学们又先后多次为他捐助，帮助他的家庭克服困难，直到他不幸离世。

退休之后，同学们越发思念大学期间的同窗情谊。近十几年来，无锡的太湖边、武汉的岳阳楼、厦门的鼓浪屿、福鼎的太姥山……到处都留下了同学们欢乐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

回顾这50年，水工02班虽没有高官，但仍可以说是群星闪烁。31个人中，除留居国外的两位同学外，7位具有正高级职称，其余同学都具有副高级职称。有三位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三位获得带“国”字头的奖励或表彰：陈乃祥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朱小同获得过新中国70年国家荣誉纪念章，李仲奎获得过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获得省部级、市县级、行业 and 单位奖励的，至少有几十项，难以一一列举。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班两位女同学张雪梅和李庆贞远比所有男同学更为突出，她们产学研相结合，办起了公司。张雪梅是北京清华华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她通过在国内深造，成为液压传动控制设备方面的专家，为中国制造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穿针引线、



水工02班毕业30年在新水利馆前合影

添砖加瓦。李庆贞曾任江苏镇江华普监理公司的首任法人代表，虽已年过古稀，但退而不休，仍被公司回聘担任要职。他们让各位男同学不得不服。

五十多年来，水工02班大多数同学都是甘于奉献，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数十年，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例如龚伯元一直在家乡江苏启东市建筑设计院做土建工程设计，退了休还在主持审图，帮助年轻技术人员成长。黄祖英在条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13年，回京后到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任职，1985年参加了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筹备、组织和评审工作；八五期间，参加了科技部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的组织管理和评审工作；退休后还参与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的管理。李常莲在西南大学物理学院做了一辈子“教书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杨裕庭在佛山高级技工学校、傅耀良在无锡高等师范学校等单位，安心从事中等教育的工作，成为教学骨干和领头羊。傅耀良还获得过教育部“曾宪梓奖”。他们都达到了自己所在行业、领域和部门的高峰，工作做到了极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正如我班邱心伟同学在纪念册中所说，我们“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我们大多数“没当大官、没发大财”，然而在丰富的经历中，也没有给清华丢过脸，没有忘记自己是“清华人”。

至今，水工02班大部分同学已经完成“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目标。在母校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母校的深情与挚爱，感谢母校的培养造就之恩。

2020年9月28日

践行清华精神 追求身心健康

○罗建北（1970届自控）



罗建北
学 长

中学时代的六年，我是在北京女一中度过的。女一中校园内只有一个泥土地面的小操场，没有跑道，边上有两个沙坑，一个跳高、一个跳远。体育课要是跑步、投手榴弹就得去故宫筒子河边儿上练。所以我上中学时既没有锻炼身体的习惯，也没有任何体育特长。

1964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看到大学操场之大，尤其是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操场上热火朝天的锻炼场面，感到与中学的差别也太大了！第一节体育课是在体育馆参观清华体育方面的展览，我们看到了蒋南翔校长给清华同学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在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文中论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把身体比喻成“车”和“舍”，真是太形象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看到许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长的事迹，其中

运动健将就有好几位。那节课让我们知道了清华十分重视体育。

我虽然没有什么体育特长，但还是积极报名参加新生运动会，我参加了铅球项目的比赛。入学半年后，辅导员通知我不用上体育课了，去田径队的投掷队参加训练。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成绩一般般，怎么能进体育代表队呢？到了队里才明白，那一年女队的铅球和铁饼队员有点“青黄不接”，我是作为培养对象给选上的。

1965年寒假后，我开始每天下午在体育馆和西大操场参加体育代表队的训练。1965年代表队和全国运动员一样，遵从的是“三从一大”的竞技体育训练原则，即：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根据我们队的项目特点和每个人的条件，教练为每位队员制定体能训练计划。力量和速度训练时，有杠铃（上举、下蹲）、仰卧起坐、俯卧撑、高抬腿跑、加速跑和低跳（从低处往高处跳）等，这些练习一做就是好几组，我们经常练得趴下就起不来了。我们队的不少队员是从农村来的同学，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吃苦耐劳的精神，队长段有义不仅以身作则刻苦训练，还帮助和鼓励我们这些新队员。记得我们在西大操场的南边场地练铅球时，时任体育教研组主任的夏翔先生经常来给我们讲解、示范动作。先生相当专业的示范动作至今还历历在目，后来才知道夏先生曾任投掷队的教练。

1965年暑假后，00字班入学了，我们

□ 值年园地

女队增添了三员大将，北京的孙仁先、张立云和上海的史庭宁。她们三位的铅球成绩都特别好，队里就安排我只练铁饼了。掷铁饼比起推铅球技术性更强一些，因为中学时没有掷铁饼这个项目，技术上我完全是从零学起，加上力量和速度又都不行，就更要虚心学习和刻苦训练了。到了1966年4月的校运会，我们女子铅球铁饼组新队员的成绩都有了进步，尤其是孙仁先还破了铅球校纪录；我在比赛中最后一投投得特别顺，竟在原来成绩基础上提高了4米，这使我练好项目的信心大增。

1965年9月开学后，我搬到了体育代表队宿舍。队友们来自不同的系、不同的年级，每天吃饭在一起，训练也在一起，之间的友情日益加深。我和光9的周鲁生睡上下铺，她个子高非让我睡下床。周鲁生比我高一年级却比我小一岁，因为是老队员，就在生活、思想上处处关心照顾我，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发7的王宝珍学姐带我练铁饼，她不仅在训练中给我做示范、讲解要领，每次掷完铁饼总用她那又软又热乎的手捂着我的手，至今还记得那暖暖的关爱。机械系0字班的林国息同学是与我同年进队的，他年龄稍大一些，个子又高，总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们，“文革”中在学校即将发生武斗的前夕，是他冒着危险推着自行车帮助我把行李送回家的，至今想起来依然很感激。

“文革”结束不久，投掷队队友之间就恢复了联系，所以每年校庆我除了与系里同学聚会外，也经常与队友团聚。

2004年纪念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50周年时，学校要出文集和通讯录，孙仁先同学通过到校档案馆、校友总会查询，以及联系老队员等多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收集信息，整理出一份通讯录，包含了从1951年入学机械系的雷璧芬学姐，一直到1965年入学电机系的汤桂森学妹等108名队友的信息。当一些老队友看到通讯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时都很激动，勾起了他们对清华、对体育代表队的美好回忆。我在体育代表队时间不长，但是在代表队养成的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以及自信心的增强等让我一直受益。

1970年毕业后，我留校在计算机系工作了21年。在这21年中，我一直“双肩挑”，当过班主任、辅导员，也担任过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党委书记。在学生工作中，我一直认为体育工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计算机系学生入学分数较高，可有些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不理想，每年都有因为身体原因病退和病休的同学，甚至于有一段时间系里每年都有一两位同学心理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学生工作班子



1966年4月24日校运会后，投掷队全体队员合影。后排左1为罗建北学长

认识到，要提高同学整体身体素质，做到身心健康，就必须落实每天的体育运动时间，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提到系里的体育工作，就不能不说到体育教研组的刘儒义老师。“文革”后，刘老师担任学校“群体工作组”组长，并一直负责我们系的同学体育辅导工作，给计算机系学生上体育课。刘老师非常热爱体育工作，对学生关爱备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同学们入校后要进行体能测试，然后按成绩分成A、B、C三组。刘老师就制定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计划。

C组这头，刘老师课上重点加强对体弱同学的辅导，课后还监督他们完成锻炼周日志，并允许C组同学在体育科目不及格时，可以多次补考，这大大激发了同学锻炼的积极性。在刘老师的热心推动下，计算机系同学每天坚持锻炼的人数越来越多。经过持久的强化锻炼，同学们的体质、运动成绩和意志品质都有所提高。有一次清华与周边几个学校在林学院测试学生体能，每校任选一个班的10名同学，其中6名男生、4名女生，跑接力，男生每人1000米，女生每人800米。清华选派的是计算机系一个班同学，测试中，计算机系的同学遥遥领先，受到了兄弟院校老师的赞许。计算机系同学在刘老师带领下，从1982—1991年，班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率达到了96%，优秀率也有所提高。

1993年，根据多年工作的经验，刘老师认为计算机系学生长时间在电脑前学习、工作，应该对体能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了每一个学生必须通过3000米测试的试点计划：3000米不达标，体育成绩就不及格，而体育成绩不及格就毕不了业。

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目标，但是我们都知道，跑步是清华的传统项目，许多学生因坚持长跑强壮了体魄，有的还治好了神经衰弱。马约翰先生就曾经说过，你睡不着觉，就去操场跑步吧！计算机系同学的体质也确实需要加强，我们系里全力支持他的试点工作。刘老师是清华“强迫运动的传承者”，为了监督同学完成3000米跑步，他就坐在跑道边的裁判高凳上给同学数圈数，谁也不许偷懒儿，更不能作弊少跑圈。1993级新生试点3000米达标项目后，体质普遍得到了提高，同学们在总结中说，坚持3000米长跑后，体力增强了，精力充沛了，睡眠好了，感冒少了！1994年，计算机系1993级同学暑期军训6周，在拉练10公里时，他们精神抖擞地把其他系的同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之后又主动请战增加了5公里的“奔袭”。辅导员邓俊辉老师说，同学们这是“平日苦练3000米，拉练途中逞英豪！”

对体能相对好的A组同学，刘老师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精心选择适合的项目进行训练，鼓励这些同学积极报名参加校运会比赛。他说，在校运会参赛的同学多了，取得好成绩的同学就会增加，计算机系的名次提升了，就会激励全系同学的集体荣誉感，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在招生时，我们也注意招取品学兼优、体育成绩好的新生。从1986年起的10年间，我担任了清华招办北京招生联络组的组长，每年招生季都要去北京重点中学了解考生情况，就特别留意有体育特长的优秀学生。当年与我们计算机系在招生上较劲的是无线电系和自动化系，这种较劲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关系很大。无线电系的陈德才老师是经常坐在跑道边上看学生

□ 值年园地

锻炼的，就知道他对学生运动员和学生体育锻炼有多重视了：自动化系有系主任王森老师在后面坐阵，李军等人在前面冲，在招生方面自然很有竞争力。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87年我们了解到北京四中高三年级的谢东同学不仅品学兼优，还有短跑特长，我和系学生组的老师就去他家里拜访，给他和家长详尽介绍计算机系，希望他能报考。虽然谢东同学最终报的是自动化系，但我们并不后悔当初的努力。

我们系在学校代表队的同学不多，但是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在全校运动会上，从1986年的倒数第三名跃升为1991年的团体总分第三名。1991年校运会入场式上，因为计算机系运动员的队伍队列整齐、朝气蓬勃，又代表学校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的入场式，受到兄弟院系一致好评。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积极参加教工工会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如太极拳、健美操等。体育教研组的陈蒂侨老师不仅业务水平高，而且特别善于学习，紧跟时代潮流，几乎每年为教工工会会员编排一套新的健美操，每年教工运动会都有健美操表演。我们工会健美操队每年代表清华参加比赛，由于陈老师健美操编排得好，队员表演得认真，总能取得好名次。在健美操队我还结识了同样热爱体育运动、热心服务大家的于在斌、和代等老师。我们跟着陈老师练健美操不仅锻炼了身体，愉悦了心情，还学习了陈老师对体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

2005年我60岁了，为了保持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开始练习瑜伽，每周在东门外的青鸟健身上三四节瑜伽团课。在练习中，我不跟别人比，不追求高难动作，但

是必须认真，要不断进步。坚持了八年的瑜伽练习使我保持了身心健康。

2013年，我老伴戴一奇老师刚退休就检查出了直肠癌，这突如其来的恶性肿瘤一下子把我们打蒙了。在暂短的恐惧之后，我们选择了冷静、勇敢地面对。由于直肠原发癌和肺部三次转移病灶，戴老师经历了癌症的传统治疗，即两次手术、一个疗程化疗、三个疗程放疗。每一次治疗都是痛苦的经历，每出现一次转移都是巨大的煎熬。然而，最最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清华医学院的张明徽老师，从2017年5月开始戴老师进行了张老师的NKT细胞免疫治疗。NKT治疗没有痛苦，戴老师身体里的癌细胞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抑制，至今三年半再也没有出现过转移病灶。张老师治疗主张“科技+人文”的理念，他首先让我们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及对NKT的信任，并说得病一定是有原因的，“小病，小提醒；大病，大提醒”。据此，我们检讨了以往的不良生活、饮食习惯，选择几种适合的锻炼方法，如八段锦、冥想，等等。戴老师正向积极的生活态度，使NKT的治疗十分有效。戴老师在毕业50周年之际能够保持健康、有质量的生活状态，我们在感恩张老师和他团队尽心付出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拥有良好的心态和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是战胜疾病的良方。

2020年是1970届两个年级（1964年入学、1965年入学）毕业50周年，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也是幸运、幸福的一代人。2021年是清华建校110周年，庆祝建校110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110年来清华师生铸就的清华精神，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发扬光大。

我们的峥嵘岁月

○高红卫（1976级精仪）



高红卫学长

从1977年年初踏进清华园大门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44个年头。以这44年作为一根历史的线索，可以大致勾勒出我们作为一群最普通的清华人，在这个激荡、传奇的年代里，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工作、磨练与奋斗的峥嵘岁月。

十几岁时我们扔下课本，上山下乡或者回乡务农，立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以为这样就可解放全人类，那时的我们真的很年轻。作为农民，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伴风云雨露，晚上看斗转星移，我们很羡慕国家职工星期天可以休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在懵懵懂懂的劳作过程中，我们强健了体魄，学会了农活，还真切地体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广博深厚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的国情底色——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农业真落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对于50年后“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虽然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作出

判断：如果农业、农村、农民远离现代化，中国将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是50年前，身在其中的我们并没有能力作出这个判断，当时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的“美好生活”，并不清楚工业化是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不过，这也为我们客观比对和理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本质含义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基本参照系。

1977年初，我们离开田野山川，打点行装回到校园课堂，重拾书本，咬文嚼字，推演公式，瞬间从年轻回到年少。当坐着校车进入清华南门时，围墙上挂着一个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当时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终于有机会成为同龄人中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极少数，忐忑的是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拿到毕业证，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很多人在中学阶段的课程学习是不系统、不扎实的。好在清华大学的时任领导有针对性地制订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案，老师们不辞劳苦编写了大量应急的教材。当时教材奇缺，尤其是专业课教材，基本上都是老师们手刻油印的；专业基础课的教材也以本校编印的教材为主。老师们以真挚的热情和高超的教学能力，帮助我们完成了学业。

我所学的专业是“导航仪器与自动控制”，但入学时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导航仪器和自动控制的观念没有基本的认知。我

□ 值年园地

清楚地记得，正式上课之前学校特意组织我们到首都机场观摩民航飞机的驾驶舱，使得我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老师们坦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要想解放全人类，首先得解放我们自己。中国自身首先得富强起来，为此我们需要在科技创新和工业基础领域奋力追赶。

之后，学校组织我们去北海舰队新型驱逐舰上实习，去航空工业青云仪器厂实习，去航天工业558厂（现航天科工集团33所）实习。在实习过程中，部队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复强调“在许多方面我们技不如人”，他们的感叹深深地刺痛着立志成为这个领域未来工程师的年轻心灵。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强烈的内在动力相结合，奠定了我们负重前行、刻苦学习的坚实基础。

就在我们入学一年之后，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两个重要政治判断。这不仅吹皱了我国开启科技创新促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一池春水，也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化建设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献身科技，崇尚实干。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这注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作为学生的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清华人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强音，不仅成为当时的社会流行语，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行动座右铭。

短暂的大学时光里，我们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工业革命以来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教育，参加了基本技能

训练，学到了知识和方法，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从农业文明的认识境界、知识结构层次，提升到工业文明的认识境界和知识结构层次，丰富和完善了我们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我从心底里感谢知识渊博、诲人不倦、厚德载物、恩重如山的清华老师们，感谢学校各级领导和教职员。

1980年年底，我们踌躇满志地跨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启了峥嵘岁月的新征程。在之后的40年时光里，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经历了令人回味的人生起伏。

由于所处的时代快速而且剧烈地变迁着，我们这群人不仅经历了“文革”动荡的折腾，还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传统观念与西方现代观念巨大差异的调整，以及各种截然不同社会思潮的反复冲击，不断卸载又重新加载各种认知信息包，在不知所措中努力地、持续地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以便跟上时代潮流。可以说，在我们经历的峥嵘岁月中，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过程充满滔天巨浪，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所能激起的也只能是一些微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群中，虽然少有掀起波涛巨浪者，但是我们激起的一个个微澜，也为不断推高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巨浪贡献了能量。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告慰母校，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和国家的期待，我们也问心无愧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所做的努力与拼搏，尽管努力和拼搏的结果并不能令我们自己满意。

清华人不尚空谈、厚德载物的基因，努力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不怕挫折、凡

事较真、追求卓越的处世态度，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理念之中，不管我们身处逆境、顺境，不管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这些清华精神背后的哲学指南，无时不在指引着我们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的大方向。

现在我们大多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多数人卸下了工作的责任和事业的压力，我们好像再次年轻了。在这个时事多变的时代，经常需要换赛道“重新活一次”，我们也不例外。与时代同步，积蓄正能量，释放正能量，传播正能量，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最后的微薄贡献，成为我们换赛道后的主要使命。在日常琐碎

生活中，除了要扮演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角色外，言传身教“四个自信”，又成为我们谱写峥嵘岁月篇章的新内涵。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四个自信”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持续传承践行，我们不应该缺位。同时，保持身心健康，为儿女分担家庭事务，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帮忙而不添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梦永远在远方，路一直在脚下。只要能跟上时代步伐，我们将永远年轻。让我们整理行装再出发，以积极阳光的心态，走过一个又一个峥嵘岁月！

2020年12月

自强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

○唐晓明（1985级电机）



唐晓明
学长

1990—2020，我已从清华毕业30年，这是中国腾飞的30年，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30年。

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全程见证和深度参与了从封闭落后到日益繁荣富强的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40年，深刻体会了中国之于世界、世界之于中国关系的演变历程。

从清华电机系毕业后的30年中，我曾

在深圳供电局供职两年三个月从事专业工作；后来服务于华为公司长达24年。毕业后回清华的次数并不算多，除2010年毕业20年校庆外，还有三次是代表华为公司到清华做毕业生招聘宣讲，再有就是陪家人、孩子到清华参观了。

毕业30周年的契机，促使我回忆思考清华对于我们个人成长的意义。1985年，我们怀着最美好的憧憬从五湖四海走入清华园。入学之初的体会是最为深刻的，中学阶段习惯了当“第一”的我们，到清华后大多不再是“第一”。记得入学后学校组织英语摸底测试，英语高考成绩“96+8”的我一上来就蒙圈了：第一部分听力，老师的录音机里说了啥我基本都听不懂。看到很多同学已经开始答题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蒙。我想，这种精英荟萃的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尖子生”是一个特

□ 值年园地

别的心智锻炼成长课，使我们能兼具理想与理性、自信与自知。

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而造就百年清华人文荟萃，博大精深。我们在清华的学习过程中感受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塑造着自己的价值观，建构着自我认知。初入清华时，有老师问大家：“假如有100万，你准备怎么办？”记得同学们的回答中大多要“开企业”“办学校”。清华让我们知道，世界很大，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必当脚踏实地，自强不息，行胜于言。

清华学子的底色是拼搏与奋进，教室、实验室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清华的学习生活是单调的，一教二教三教四教五教，电机系馆，各类实验室，一号楼四楼宿舍，还有六食堂五食堂，我们用自行车把他们编织成了日常的主线。那时，同学们觉得高考虽苦，但清华五年更苦、更持久，我们在“单调”中学会了平实与坚韧。

清华师长们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耳濡目染，带给了我们科学的精神、乐观的态度，以及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犹记得，工程制图课上，我们是从铅笔的选用和削笔开始了一笔一划地制图，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不断进步，最后我们大都“惊艳”于各自的“作品”。我们不曾想到，原来工程图纸也是可以充满美感的。也记得，毕业设计期间我得到了指导老师黄益庄教授和刘建政教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我对课程设计过程中取得的一个个小进展感到兴奋，整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清华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的，我们是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春天的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荷塘月色、水木清华、清华学堂、大礼堂、二校门、工字厅、近春园，以及隔壁的圆明园，还有北大等兄弟院校邻居，都记录着我们青春的印记，各种社团活动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还记得在校期间，班主任童陆园教授、辅导员宋六根，时常会组织大家到男生宿舍开班会，聊家常，送温暖；倪以信教授曾代表电机系到宿舍与我们亲切交流，激励大家奋发努力。学校和师长的关怀，让同学们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让我们体魄强健。当每天下午4:30的广播响起，就像战斗的号角吹响，驱动我们到西大操场挥洒汗水和豪情，我曾获得全班体育成绩最高分99分。在校五年，我天天打篮球，从未间断。毕业后30年间我也一直保持运动的习惯，身体状态始终良好。

清华给了我们站在高处看世界的眼光，让我们能在纷繁变幻的现象中看到方向，在面临事业和生活的一道道选择题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所有这一切让我们面对工作挑战时充满信心，百折不挠。

在终生学习日益成为“必须”的时代，清华的学习经历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使我能够在1995年入职华为公司后，很快适应从电力向通信行业转变的挑战，适应从技术到营销、管理岗位变化的挑战，适应从“机关”到拉美、欧洲、中国区再到“机关”工作环境变化的挑战，使我能充分投入到华为发展的各关键阶段，并赢得关键性胜利。

我是电机系发52班级的一员，从昆明初入校园，我甚至不好意思开口说普通

话。在珍贵的集体生活过程中，我们朝夕相处，磨练了性格，收获了成长，懂得了合作。大学同窗的友谊也成为走上社会后相互激励、扶持、陪伴成长的驱动力。比如，是发51的夏健同学把我“忽悠”到的华为，我们一直是最好的同事和朋友。在清华，我们有幸遇到太多的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同学，还有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大师和遍布世界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这是我们人生莫大的财富。

邱勇校长在最近致辞中强调：“自强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保持奋进的姿态！”我们对此深以为然。

3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已从青葱少年进入人生“下半场”，我们距离“为祖国

健康工作50年”尚有很大差距，吾辈当再接再厉，不负清华，不负青春。我们有理由对过去的30年“满足”，对现在“满意”，更对未来“满怀希望”。

我由衷地感恩清华的悉心培养，并向母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愿清华，祝愿祖国，祝愿世界更美好！ 2020年4月19日

唐晓明，1995年加入华为公司，曾任欧洲片区副总裁、中国区常务副总裁、全球销售与客户群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在华为任职24年间，是华为公司从小到大、从国内到海外、从跟随到全球领先发展历程的重要贡献者。现任华为公司高级顾问、华为大学教授。

三十而立

○王川（1986级美院）



2020年1月，王川在个人摄影展开幕式上致辞

有些事情要想明白，好像还非得30年不可。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和事以及关于他们的回忆，其中有些已被时间消弭变得模糊，但另有一些却因岁

月的磨洗反而绽出更加生动的光泽。2020年，对于1990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我来说，此时的感觉刚好就是这样。

都说三十而立，这要看怎么说了。反正现在看来30岁那时候，我离找到北好像还差着那么一截子，尽管当时自己觉得很有方向。然而今天，如若是以毕业为起点而论的话，我大致可以确定自己是走在向北的路上。

虽然不想太过宿命和矫情，但一回头这30年里的各种因缘际会，诸多机缘巧合和各种磕磕绊绊却也让我唏嘘。1990年毕业后，我逐渐发觉在书籍艺术的专业范畴里，自己更偏插图而不是设计，所以1992年进入少儿社后，成天画儿童插图觉得舒

□ 值年园地

服得不行，于是就想一辈子干这个倒也不错。之后，也当真干了十多年。然而，由于在1987年下乡前不留神着了照相机的道，逐渐开始迷上摄影再也无力收手，所以在1998年决定去读个研，非要把它整个明白。2000年前后，随着最后一本儿童画（现在更时髦的名字叫“绘本”）脱手，这画笔一放就是16年。

1986年我终究没去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而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但我却在2000年兜了个大圈子之后就职于中央美术学院，花了七年时间建设摄影专业。我曾诸事被动，认定一技傍身走一步说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却因学了摄影变得越来越看重数字、认可预想依靠计划，最后阴差阳错地做起了中央美院的学院规划。2018年，来访的格拉斯哥美术学院新院长问我，怎么他们学校战略规划的负责人也是搞摄影的，站在那我愣了半天。

我曾被很多人认定会是第一批往国外跑的人。读本科时看着那些进口画册也确实觉得眼花缭乱心向往之，恨不得全部拥

有，但却在1992年的甘陇之行后对西北的一切燃起了浓厚兴趣，时至今日竟是有增无减。

研究生毕业那阵子，我觉得摄影天地广阔令人兴奋，一天到晚跃跃欲试。但在真正要放下插图，以为将和本科专业渐行渐远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不免小有遗憾和感怀。然而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搞明白自己的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听说从1986级开始，高中应届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占比明显增加，这些人应该都算是顺风顺水，那种自带的嘚瑟和不知天高地厚几乎有点掩饰不住，否则第一次新年舞会上也不会被高年级嘘哄。但很快，在我见识了同届中以李芸为首的一干老工艺美校的手头功夫后，嚣张的气焰立马低落，两脚也终于踩在了地上。然而窝回去的那点子躁动总得有个出口，于是后来就去跳霹雳。那阵子北楼的水磨石地面被我们拿后背和膝盖擦得局部锃亮。

愤青是一定要当一下的，否则哪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艺术的，区别只是你能坚持多久。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虽

然没有像崔健说的“始终保持微笑”，但好像也真的无法保持愤怒。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刚一毕业就迅速普及的照相植字技术时，我还是没少嚷嚷抱怨：学校教学上怎么就不能有点前瞻性，怎么就不能多教点新东西，却让我们在美术字上浪费那么多精力？现在明白了，那时的光火其实是一种面对



中央工艺美院 1986 级书装班男生合影，前排中为王川

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恐惧和心虚。那种被瞬间架空的感觉，北京话叫“被闪着”，那种手足无措的囧确实需要排解和宣泄。然而没多久我就不闹腾了。那一笔一划、整张整开练出来的美术字功夫，让我在店大不只欺客的北京饭店——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出足了风头。看着蹲一地在刻我徒手写的美术字横幅的员工们，我很欣慰。而经由专业训练养成的对字体的敏感苛求所带来的更多裨益，则是在其后很长时间里慢慢释放和被感知到的。直到在这种养分都时常让我有被赋能的感觉。

另外要说的就是，那四年里塑就的对专业 and 专业化思维的笃信（研究生阶段被我的德裔导师进一步强化），这一点也是至今不变。尤其是在跨界当红的时下，我仍然坚信从专业出发是实现跨界的不二路径和基本前提。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的路径。近日见到马泉、大力和凌健三位师兄，在走向当代艺术的路上他们都是榜样和引领者。

在专业这个问题上，我可以比较死性，但在我们这一届里还是显得不够纯粹。遥望甘肃，《读者》这面旗帜在纸媒朝不保夕的今天还是奇迹般地屹立不倒。我觉得任伟那张老脸绝对应该是上面的核心图形——从毕业开始他就没动过地方。同样的情况听说还有二十多年未见的谢成，据说他现在比以前更喜欢封面设计了。

但活跃通达的人似乎更多。如果我能够跨界，那他们都得是跨领域，对他们我只能羡慕。去年我刚刚见识了童迅的家庭暗房，说实话站在暗房里我觉得他比我更爱摄影。但是出了家门他的主业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和企业，那是个我想想都头

大根本不敢染指的事情。可跟林荣桓的锦鲤相比，这好像还是“本分”了一些。刚刚接到广州大学美术学院贺景卫院长的召唤，他这30年的行踪复杂到我至今无法完整复述。这样的人还有赵雨东，且过犹不及。我老说你们不写本书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点不负责任。不过每次碰在一起我们聊得更多的还是四年里的那点事，相当单纯永不嫌烦。科宝博洛尼的王总兴鹏，曾给我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实习机会和指导。打开手机划拉不了几下你就会看到方放在教书法。在美国见到乌肿特别高兴，当了艺术家的她过得滋润。而当别人说起《大中国》和高枫时，我的眼前却只有在昏暗楼道里练琴的曾焰赤。

我们这届人似乎没什么整体形象，但却从不缺乏由各种奇葩神人共同构成的“生物多样性”，这更具质感。我们这届人似乎有点散，但我觉得这才是常态，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表象之下，是千丝万缕带温度有韧性的情感纽带。这不，宝华找不到我就找王菲霞一逮一个准儿。别看平时不太走动，但他交代的作业我会全力以赴做好。需要填补的空白当然有，我老想着找不着人了的黄振波、刘益兵和不肯联系的张阳。

我一直认为，我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赶上了最好的时段、最好的老师和同伴。当然可能每一届同学也都这么想。我只是认定我这不是虚言——每一次当我清楚地意识到30年前的彼时，被注入的养分已经被吸收转化成了个人后天源代码的组成，依然直接影响着当下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时，我就觉得这些学院最慷慨的馈赠至今还在身上。

2020年10月26日于望京

把记忆串个串

○刘崇茹（1996级电机）



刘崇茹校友

从班里发了通知让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就信誓旦旦在微信群里表态，一定要写点儿什么，那一年一起上清华的双胞胎，在当年也算“网红”过。

高考篇

说到清华，总忍不住提起中学时代，提起高考。我的中学在当时那个年代不算好也不算坏，算西安市重点中学中的第二、三梯队，虽然跟周围的同学比起来成绩还算可以，但从没想过自己能考上清华，一直觉得我们姐妹俩大概率能够携手走进西交，就在家门口。直到高三的一天，我的双胞胎妹妹刘崇静提前拿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无缘清北的提前录取，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于是，我放弃了保送其他大学的机会，决心参加高考一搏。风险肯定很大，那时候，也许只为了赌一口气。我清楚地记得，高考之后几天发了标准答案，先估分后报志愿。拿到标准答案后，我迫不及待地找了个地方开始估分。标准答案的

顺序是按照高考顺序排列的，第一门是语文，对完语文答案，我默默地合上了答案册，装进书包，悄悄地骑自行车回家了。到家后，我一个人躲在阳台（那时房子很小，阳台包了窗，我跟妹妹两个人住在阳台），又把语文对了一遍，然后泣不成声。

现代文阅读，全军覆没，一分都没拿到。我甚至给自己作文估了满分，也才勉强凑到80分，150分满分，搁现在我大概211也很悬了。我哭了很久，现在回忆这段过往，还能想起那时候的悲怆。我的双胞胎妹妹，一个已经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人，她无所适从，就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我，她不知道这时候该不该出现在我的身边，该说些什么，我会怎么想。于是，那个下午，我在阳台痛哭，她在阳台的门外看着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

很久以后，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进来静悄悄地坐在我身旁，轻轻拍着我的背。我不记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了，她劝我先把其他科目成绩对完再判断也不迟。大概也是因为哭累了，我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一科一科对答案。结果，一门比一门更接近满分，然后狠狠地嘲笑了自己刚才哭泣的样子。于是，过完夏天，我们姐妹俩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双胞胎篇

双胞胎一起上清华，现在每年都有不少对，已经不那么稀奇了。1996年，双

胞胎上清华印象中就我们一对。开学典礼那天，按照班级组织入场，每个人搬好自己的板凳。之前据说有通知到我们班，说校长要接见我，班主任让班长问我，是不是省状元，有没有很高档的竞赛成绩，可我没有。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一定是通知错了。所以，我依然被安排走在班级队伍里。

然后，有个很帅的老师，骑着自行车到我们班级的队伍里来找我，说校领导都在会场等我了，参会的人员就差我一个了。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一路狂奔，当我们赶到主楼会场的时候，接待室坐满了我不认识的人，看上去都很慈祥和善，我唯一认识的人是我的妹妹，当时就只有紧张和歉意，以至于完全不记得后来会场上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只记得那个骑车带着我在新生队伍中穿行狂奔的背影，甚至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后来，我们姐妹俩被校领导接见的照片上了《新清华》，在二教门口的宣传栏里贴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那张照片，我的样子不是很

好看，好像正在说话还是在干嘛，嘴是歪着的。

因为是双胞胎，我们虽然在不同的系，但却都住在5号楼。我妹妹住二楼，我住四楼。不同专业，其实朋友圈也不同，认识的人群也不一样，所以常常会有校园里跟我打招呼的人，我并不认识；也常常会有我的朋友跟我抱怨，说哪天在校园里跟我打招呼但我不理他。尤其是5号楼下，经常有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却一脸茫然。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其实是俩人，才渐渐不再纠结这件事。于是，为了避免给“陌生人”打招呼的尴尬，朋友们逐渐不再主动跟我打招呼，得我主动才行，带来的好处是你要不想搭理谁，就可以假装不认识。

关于双胞胎的典故，直到现在，例如“这边刚刚跟她讨论完，回过头又出来一个”这种受到“惊吓”的故事，还在我读博士的课题组久久流传。

班级篇

我们班4个女生，27个男生，虽然女生数量少，但我们班女生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徐璟的硬笔书法，让我崇拜得一塌糊涂。她上课记的笔记，每到考试来临，都是最抢手的。现在她久居美国，不知道还写不写仿宋了。庚欣的英文水平，我是望尘莫及的。我就是天天从图书馆借各种有声英文读物一直在练习，也从没有赶上她的可能。李扉南是我的铁杆儿，长得漂亮又能干，能歌善舞，声音甜美，就算是吵架，我都觉得她的声音特别动



2010年校庆日返校，刘崇茹（1排右2）、刘崇静（1排左2）姐妹与老校长王大中（1排左3）、党委副书记史宗恺（1排左4）及同学们合影

□ 值年园地

听。再一个，就是我了。为了考过1500米，每天下午四点，都要去操场上跑四五公里，下了晚自习，还去打会儿篮球。倒是切实实践了马约翰先生的教导，应了现在那句“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

我们班有各种各样的学霸，印象最深刻的，是汤宏的“大学化学”。据说上课从来也不听讲，我们上这门课的时候，他要么在宿舍睡觉，要么在课堂睡觉。期末考试的头一天下午，有人问他：“你真的不准备复习一下么？”他犹豫了半天，还是背着书包出去上自习了，大约两小时就回宿舍了。第二天一早的“大学化学”考试，他得了满分。当我的身边都是这样的人物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实在太“菜”了。除了在鄙视链的最低端仰望他们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勤补拙。

我的水木账号是赵宇鹏给我取的，那个账号我一直用，也只有那一个账号。当时他给我申请账号并告诉我的时候，就想表扬他太有才了，不记得是否曾经表示过，现在想起，还得再表扬一下。最近想起来去翻以前写的东西，发现我连我的水木博客都已经找不到了。很久不用了，大概服务器的数据都已经被清理了。印象中当年有一阵子，我也算是几个板块的常客，甚至还曾经一度算“水木名媛”。那时候BBS“啊哦”一声的消息提醒，似乎还能听得到，不回消息无法继续操作的那个黑屏上流行很多ASCII码的风格设计，似乎还在眼前，我甚至还能想起几个水车的签名图案。感慨之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后记

本科阶段总的说来还算过得不错，参

加过很多社团，我记得最多的时候同时参加7个社团，每天下了自习就是各种社团串场。到高年级的时候，实在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就逐渐放弃了，只留了一个红十字会，一直到本科毕业。成绩也还算不错，我印象中保研的时候是班里第三，本科毕业的时候还拿到了“优良毕业生”证书。直博遇到了一些挫折，最后也都一一克服，不再详述。

我在清华里度过了十年，本科四年，直博期间结婚生子，毕业的时候，孩子已经满地跑了，我带着她一起在校园里照的毕业照。

毕业20年了，把自己零零散散的回忆轻轻串一个串，以纪念那些青春岁月。

刘崇茹，200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现任该校教授、博导、教务处处长。

百字令·纪念清华110华诞

○李同振（1970届工化）

地灵人杰，百年兴，学府清华园瞩。工字厅幽深雅致，二校门宽阔矗。大礼堂巍，主楼雄伟，书馆丰篇目。碧荷池畔，青春曾几留足。

难忘西北残垣^①，西南联大，东岸添支族^②。且喜八方多奉献，两弹一星功录。科学精英，中枢先导^③，辈出新人物。自强不息，千秋功业高筑。

注：① 指圆明园遗址。

②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③ 指习近平、胡锦涛等领导人。



● 榜上有名

清华7位教师9位校友荣获 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20年10月18日，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仪式在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开幕式上举行，共有100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其中包括10名特别奖。我校7位教师9位校友获奖，其中1位教师2位校友荣获特别奖。

获得特别奖的教师和校友是：我校电机系副教授郭庆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谷林（1998级材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常超（2002级本、2006级博，工物）。

获得科技奖的教师和校友是：我校丘成桐数学中心/数学系教授于品、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刘万里（2001级博，生物）、电子系教授李刚（1998级本、2002级博，电子）、计算机系教授李国良（2004级博，计算机）、化工系教授张强（2000级本、2004级博，化工）、土木系副教授聂鑫（2008级博，土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助理教授、骨科主治医师吴南（2004级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2001级博，生物），成都博奥新景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冠斌（1998级本精仪；2002级博，医学院），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陈兴（1998级化学），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林鸿（1997级本、2001级博，热能），暨南大学药学院教授高昊（2006—2008年，博士后，医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教授潘时龙（2000级本、2004级博，电子）。

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人力与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田阳）

5位清华校友荣获2020年 何梁何利基金奖

11月3日，何梁何利基金2020年度颁奖大会在京举行，共有52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包括5位清华校友：颜学庆、宋永华和王国庆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常超和张宗亮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颜学庆（1994级工物），现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长期从事离子加速器、低能核物理和核技术研究。宋永华（1989—1991博士后，电机），现任澳门大学校长。长期从事电力系统领域研究。王国庆（1983级本、2003级博，机械），现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总工艺师、信息化建设总指挥。主要从事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论证、预研创新与重大项目论证、专业建设、产学研合作及国际化等工作。常超（2002级本、2006级博，工物），现为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34院研究员，长期从事高功率微波等离子体、太赫兹生物学研究。张宗亮（1979级水利），现为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我国高土石坝工程勘察设计领军人物。

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鍊琚、何添、利国伟于1994年创立，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26年来，共遴选奖励1414

□ 清芬挺秀

位杰出科技工作者。 (田 阳)

清华大学 5 位教师 5 位校友当选 2021 IEEE FELLOW

11月26日,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公布了2021年新选会士(Fellow)名单,在282名新选会士中有我校5位教师和5位校友。

5位教师是:电子系教授王昭诚(1986级本、1991级硕、1993级博,电子),因在OFDM无线系统的导频设计与调制方向做出贡献而入选。电机系教授吴文传(1991级本、1996级硕、2001级博,电机),因在能量管理与运行控制方面的贡献入选。计算机系教授唐杰(2002级博,计算机),因对数据和社交网络挖掘的知识发现的贡献而入选。软件学院副教授刘世霞(1998级博,计算机),因对视觉文本分析和视觉模型分析的贡献而入选。自动化系副教授耿华(2003级博,自动化),因在可再生能源功率变流器控制领域有突出贡献而入选。

5位校友是:Transphorm公司高级副总裁吴毅锋(1985级力学),因对氮化镓微波和功率转换器件的贡献而入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王忠东(1986级本、1991级硕,电机),因在绝缘液体以及电力变压器频响分析领域有突出贡献而入选。加拿大瑞尔森大学教授张晓平(1987级本、1992级博,电子),因对金融中的信号处理的贡献而入选。流利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刘扬(1992级本、1997级硕,电子),因对语音理解和语言学习技术的贡献而入选。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力哲(1993级本、1998级硕,电机),因

对遥感成像处理、分析和应用的高性能计算的贡献而入选。 (田 阳)

我校 3 位教师 4 位校友荣获 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11月8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40位专家和1个团体获奖,其中包含我校3位教师和4位校友。

3位教师是:郝吉明(1970届本,土建;1978级硕,化工),环境学院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控制工程,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方东平,土木水利学院院长,建设管理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建设工程风险管理与安全管理、可持续发展与韧性城市研究。吕俊复(1986级本、1993级硕、2000级博,热能),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循环流化床燃烧理论与技术、生物质燃烧等研究。

4位校友是:黄其励(1964届动力),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一级顾问,电网安全和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煤基清洁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初(1970届本,力学;1990级博,精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燕生(1981级电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劲东(1989级博,力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部总设计师。

光华工程科技奖是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旨在奖励在我国工程科技研究、发展、应用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迄今已有304位科学家及1个团体获奖。 (田 阳)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

——访“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冯冠平

○解红岩

冯冠平，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并留校任教，历任精仪系副主任、科技处处长、校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力合创投及近百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董事长。他率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先后培育了6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他亲自创办的企业超过100家，16家企业先后成功上市，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投资界十大风云人物”。科技成果获多项国家、省部级奖项。近几年，创办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开拓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40年，成就了深圳这座改革之都；深圳这片热土，也成就了一大批创新、创业的先行者。冯冠平，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在庆祝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市政府隆重表彰了40位“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冯冠平老师光荣入选。

10月14日上午，我们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下午，带着感动与兴奋，在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美丽的校园里，我们采访了从各路媒体“包围”中脱身的冯冠平老师。

获奖感言

我们的提问无疑是从“获奖感言”开始的，希望他总结一下自己取得成功有哪些最重要的因素，而冯老师的回答却另有思路。他说，我获得表彰并不是仅仅代表我自己。第一，在深圳4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大亚湾核电站、深圳大学，到各种创新企业，从十几年前的两三千人到目前的一万多人，一大批清华人奋力开拓，创新创业，为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我是这些清华人的代表；第二，在深圳，很多内地高校建立了像深圳清华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为深圳的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也是这些科技工作者的代表；第三，当年清华来深圳建立研究院，也有很多分歧和争论，最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反映了清华大学领导的前瞻性，我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清华大学。

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清华研究院，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给后人留下许多启示。深圳当时的市长李子彬是清华大学1964届工化系校友，他首先提出希望清华在深圳搞个研发机构，帮助



2020年10月14日，校党委书记陈旭（左）与刚刚获得表彰的两位校友冯冠平（中）、李屹合影

深圳发展高科技。当时作为主管科研工作的校长助理，冯冠平非常积极地促成这件事。要在深圳办研究院，学校里面包括领导层有很多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多年来清华大学在外地办学，办各种机构，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深圳距离那么远，能不能成功，谁都看不很清楚。最后是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力排众议，促成了研究院的成立。

如今，深圳清华研究院的作用和地位已无需多言，在20年中已经孵化了3000多家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就有几十家，为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清华又在深圳创办了研究生院，还是冯冠平陪同当时的主管领导何建坤副校长一起选定的现校址。2018年，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又进一步成为清华大学与深圳市共建的国际研究生院。在深圳20多年深耕、发展，是清华大学在探索高等教育改革、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冯老师还告诉我们，这次又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总书记曾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用石墨烯材料开发出军民两用的产品，现在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可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因此心情也十分激动。

创新家的创新思维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创新创业领军人物您有哪些思考？

冯老师说，要破解这些难题，我们还是应该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结合起来。我们国家不缺一般性的科学家，缺少的是战略性科学家。当前形势严峻，对外交流受阻，但这条路不

能断，开放的路子要一直走下去。我们在培养战略科学家方面是有欠缺的，清华作为一流大学，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大师。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定要有前瞻性。冯老师提到清华的小卫星学科，他介绍当时是由他提出设立的这个研究方向，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最后培养并成长出了数位院士。他认为高校不仅要出学术大师，还要在科技战略方面出一批大师和人才。

冯老师回忆起10年前，自己卸任研究院院长职务，《光明日报》刊登了《“知本家”冯冠平》一文，对他在深圳研究院15年的贡献做了全面总结，包括：从一座空楼，到600多家企业入驻接受孵化，发展速度是社会同类机构的6倍。研究院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项奖励，申请专利近200项，与200多家企业签订技术合同300多项，15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产值100多亿元，20多家企业成功上市，等等。那么，离任之后下一步做什么？当时的深圳市委领导也跟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冯老师的回答是：要为国家再引进孵化出两个能够在世界产业领域最领先的高科技项目，使它们的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这就是后来的石墨烯和超材料。

冯老师有一套选择投资项目的理论，那就是“大家都看好的项目不投，没有争议的项目不投”，因为都看好、没争议说明前瞻性不够。石墨烯和超材料都是在当时前景不明朗、很多人有质疑的情况下，他们做出了大胆的判断。

说起这两个项目，冯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颇为传奇。

超材料的发明人是一位只有26岁的年轻人叫刘若鹏，他在美国某大学有一个团队，他们的超材料技术曾登上了*Science*

的封面。2010年决定回国创业时他们找到了冯冠平，希望他投资支持。冯冠平说，说实话，这个项目创新的东西太多，我也看不懂。但我干过多年科技处长，可以想出办法去搞懂。我就建议他们先做一个产品出来。一个月之后，他们通知我去看，我看到的演示效果确实非常神奇，我判断这项技术用于国防一定会解决大问题。之后，冯冠平联合徐航校友（1979级计算机）、投资人厉伟投入了3000万元，并亲自担任董事长。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温家宝总理来深圳研究院视察，冯冠平特意安排把这个项目的演示搬到了一楼展示大厅的旁边，以方便领导人仔细观看。果不其然，领导人离开不久还在途中时，冯老师就接到了电话，让刘若鹏尽快去向有关部门汇报。按常理，一项新技术应用于国防装备要经过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机会可谓从天而降。后来，这项技术成功地用于我国最重要的重大尖端装备领域，在隐身技术方面反超各军事强国。如今，这家企业已经申报了数千项技术专利，在世界超材料产业化竞争中占据了先机，成为行业引领者。习总书记到深圳，去看的第一家企业就是他们。

今年8月1日建军节之际，刘若鹏给冯冠平老师写来一封充满激情的致谢信，感谢他支持他们“从基础研究、基础实验室建设开始，一点一滴地构筑起我国超材料技术的工业体系和工业能力，建立起了一支属于共和国的跨代隐身技术创新队伍，为国家重点型号装备的

跨代创新、批产交付做出了贡献”。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只要添加一点进入其他材料，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足以引起革命性改变的“超级材料”。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这种材料，冯冠平就看好其良好的应用前景，因此他陆续投资了相关的创业企业和团队，随后一批石墨烯企业在江苏、深圳涌现。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石墨烯产业的中坚。2010年，石墨烯材料发明人荣获诺贝尔奖，从而在全世界受到广泛重视，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走在了前列。在全球石墨烯产业综合发展实力排名中，我国紧随美国、日本，位列前三。

2014年，冯冠平曾在南京专门为习总书记介绍石墨烯项目，总书记指着演示的样品说：“你能不能用它开发出军民两用的产品？”冯冠平回答道：“行！”就这样，总书记的嘱托最后改变了冯冠平的生活。他本来计划70岁以后“退出江湖”，去过好退休生活，既然说了就不能不干，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的传统。

冯冠平当时说“行”，实际上心里也没底，因为石墨烯的应用是一个世界难题。2015年，冯冠平在深圳创办了烯旺新



2020年10月14日，出席纪念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清华校友座谈会的部分校友合影

□ 清芬挺秀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70岁时开始了他的“第101次创业”。这次创业让他领教了石墨烯材料“远红外波”的巨大威力，他带领团队率先申请了国际发明专利、石墨烯行业核心技术——纯石墨烯发热膜，以此项专利技术为核心，他们专注于石墨烯发热技术的应用研发和生产，如今他们的产业涉及养护护具、服饰家纺、美容、能量房等消费品领域，医疗器械产品等医疗领域，以及石墨烯涂料、供暖等工业应用领域。是全球首家实现石墨烯从上游技术研发、原材料生产到下游产品研发应用、行业合作、品牌运营、渠道销售等全石墨烯产业链的高科技企业。

冯冠平老师说起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引起我们极大兴趣。他的一位清华老同学因腰椎病发作，卧床已经有两个月了，冯老师去家中探望，并带去了自己新研制的石墨烯热灸仪。经过十几天的灸治，加上其他措施配合施治，病人的经络慢慢畅通，几天后就可以坐立，十几天后就可以自主行走了。中医学与新材料结合就是这么神奇！冯冠平相信，在医疗领域还会有更多的奇迹出现，目前的应用只是冰山一角。

创新教育与猎枪

明年，清华大学将迎来110周年校庆，我们请冯冠平老师谈谈学校在创新教育方面需要如何改进。冯老师说，清华对这个方面还是非常重视的，今年开始在招生时实行书院制，就是创新教育的有力举措。文理渗透，专业互补，学科交叉，会促进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冯老师提到蒋南翔校长时期提出的“干粮与猎枪”，他认为自己在清华的学习虽然受到“文革”的严重影响，但这

让他们这代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精仪系的学习中，半工半读的环节比较多，他的动手能力因此得到较好的培养；大学毕业后被分到车工班，当过车工班班长，他车、钳、刨、磨样样精通，对后来的发明工作帮助极大。他先后获得过五项科技发明奖，这在清华也是不多见的。他感谢清华给了自己一杆“猎枪”。

大家都知道，在武汉抗疫期间，医护人员的护目镜时间稍长就会起雾看不清，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冯冠平老师知道后，他判断这个问题使用石墨烯材料应该好解决，便报告学校科研院请战，学校安排他跟清华长庚医院合作。一个礼拜后，就成功地做出了防起雾的护目镜，之后批量生产了数千只支援抗疫前线。这个难题解决后，他们收到了很多医护人员的感谢信。

同样，他们的石墨烯产品也将会应用在2022北京冬奥会运动员的护目镜。目前，他们已经收到冬奥组委的订单。

作为业界公认的中国石墨烯产业奠基人，冯老师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在石墨烯技术方面是领先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在深研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半个月，将用电视展示石墨烯是怎么长出来的，是一种怎样神奇的高科技材料。届时，会有更多的人认识这个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朋友”。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冯冠平一路走来，中流击水，涉险闯关，他的脚步踏实而稳健。身兼学者与技术专家、实业家、投资人三重身份，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锁定目标去干好的就是一件事——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科技产业报国的伟大理想。

李屹：让中国的科创之光照亮世界殿堂

○叶思佳



李屹校友

李屹，1970年生，清华大学1986级汽车系校友，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显示行业的驱动者，李屹带领团队于2007年在全球率先发明了ALPD®激光显示技术，该技术被国际同行视为下一代激光显示的发展方向，并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技术产业化。光峰科技是国内显示行业为数不多拥有原创专利技术和系统产业化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值此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李屹获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

从出国深造到回国投身实业，从“零”起点创业到如今的科研产品举世闻名，李屹的团队用十几年的时间将中国的激光显示技术推到了世界的前沿。

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李屹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光学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硅谷一家激光技术研究机构工作。在此期间，李屹对激光技术领域有

了更多独到的见解，他开始思考显示领域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这一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也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我们为什么一直停留在模仿、改良的阶段？”李屹这样问自己。

一直以来，许多人认为只有国外才能做到原始创新，而这种偏见恰恰成为了李屹回国发展的动机。“我们就是要研发出低成本、高质量的颠覆性显示技术，所谓的低成本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

就这样，李屹毅然选择回到祖国，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扎根深圳：“安静”的力量与“少年气”的熏陶

原始创新并不是件易事。除了国内大环境的各种现实因素外，被贴着“清华高材生”这一标签的李屹也面临着许多外界的压力，他深深感受到创业之路的艰辛。

“多亏了深圳这座城市，我才充满了干劲，这里的‘安静’让我充满了力量。”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对深圳的印象，应该很少有人会用“静”来形容这一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在李屹眼中，正是深圳特有的“安静”让他爱上深圳，并决定扎根深圳。

“安静是一种力量。”李屹反复强调着这句话，“当初我选择来深圳创业，就是因为深圳给我的感觉比较安静、宽容，没有那么多外界干扰，能让人静心。”深圳不仅有宜人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文化建设，使得李屹在这里能沉

下心做事。

即便是14年后的今天，李屹依旧享受着深圳特有的“静”。他在下班后时常会去公司附近的深圳湾公园慢跑或骑车。夜幕降临的深圳湾，海风吹拂着小道边的花草，公园比日间更添了一丝静谧。海边小道上，时而走过一对恋人，时而行过一辆自行车，而李屹也身处其中。夜晚的深圳湾带给他祥和与安逸，不断给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深圳包容的市场氛围和多样的文化融合，也让李屹在深圳的创业之路多了一分舒心和愉悦。“在创业的路上，遭受打击、心灰意冷是常有的事。”李屹打趣道，“可深圳总能给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让我们这些创业者心中没那么冷、那么苦了。”

深圳另一个深深吸引和感染李屹的地方，在于那永不消散的“少年气”。从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到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如今的深圳可谓“四十不惑”。“来深圳打拼十几年了，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从没变过，一直像少年一般充满了青春与活力，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在清华读大学的时候。”晚上11点的深圳，并没有陷入沉睡：科技园附近的地铁站有不少赶末班车的人；写字楼的门口总能看到几个等网约车的上班族，嘴上抱怨着等车时间太长，脸上却难掩下班后的放松。李屹时常看到公司附近的网球场将近凌晨还有人在打球，他无时无刻不被这种浓浓的少年气感染。这座城市仿佛拥有让时光倒流的魔力，随时都能让李屹回到过去，仿佛置身于熟悉的清华园，仿佛自己还是那个在校道上哼着小曲儿，骑着自行车的大一新生。“安静和少年气，都是深圳的迷人气质，就像是硬币的两个面。”李屹说。

敢为人先，勇敢挑战显示行业的“珠穆朗玛峰”

深圳独特的气息，陪伴并支持着李屹在激光显示技术领域不断前行。“敢为人先”既是清华人的特点，也是深圳人的特点。李屹把重点放在了电影行业，面对外界对于国内技术的质疑和偏见，李屹仍坚持探索，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还不断开发不同的应用场景。

2014年，光峰科技与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变形金刚4》的首映上尝试了自主研发的激光放映。“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生怕机器出现任何问题。”李屹回想起自己的团队，当时每个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搬运着梯子爬上爬下，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设备。“这帮兄弟们都汗涔涔的，看上去像在工地搬了好几天砖似的。”李屹打趣道，“我们当天晚上包场看了最后一场电影，兄弟们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敢坐在前排，电影放映期间万一我们的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坐在前面找不到地洞可钻。”

当李屹团队看到他们自主研发的激光放映带来非凡效果时，心中浓浓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2006年到2014年，李屹团队的努力不仅让国内的激光放映技术得到了普及，更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在电影放映技术上的引领创新能力，真正实现了ALPD®技术“零”的突破。

光峰科技带给社会的突破远不止于此。2019年元宵节，“紫禁城上元之夜”灯会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故宫历史上首次运用“中国创造”的激光显示技术，将数字画面投射到太和门的主体建筑上，而做出这一令国人骄傲的成绩的，正是李屹的

光峰科技团队。除此之外，2019年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的激光投影大秀，以及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流浪地球》的激光显示技术，均来自光峰科技。

2019年，光峰科技成为首批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光峰的ALPD®技术底层关键架构技术专利在激光显示技术领域具有极高价值，并被众多同行先后引证400余次。截至2019年6月，光峰共计国内外核准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600余项，公司全球专利及专利申请数量多达16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及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000项，专利申请数量在全球荧光激光显示领域排名第一。

“隐秘而伟大”的清华精神

再好的金子也需要经过仔细打磨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回想起大学时期的自己，李屹惭愧地笑了笑。来自南方的他初入学时难以适应北京寒冷的气候，更难以克服每日早起赶课带来的浓浓困意。那时的李屹上课时喜欢坐在后排最不起眼的“安全区域”，偶尔打个盹儿。而改变李屹学习态度的，是他当时的普通物理课老师。

李屹至今忘不了那一节普物课，他的老师并没有对缺席或开小差的同学加以责备，而是默默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教不严，师之惰”六个大字。这一幕让李屹心中一怔，他深刻地感受到清华这种严以律己、善于自省的优良风气。面对懈怠的学生，老师的本能是先反思和检讨自己的失职，严格要求自己。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李屹，也改变了他的学习态度。

李屹还记得，向来对物理成绩自信满满的他，第一次实验报告仅拿了及格分，感到不解的他拿着报告站在老师面前。老

师并没有多说，只是让李屹回想一下他的实验台。李屹这才想起来，自己在做完实验之后，实验器具和垃圾依旧散落在桌面，并没有认真清理和归位。“一直到学期末，我的物理成绩始终没能突破90分，老是差了一点点。”李屹笑着摇了摇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深，我真正体会到了清华人的严谨，没有哪件事情是容易的，看似简单的小事，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毫不懈怠。”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用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名句诠释了深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来的艰辛。这句诗让李屹感慨万千，这14个字也代表着清华人对自己的要求——严以律己，细致入微。

直至今日，李屹和他的团队身上依旧散发着浓浓的清华气质。社会瞬息万变，公司的关注度剧增，李屹却依旧保持着质朴的风格，不骄不躁，他说这也是清华的老师带给他的影响。“如今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像互联网、5G的普及等，但有些东西是一辈子都不会变的，比如清华人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李屹想起了我国



2020年10月14日，李屹校友参加校友座谈会

□ 清芬挺秀

著名光学仪器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金国藩院士，当时八十高龄的金国藩院士还时常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那种质朴无华、低调谦和的气质让李屹至今难忘。清华的老教师们就是这样，言传身教，行胜于言，在日常的为人处事中将清华气质默默传承下去。

清华人的使命感

在采访中，李屹多次提到了电影《无问西东》。“无问西东”四字出自清华大学校歌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用几个不同时空的清华学生的故事来展现清华精神。李屹最喜欢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这一角色。沈光耀的原型就是抗日英雄沈崇海。沈崇海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生前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分队长。1937年，沈崇海随第二大队在淞沪会战中驾机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以身殉国。这一角色对李屹的触动很大，这种牺牲奉献和家国情怀，既是清华的精神，也是时代的缩影，更是作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感的体现。每当说到这部电影，李屹的脸上都难掩感慨和激动，“牺牲和奉献是光荣的，是值得尊敬的。而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坚信这是对的，就怀着奉献精神坚持下去，这也是身为清华人的使命。”

说到“使命感”，李屹的眼神愈发笃定。“清华的学子，有的天赋异禀，有的勤学苦练。无论是先天被赋予的聪明才智，还是后天在学校习得的知识技能，我们都有义务将自身所得回馈给学校、给社会。”李屹十几年来一直坚守在科研创新的岗位，他希望每位清华学子都能不忘初心，身体力行，在科创领域不断突破，为

清华大学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李屹便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带领团队用实际行动履行着清华人的使命，将自身所学所得回馈给社会。

李屹还说，希望在明年的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他能让光峰科技最新的激光显示技术照亮校庆的舞台。也正是基于这种生为清华人的使命感，李屹接下来还计划联合其他几位同届的清华校友，为母校设立奖学金项目，以支持清华学子毕业后在深圳的创新创业工作。

不忘初心，继承传统

从求学到创业，李屹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初心。在长期接触西方文化后，他更加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李屹一直崇尚的“静”，就是出自我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给予李屹启发很深的，是王阳明先生的八字箴言——静坐、立志、勤学、改过。大道至简，心学看似简单，可要习致精深却很难。许多人会把“立志”摆在首位，而这八字之首却是“静坐”，即心静则清，清楚了自己的理想后方能立志。这与李屹一直心驰神往的“安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正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一直启发和鼓舞着李屹潜心钻研。他希望未来的清华学子也能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与清华精神和时代精神承接，继续在科研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不忘初心，继承传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注入新的活力。”李屹对新一代的清华学子有着这样的希冀。

当被问起获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感受时，李屹难掩激动的心情，也表示“压力

山大”。“我感到很高兴、很振奋，同为清华人，面对习总书记的问候与鼓励，我感受到了来自前辈的温暖和亲切。总书记的话让我无比感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清华人的精神和气质。同时，总书记对深圳未来发展的期望极高，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压力，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习总书记在大会讲话的最后说到，希望深圳人能“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李屹表示，自己未来会一如既往，身体力行，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同时，他也希望清华的学子能将清华严谨质朴、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下去，将“闯”“创”“干”落到实处，尽自己的力量带给世界更多的奇迹。

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我们期待能看到，由光峰最新技术点亮的清华舞台。

一个逐梦电网的清华博士

——记全国劳动模范、清华大学电机系校友夏德明

○庞佳毅

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电网东北分部调控分中心系统运行一处处长、清华大学1998级电机系校友夏德明获此殊荣。

考察夏德明的人生之路，这位曾获得国家电网公司优秀专家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重要奖项，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双丰收的清华校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来自农村穷孩子成长成才的闪光足迹。

山区孩子的清华梦

1979年6月，夏德明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市舒郊乡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家有兄弟姐妹5人，夏德明最小，属超生，让他差一点就没来到这个世界。全家靠种地、摊煎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贫困。为了维持生活，夏德明从童年时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锄地、插秧、扶犁、放牛、担水劈柴、收割……夏德明说，几乎农村的



夏德明校友

所有庄稼活儿他都干过。

夏德明家的西侧是绵延的小山，南边有一座监狱，东边有条不知名的小河，北面有个变电所。这是他童年时能看到的全部世界。5岁那年，母亲带他去了山东舅舅家，这是夏德明第一次出远门。舅舅是一位小学老师，是夏德明亲戚里比较有学问的人，他告诉夏德明，中国最好的大

□ 清芬挺秀

学是清华大学，并鼓励他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席话，点燃了夏德明对清华的向往。

为了这个梦想，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夏德明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小学时每天步行上下学，从家中带午饭，在学校吃。因为家里穷，夏德明的午饭经常没有菜，只有拌着盐的米饭。初中时住校，四五十人一个房间，洗漱都在户外，即便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也不例外。吃饭不仅要带家里带大米，还要交加工费。为了省菜钱，夏德明每顿饭只喝食堂一毛钱的西红柿汤。每次回家的时候，他也从不坐公交车，背着包步行20公里，倒练出了一副好脚板。

尽管生活艰苦，夏德明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出色。1995年中考，他是班里唯一一个考入县重点高中的学生。父亲在高兴的同时，对夏德明说：“你只要能保持年级前20名左右，我就知足了。”因为那个成绩大概可以上个985之类的大学。可夏德明说：“这个标准太低了，我的梦想是清华。”

通过刻苦的学习，夏德明不仅兑现了父亲的期许，而且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名，也经常夺得年级第一。

1998年，夏德明迎来了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上了“清华大学”，其后的志愿也有填一般的本科学校。他身上有种豁达，即“命运安排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对于专业的选择，夏德明在清华大学宣传手册里发现“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的名字最长，而且它的专业介绍、课程设置涵盖了方方面面。他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便选择了电机系。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入学后他得知，电机系因为涵盖知识广泛，孕育了很多其他专业，被戏称为

“老母鸡”系。

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会路过家北面的变电站，那儿有围墙、铁塔，还有长长的输电线路。站里面叫不上名的高压电气设备，排列得整整齐齐。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只觉得“神秘”。若干年后，他进入电机系，弄懂了当年搞不清的设备和原理，他相信，这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清华园里的青春绽放

1998年8月29日，19岁的夏德明独自踏上了去清华的旅程。

虽相隔千里，但清华带给他的却是一种归属感——作为一名贫困学生，清华的绿色通道为他免了学费，解决了面临失学的后顾之忧。入学后，他参加学生通讯社，学着采访、写作。大二上学期，作为内联部部长，他组织社里20来个人骑车去百鸟园春游。当时没有便利的手机导航，为了设计骑行路线，夏德明提前研究地图，在上面标注、划线，然后自己去踩点。选路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为了保障队伍的安全，避免掉队，道路的宽窄、拐弯的多少、红绿灯的数量，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得当。甚至，他还提前设计好了休息点的位置。

最终，百鸟园活动顺利举办。这是夏德明第一次独立组织较大型的活动，他很有成就感，也因此印象深刻。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他将其视为“清华人传统”的体现：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卓越，“行胜于言”。

本科期间，他工作最久的学生组织是系学生科协。当时，学校举办“挑战杯”比赛，各个院系都会收集学生的科技成果，并进行集中展示。作为系科协主席，

他和协会的同学一起，组织大家积极参与，到各个实验室拉项目、找成果，还负责部分包装、宣传工作，并邀请嘉宾来给参与者讲课。另外，每个院系在东操都有一个摆放收集来的成果的摊位，要展示两天。为了确保展品的安全，责任感支撑着夏德明守着摊位，两天一宿没有睡觉。他和协会同学的辛勤付出最终收获了硕果：在这次挑战杯中，电机系获得全校的“最佳组织奖”。

科协还设有一个维修部，夏德明在这里学会了基本的维修技能。他会修理放磁带的“沃克曼”，有时播放速度慢了，他会把它拆开，调整里面一个可控的电阻，通过耳机声音去校准速度。当然也免不了有不成功的经历。有一次，他的小闹钟坏了，他就把闹钟拆开，鼓捣一番。谁知修完之后，闹钟指针开始反着转圈。还有放在床边的电风扇，因为用了太久而“罢工”。他修好以后，有天睡觉，电风扇突然“咚”一下，烧了，很多黑色的灰蹦到凉席上。

对于当年的趣事，夏德明津津乐道，不时发出笑声。他感慨，在园子里度过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青春岁月。

上大舞台：到东北电网去工作

夏德明在清华园里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特别是读博期间，他师从自动控制和电力系统动态学专家卢强院士，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夏德明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思路非常明确，他清楚地认识到电力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京沪穗地区人才聚集，发展空间有限；而东北地区正面临着振兴老工业基地



夏德明校友在电网调度台上

的战略机遇，迫切需要引入高层次人才。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到东北，不仅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再加上清华对毕业生倡导的“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他最终选择了到地处沈阳的东北电网有限公司工作。

入职后，夏德明从见习调度员做起。他谦虚随和，没有名校博士的架子。为了尽早掌握电网实际情况，除了吃饭睡觉，夏德明差不多天天待在单位里，熟悉业务，跟踪国内外电网发展的新技术。通过刻苦努力，仅用一年时间，他就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岗位能手，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2009年，夏德明调到调控分中心系统运行处。那时，正是电网快速发展，尤其是风电大发展时期。“这是大风刮来的钱”，夏德明如此评价成本低而又环保的风电。他那时只是系统运行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却积极建议采取措施吸纳风电能源。东北电网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个建议。

通辽地区风资源非常丰富，风电也因此发展迅猛。然而，将数百万千瓦风电接

入东北电网，难题一个接一个。首先，东北电网在通辽地区有五回线路，两条500千伏的“粗线”和三条220千伏的“细线”。数百万千瓦风电一旦接入，必然增加电网负荷。若“粗线”出现跳闸，电就得走另3条“细线”，就可能造成线路烧毁，引发整个通辽地区停电。其次，风电受季风影响，发电时多时少，随机性大，对电力稳定控制是个挑战。电源切除多了，会造成供电不足；切除少了，可能过载烧毁，威胁地区电网安全。另外，多接入风电就要少接入火电，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这个矛盾怎么协调解决？而且因为上这个项目，需要火电、风电企业投资，他们能接受吗？同时，对于这种改造项目，当时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当然，还有一个安全可靠的解决办法，就是新架设一条输电线路。但是这个办法需要征地、拆迁、新工程建设等一系列举措，造价高、时间长。

面对一个个难题，夏德明没有退缩，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和同事们一起积极探寻新的节省成本、快速高效的解决办法。那一段时间，他们反复计算分析、深入现场调查研究，



夏德明（中）与调度中心同事们研究新能源消纳方案

与主流设备制造厂家进行技术交流，思考制定可行性解决方案。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回线路上挖掘潜力，选定19个变电站，增设智能稳控装置。这样，投资较少，而又能根据风电变化情况，实现风电、火电相互转换。但是这个方案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可靠性达不到要求，稳控装置会出现“误动”和“拒动”，即不该动时动了，该动时不动，都会对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产生严重影响。夏德明和同事们最终研究设计了双重化配置，覆盖1个主站、5个子站、13个执行站的区域稳控系统。他们还制定出科学严谨的《通辽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改造方案》，并对每个变电站进行现场调研，与每个站的运维人员进行核实，确保《方案》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

《方案》提交后，经国网东北分部领导班子认真研究，顺利通过。此时，夏德明已经完成了任务，不用再操心后面的工程，但是这位对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电力工程师却并没有休息，而是积极参与施工设计出厂验收、施工调试等全过程。

2012年12月，项目正式投入运营。通辽地区风电送出能力增加了80万千瓦，仅2013年一年就提高了通辽风力发电25亿千瓦时。夏德明和同事们继续努力，先后在东北其他多个风电基地研究设计并组织实施了“区域智能稳控系统”，同时，综合利用风火联合优化控制等技术手段，2019年实现全网新能源发电量830.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了14.85%，利用率达到了98.16%，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西南6个区域中名列第一，累计提高风电送出能力180万千瓦，年增加风电发电约45亿千瓦时，为辽宁、吉林、黑龙江

及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约23.4亿元，为社会节约158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425万吨，为推进绿色发展，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些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能源局、自治区政府以及发电企业的高度认可。夏德明也有了很大收获，申报获批了3个发明专利。2018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作为公司的专业技术骨干，夏德明先后参与了十多个公司重大科技、工程项目，提出了20余项提高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新能源接纳能力的实用新技术、新思路，在大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夏德明被任命为调控分中心系统运行处处长，工作重点是电力系统稳定分析、电网安全运行和清洁能源接纳，这正是他大学期间学习的方向。在夏德明看来，他当初选择清华电机系，选择到东北电网工作，成就了他的职业发展与国家和行业的需求紧密相连。近期，国网东北分部（前身为东北电网）正式启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工作之一，夏德明正在筹建“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联盟”，希望集中东北区域的优秀人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东北电力工会”，2020年11月24日）

张宗亮：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

○高 燕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1979级水利系校友张宗亮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领域科技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首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从工程师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1984年，张宗亮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后，一直扎根西南边疆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科研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秉承初心、奋战一线、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地躬耕绿色能源大业，为我国能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宗亮微笑着说，1989年获得云南省

“五小”成果二等奖，是他人生获得的第一项科技奖励。至今，这本获奖证书仍完好地保存着，对他而言，意义深远。这项成果奖还是他工作之初，参加鲁布革水电站技施设计工作时获得的。鲁布革水电站是中国水电基础建设对外开放的“窗口”电站，异域他乡的新技术、新经验涌进偏远闭塞的高山峡谷，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因此有了学习、创新的想法。他结合承担的溢洪道闸墩设计工作，采用了新型的预应力闸墩，这项成果最后获奖。

张宗亮坦言，自从有了这5年的积淀，让他从一个青年学生很快成长为能独立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而能源事业强国梦一直指引着他继续攻坚克难。

此后的一个个经典工程实践，使他一步步实现了从工程师到设计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再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的锤炼。作为项目经理、设计总工程师，他主持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勘察设计科研工作10年；作为院总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他全面主持糯扎渡水电站勘察设计科研工作15年；作为总工程师组织团队对小湾水电站开展勘察设计科研工作7年；作为总工程师带领团队对黄登水电站开展勘察设计科研工作10年……

37年里，他率团队完成云南省水电资源的深度复查、评估与研究，为实施“西电东送”“云电外送”战略，建设以水电为基础的绿色能源基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完成云南省境内43座水电站勘察设计科研工作，总装机容量3140万千瓦，总投资近3000亿元，对工程成功建设和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另外，张宗亮以天生桥一级、糯扎渡、黄登等高坝工程为依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取得诸多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成果推广应用后节约工程投资110亿元，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显著。



张宗亮学长

完成 70 座水电站勘察设计 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

“创新是职业道德和工程理念的驱动，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应该是在确保工程安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来降低工程投资、提高综合效益。”这是张宗亮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张宗亮作为设计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主持和组织完成国内外70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700万千瓦）勘察设计科研工作，建成了天生桥一级水电站、糯扎渡水电站、观音岩水电站、黄登水电站和红石岩堰塞坝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乃至世界第一的里程碑工程，代表着同类坝型筑坝技术世界领先水平。

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中，在他精巧周密的优化设计思路指导下，有效减少了工程量，节省工程投资约15亿元。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坝高178米，建成时为中国最高（世界第二）面板坝。这项工程荣获全国勘察金奖、设计银奖，成为我国高面板坝建设里程碑工程。

而黄登水电站，坝高203米，是中国最高、世界第二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引领了世界特高碾压混凝土坝的技术发展。

从2014年到2020年，张宗亮和他的团队再次创造了一项水利行业的奇迹。2014年8月3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里氏6.5级地震。在牛栏江红石岩，近1000万方的塌方体下滑形成堰塞湖，如果堰塞体右岸崩塌，将威胁下游两岸近3万人的安危。张宗亮带领他的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着不断的余震、塌方、滚石等危险，面对地质水文条件不明、溃堰类型不确定等难题，白天现场收集资料，晚上挑灯夜战，

开展堰塞湖库容计算、溃坝分析计算等工作，很快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排险处置方案。

随着红石岩堰塞湖险情的初步解除，抢险转入了以“保安减灾”为目标的后续处置阶段，张宗亮并没有松懈下来，他敏锐地捕捉堰塞湖的特点，创新性提出“除害兴利、变废为宝”的理念，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堰塞坝险情处置与开发利用保障技术与装备研发”。最终蓝图变成现实。红石岩堰塞坝已建设成为世界首座“应急抢险—后续处置—整治利用”一体化水利枢纽工程。2020年6月，此工程实现首机投产发电，而这一兼具防洪、供水、发电、旅游的综合水利枢纽，为贫困地区带去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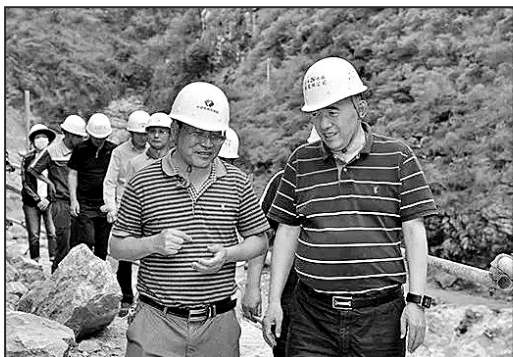
“荣誉是集体的，团队力量最伟大”

在和张宗亮的交谈中，他提到最多的就是他的团队，他说所有的工程建设，靠的是团队的力量。而这次获得的荣誉也是团队的、是集体的。

今年9月29日，在云南省科学家工作室授牌仪式上，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获批设立以张宗亮命名的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科学家工作室。

张宗亮说，这个科学家工作室主要围绕云南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开展绿色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关键技术研究，助推云南省绿色能源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张宗亮还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了国内最优秀的老中青合理的土石坝人才梯队，获得了“云南省土石坝创新团队”称号。在张宗亮主持糯扎渡勘测设计工作的15年里，带领由中国电建集团昆明



张宗亮（右）在工地勘测

勘测设计研究院、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等单位约150位研究人员组成的设计科研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了省级勘察、设计大师3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人。

“世界水电看中国，中国水电看西南。”37年来，张宗亮见证和亲历了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的高速发展，无论是坝高还是技术难度，都冲到了世界前列，实现我国筑坝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张宗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获发明专利16项；主参编行业标准15项；主编专著7部；发表论文85篇。2008年当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并先后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杰出工程师奖、潘家铮奖、中国大坝杰出工程师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等，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云南省科技领军人才，2019年，他率领的团队荣获“中央企业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称号。

“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为实现边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张宗亮的人生理想。

（转自《云南民族时报》，2020年11月11日）

全国劳模是怎样炼成的

——记东方电气集团赵永智校友

○刘广德

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赵永智校友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赵永智，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水电站水轮机水力研发方面造诣深厚，为东方电气乃至我国水电机组设计水平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极大增强了我国在国际水电行业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十余年间，赵永智带领团队以轴流、贯流式水轮机的水力研发为突破口，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并应用到实际工程项目中，全面打破了国外大公司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局面。

此后，赵永智将带领团队持续深耕水轮机水力研发领域，以东方电气为舞台，持续书写新篇章。

主持大型贯流式 巴西杰瑞电站的水力开发

巴西杰瑞电站是当年中国单项机电出口金额最大项目。2008年开始，赵永智率领研发团队通过大量的方案比选、流动仿真计算和模型试验对比工作，从众多研发成果中优选出水力模型，于2010年8月在瑞士洛桑工学院中立试验台与三家国外著名水电公司联合体进行了同台验收试验，并以优异性能参数脱颖而出。

借助杰瑞项目，东方电气为我国水力



赵永智校友

发电设备制造业培养了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队伍。

2017年4月，“巨型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关键技术研究及杰瑞机组研制”获四川省2016年度科技进步奖唯一特等奖。

赵永智作为四川省2016年度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代表发言，他直言：核心技术如同雄鹰的翅膀，是助力国家科技腾飞的利器，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敢为人先、永不服输的勇气，要有沉下心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方能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主持葛洲坝电站 125 兆瓦机组 增容改造的水力开发

葛洲坝水电机组在中国乃至世界轴流式水电机组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为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大幅度增加发电量，电站要求机组单机容量从125兆瓦提高到150兆瓦，增容幅度达20%，同时必须保持原有流道尺寸限制丝毫不

变，业内人士都清楚，这是摆在中国和世界水电研发工程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赵永智率领研发团队潜心攻关，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流动分析计算和模型试验数据对比分析，最终设计出了具有东方电气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力模型，并顺利通过了在中国北京水科院试验基地进行的国内外专家联合验收试验。

主持白鹤滩、卡洛特等 大型混流式水轮机的水力开发

卡洛特电站是三峡公司援建巴基斯坦流域开发的第一个电源点，是东方电气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项目。

此时的赵永智虽已身经百战，但他依然严肃对待，对技术细节逐一求证，最终开发出全新的水力模型。与此同时，赵永智还率领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其他超高水头大贯流机组的技术研发，切实践行了东方电气人铸就国之重器的初心和使命。

白鹤滩电站容量为世界之最，对机组稳定性和高效性的要求非常高。此前，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具备这样大容量机组的设计经验。

“拓荒”的任务又落在了赵永智头



赵永智校友（中）在工作一线

上。他带领研发团队不断进行参数论证、方案比选和重大技术问题攻关，最终赢得了百万千瓦机组的合同。

2016年，李克强总理视察东方电气集团时，作为百万千瓦白鹤滩电站水轮机总设计师，赵永智向总理讲述了东方电气如何凭借优异的水力参数和稳定可靠的水力方案赢得了用户信赖，获得总理盛赞。

抽水蓄能机组研发再立新功

随着中国电力建设的发展和布局调整，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机组成为电网必需的组成部分。为确保大电网的安全灵活运行，电网必须配备5%~10%的抽水蓄能机组。彼时，国内抽水蓄能机组正值从国外垄断向自主研发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特殊背景下，赵永智带领团队完成了以仙游、深圳、绩溪、敦化、阳江和长龙山为代表的大型抽水蓄能机组的研发工作，践行了“水电精品中国造”。

中国水电以无可争辩的水电核心技术赢得了世界尊重，更引领着国际水电领域往“技术更先进、自然更环保”的方向不断前进。作为中国水电领域的杰出代表，赵永智在默默奉献和努力钻研中日复一日，钻出了成绩，带出了队伍，让中国水电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

回望来时之路，他不禁感慨：“1989年，作为一名力学专业的青涩学生，我来到了东方电气，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我有幸参与了很多国家重大课题的研发，得到了锻炼成长。未来还有更多水电高峰等待攀登，我将再接再厉，与东电人一起，为实现制造强国梦想而不断努力。”



清华大学第二十二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

2020年10月24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友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海内外近200名校友欢聚一堂，研讨校友工作。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希勤，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韩景阳、袁驹、王岩出席。会议由韩景阳副会长主持。

王希勤副校长首先向校友们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疫情“大考”下的清华，疫情防控不松懈，教学科研不停步，改革发展不放松。围绕110周年校庆，王希勤副校长介绍了校庆工作的总体思路、核心活动、特色项目等内容，并代表学校欢迎广大校友积极参与校庆筹备和活动，集心、集力、集智、集资，为学校未来发展做贡献。

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从校友抗疫行动、109周年校庆、校友总会品牌活动、校友文化传播、展望与规划等方面汇报了校友总会的各项工作。

会议表决通过了校友总会章程的修订，并增选招生办公室主任余潇潇为校友总会理事。校友总会秘书长助理梅晓鹏对清华校友三创大赛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主持人韩景阳副会长宣布“第六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启动。深圳校友会会长武晓峰分享了深圳校友会的工作经验。

在唐杰秘书长的主持下，围绕“以110周年校庆为契机，凝聚校友、传承文化”，校友总会理事、河南校友会会长詹玉荣，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刘一民，校友跑步爱好者协会秘书长符全进行了第一

场主题对话；围绕“秉承‘三个服务’宗旨，进一步深化校友工作”，重庆校友会会长刘杰、城乡建设专委会秘书长张雪舟、技术转移研究院副院长李冰进行了第二场主题对话。

袁驹副会长向安徽校友会颁发了承办纪念牌，王岩副会长向第22次校友工作会议承办单位沈阳校友会赠送了校旗。沈阳校友会联席会长于宝海代表下届校友工作会议承办单位发言，表达了对下届校友工作会议的期待以及承办好会议的决心。

24日清晨，近200位校友齐聚合肥绿轴公园，举行了“全球同跑接力 母校百十献礼”活动。下午，与会代表就“凝心聚力，建言献策，深入参与支持学校发展”和“挖掘优秀校友，宣传校友事迹，讲好清华故事”两个主题分成五组进行了深入的互动研讨。25日上午，清华校友助力合肥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二届清华校友创新论坛在安徽合肥举行，来自产学研各领域人才围绕校地合作、科技前沿、职业发展等主题展开了学习交流。

会议期间，“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捐赠精品展校友工作会议专场”同期举行。与会校友代表还走访参观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周诒春纪念馆、兆易集成电路科技馆等。

清华大学校友工作会议至今已举办22次，是各校友组织团聚、分享交流的平台，更是传承清华精神、凝结清华力量的纽带。

（曾卓崑）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

11月7日上午,《清华校友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甲所第三会议室举行。《清华校友通讯》指导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成员,读者、作者、校友代表,以及校友总会和编辑部工作人员28人参加了座谈会。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史宗恺主持会议。

会上,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清华校友通讯》执行主编唐杰以“传承清华文化,讲好校友故事”为题,从《清华校友通讯》的历史发展脉络、当前工作现状和未来规划展望三个方面进行了汇报。复刊40年来,《清华校友通讯》始终以“传播母校信息、报道校友业绩、联系校友感情、弘扬清华精神”为宗旨,面向广大校友群体“讲好清华故事,讲好校友故事”。

在自由发言环节,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清华校友通讯》是“爱国奉献、爱校感恩、爱友互助”的清华校友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在加强校友和母校、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清华校友通讯》不仅仅是一本宣传校友的刊物,更通过鲜活、生动地记录清华史实,传承了清华精神、弘扬了清华文化,对研究清华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钱锡康、周家恂、孙哲三位老主编、老编辑分别回顾了工作经历、分享了工作中遇到的感人故事。前辈们从服务校友的优良传统、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挖掘校友资源等方面对办好刊物提出了殷切期望。

校党委原书记方惠坚在发言中表示,

清华校友工作有其特殊性,校友榜样在学校育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华校友通讯》是展现校友榜样、校友向心力的重要渠道和平台。随着学校研究生校友的增多,他建议校友工作和校友报道要关注和重视研究生校友群体。

校党委原书记贺美英在发言中表示,清华校友的凝聚力强,《清华校友通讯》对增进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增进校友之间的交流和互助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可以吸纳更多校友采取灵活的方式参与刊物编辑和校友工作。要重视刊物在校内的宣传和推广,让优秀校友的事迹和精神也能更好地影响在校同学。

校党委原常务副书记庄丽君在发言中感谢编辑部工作人员辛勤的工作,建议加强对70年代入学校友群体的关注,并希望《清华校友通讯》能利用好信息技术为年龄大的校友提供更方便的阅读体验。

校党委原副书记王凤生带来了他收藏的198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并讲述了《清华校友通讯》对自己开展工作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他建议要深入挖掘并更好地把《清华校友通讯》“用起来”,让宝贵的资料和事例为现在的工作服务。

校党委原常委、党办原主任白永毅既是《清华校友通讯》的热心读者也是“摆渡人”,经常帮助刊物约稿。她认为当前春夏秋冬四季号的寓意很好,并建议传承刊物编辑中形成的好经验、好传统。

法学院党委原书记李树勤认为,《清华校友通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复刊的。她是海内外清华学子重要的交流平

□ 校友联络

台和精神家园：是清华精神、清华文化、清华传统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源；是清华师生成才报国，并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展示窗口。

校史研究室原主任田芊提出三点建议：《清华校友通讯》今后要更致力于“校友”——传播母校信息、报道校友业绩、联系校友感情、弘扬清华精神；更致力于“通讯”——努力做到在校友中加强通讯，在通讯中联络校友；更致力于“清华”——保留清华的传统和特色，坚持清华风格。

袁帆校友是《清华校友通讯》的热心读者也是多篇有影响力文章的作者，他在发言中讲述了与《清华校友通讯》40年的渊源。作为清华历史研究的爱好者，他表示一流的大学应有一流的校友工作和文化建设，今天工作就是为未来发展做积累。

李军校友和郭谦校友目前是校友总会110周年征文活动的义工。李军校友建议对刊物的读者群进一步做数据收集和分析，对重点读者主动约稿，同时要调动院系、地区校友会组稿的积极性。郭谦校友一直关注在校生的发展，面对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他建议有针对性地寻找有相似经历的校友，总结提炼他们的人生经历，再通过刊物把这些精彩的校友故事传播出去，促进交流并发挥育人作用。缪杰校友说，每当收到《清华校友通讯》都会感受到来自母校的关怀，并时刻提醒自己清华人的责任担当。他希望在在校学生能从刊物中找到榜样的力量和前进的方向。校史馆、档案馆馆长范宝龙说，校史、档案工作一定要与校友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表示愿意与《清华校友通讯》合力做好校友文稿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为校史研究作贡献。

编辑部代表黄文辉回顾了工作中受到前辈指点和帮助的故事，分享了自己在一线采访校友过程中受到的感动和洗礼，并对各位领导、前辈、校友多年来对编辑部工作给予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

校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在听取了交流发言后表示，《清华校友通讯》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成为学校校友工作、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一个品牌，历任编辑部的同志们和校内外众多师生校友为办好刊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在今后的办刊工作中着力推进媒体融合，调动各地校友会组稿的积极性，基于优质内容不断拓展和延伸“产品链”，加强发行工作以提升刊物在师生中的“可及性”，进一步发挥《清华校友通讯》在学校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精神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后，史宗恺希望全体编辑人员向前辈们学习清华人特有的优秀品质——服务于国家的全局意识、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工作中严谨和执着的精神；明确《清华校友通讯》的定位，做好校友与母校、校友与校友之间联系的渠道和纽带；广泛征求校友的意见建议，改进工作，把刊物办得更好，不辜负学校和校友的期待。

《清华校友通讯》创刊于1934年1月1日，梅贻琦校长亲撰创刊词。由于历史原因办刊几度中断，1980年4月复刊，刘达校长题写刊名。2019年10月22日，《清华校友通讯》重新获批正式刊号。2020年，《清华校友通讯》创刊86周年，复刊40周年，出版满150期。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还有校友总会原秘书长郭樑、作者和读者代表祝守宇（1988级自动化）、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袁浩歌，以及编辑部全体成员。（田阳）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暨 2020 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12月19日上午，清华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2020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主楼举行。清华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邱勇，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袁驹等18位常务理事、42位理事出席会议。会议由史宗恺主持。

邱勇回顾了2020年学校的重大事件和“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举措。他指出，110周年校庆的主题是“自强成就卓越，创新塑造未来”，处在最好发展时期的清华，正通过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的努力，践行“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理念，建设更开放、更融合、更有韧

性的大学。史宗恺表示，理事实质性的参与大幅度提升了总会的工作水平，秘书处今后要安排更多交流活动，便于理事对学校的发展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了理事会会议议程，审议并同意成立清华校友总会化学工程系分会和清华校友总会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经唐杰提名，理事会议表决通过杨柳、袁浩歌担任校友总会副秘书长。

会议期间，与会理事围绕校友工作和学校发展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宋述强）

校友总会召开三创大赛秘书处工作会议

11月25日，校友总会召开三创大赛秘书处工作会议。校友总会秘书长、三创大赛执行主任唐杰肯定了三创大赛五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希望三创大赛在优化信息管理平台、建立有效机制、挖掘和整理需求及应用场景、推荐校友企业参与国家级赛事活动等方面加强工作。三创大赛秘书长梅晓鹏阐述了三创大赛的基本理念和继续办好三创大赛的发展目标，介绍了新一届三创大赛的组织机构建设，并提出了“三个服务”有机统一、服务国家战略、建设三创生态圈、促进校友工作四项原则。三创大赛秘书处王霞、邓永强、殷秩松等先后发言，表示要发挥各自代表的校友组织和企业优势，为办好三创大赛贡献力量。

校友总会副会长、三创大赛组委会主任史宗恺为三创秘书处领导班子颁发了聘书，并在总结讲话中肯定了三创大赛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要处理好参与各方的利益、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协调好三创与其他校友工作、地方政府及地方校友会的关系。他强调，创业校友既代表了技术运用方向和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前沿，也代表了清华人的特质和更高的个人素养。新的一届工作思路要更加强化对接和有效性，要像1980级夏淳学长辅导阿丘科技那样，真正发挥创业导师的作用。他还指出，三创大赛不仅要追求数量和规模，更要强调质量和精度，要重点对真正有价值的项目进行服务和推介。

（三创秘书处）

校友总会院系分会、专委会 2020 年校友工作交流会举行

12月10日，校友总会院系分会、专委会2020年校友工作交流会在罗姆楼举行，校友总会、各院系、各专委会有关人员80余人出席。会议由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袁浩歌主持。他表示，各院系和专委会的工作在联络校友、服务校友、凝聚校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校友关注母校、回馈母校提供了窗口和桥梁。校友总会首次举办院系分会、专委会联合的工作会议，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交流和分享的机会，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激发不同维度校友组织之间的能量，创新性地开展校

友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110周年校庆。

公管学院党委副书记谢矜、水利系系办副主任王春红、精仪系分会秘书长黄磊分别介绍了各自院系在多角度信息宣传、全方位校友服务、打造品牌活动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计算机系李静、交叉信息院谢琴、电机系韩丽英等从个人角度分享了在校友工作中的体会与感悟。AI大数据专委会秘书长王霞、先进制造专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笑怡介绍了各自专委会的发展过程、工作成果及目标，也表达了与学校院系加强沟通、协作的愿望。（黄婧）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学习日两周年 暨 2000 届校友秩年论坛举办

11月28日，“教育·创新·繁荣——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学习日两周年暨2000届校友秩年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80余位2000届校友出席了现场活动，数百位校友通过荷塘雨课堂在线收看了论坛。林成涛（1995级汽车）、吴华强（1995级材料）、刘敏华（1995级自动化）、刘文武（1996级美院）、李一诺（1996级生物）、慕磊（1995级力学）、田勇（1995级热能）、周枫（1996级计算机）、牟晓勇（1996级电机）、邹家佳（1996级经管）、孙伟（1996级精仪）、朱旭峰（1995级环境）、王立奇（1995级土木）、刘钢（1995级工物）、倪凤（1996级物理）、陈文斌（1996级水利）等16位来自各行业的2000届校友

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了他们对母校的感恩、对毕业20年的人生感悟，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校长邱勇和校党委书记陈旭对2000届校友毕业20年来发贺信，充分肯定了校友们在毕业的20年里，以青春奉献时代，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精神。原校长王大中和校党委原书记贺美英也发来贺信，希望2000届校友继续成才报国、服务社会，书写精彩人生。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在致辞中说，2000届在跨世纪和教育教学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仍然坚守着清华的优秀传统，希望校友们不忘初心，继续努力。校党委副书记过勇（1996级机械）在总结致辞中说，2000届校友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受

益者，也是清华精神的传承者。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一批十分优秀的校友，充分体现了清华人的自立自强和团结奋进的精神。

20年前，学校实施了本科专业学制的重大改革，1995级、1996级来自24个院

系，158个班的3400余名校友在2000年本科同时毕业。今年，2000届百余个班级捐赠了377万余元“9596校友基金”，将主要用于学校图书馆报告厅的改造建设项目。（宗慧）

● 院系工作

建筑学院第一期校友导师计划结业分享会举办

11月28日，建筑学院第一期校友导师计划结业分享会在系馆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校友分会秘书长张弘，1995级校友王舒展，1996级校友任飞、苏腾、刘剑锋、井忠杰，以及11名在校学员参加了交流。活动由学院校友工作助理许晓佳主持。

交流中，学员们就一年来的培养历程和个人感受进行了汇报，导师对过去一年的师生交流进行点评总结。王舒展老师表示，“校友导师计划”可以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达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是一次“双赢”的体验。井忠杰老师认为在帮助

学生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提升。任飞老师希望通过实际项目给与学生建筑实践的机会，让学员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真正的建筑实践与学院学习之间的不同。苏腾老师表示，和同学们相处的过程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大家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磨合出了默契。张弘老师在交流最后总结说，校友导师计划的初衷是为在校生的校友之间建立起一架桥梁，让在校的同学们能够真正了解工作的校友们都在干什么，对自己以后的职业选择有所准备。

（建筑学院分会）

电子系举办校友论坛云端研讨

11月14日，由电子系分会主办的第十二届系友论坛云端研讨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教育：在线教育未来观察与思考”为主题，邀请了4位在线教育领域头部企业的创始人展开讨论，约900多名嘉宾和师生在线参与。活动由电子系2003级校友、高榕资本执行董事辛旺主持。电子系主任汪玉阐述了“清华电子系—清华校友总会电子系分会—清华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三位一体的理念，希望通过这三个机构为所有系友、校友和朋友提供服务，各位嘉宾能够在此次论坛上充分讨论、

碰撞火花。在报告环节，学堂在线总裁王帅国为大家讲述了学堂在线的公益事业和商业发展之路。流利说创始人王翌以“AI为在线教育提供无限可能”为题进行了分享。火花思维创始人兼CEO罗剑分享了火花思维对未来在线教育的思考。紫荆教育创始人张博着重阐述了自己对科技与教育关系的思考。在圆桌讨论环节，围绕职业在线教育的难点、AI教学相比视频录播的定位和前景、AI在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等问题，几位校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回答了听众提问。（电子系分会）

各地校友会简讯

深圳校友会 2020 年重阳节 敬老团拜会举办

10月25日重阳节，2020年深圳校友会敬老团拜会举行。武晓峰会长，连果义等12位副会长，高朝阳秘书长等180多人参加。武晓峰代表校友会向到场的老学长们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希望他们多与年轻校友分享奋斗历程，使清华精神发扬光大。深圳校友会原会长姚耕陶、校友总会原秘书长刘敏文先后发言，对老一辈清华人为深圳所作贡献表示肯定和祝贺，并期待年轻校友为深圳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次活动还进行了歌舞表演和现场抽奖，会场气氛充满了欢乐和温馨。

（深圳校友会）

南京校友会 2020 年 迎新校友座谈会举办

11月1日，南京校友会2020年迎新工作座谈会举办，近60人参会。校友会秘书长沈国栋介绍了南京校友会的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并对年轻校友们提出了希望。栖霞区科技局副局长蔡现军和高新区副主任徐薇介绍了清华相关项目落地栖霞的案例，鼓励更多的清华校友到栖霞干事创业。承办方南京源堡科技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冰介绍了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潘时龙、团市委副书记石磊以及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游石基先后发言，希望年轻校友传承老一辈学长们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奋斗，努力做合格的清华人。

近年来宁工作的校友依次做了自我介绍。最后，校友会执行会长陈承仁作总结发言，希望校友们立足本职工作，能力与品德并重，做到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南京校友会）

德国校友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在线举行

11月7—8日，德国校友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在线举行，近百位校友和家属欢聚线上。秘书长吴春艳等主要负责人就本年度校友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张建伟会长主持了理事会改选并做了会议总结，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参会并致辞。

吴春艳和瑞士校友会秘书长方念东共同主持校友分享环节，多位受邀校友就健康养护、投资理财、亲子教育及艺术鉴赏等话题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张建伟对瑞士校友们的参与表示欢迎，并感谢校友总会海外校友会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的分享。瑞士校友会会长叶海文和欧洲清华汽车行业校友会会长陈国辉先后就瑞士校友会的成立和发展历程及欧洲清华汽车行业校友会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多位受邀校友嘉宾围绕科技和时政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分享。

（德国校友会）

山东校友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11月8日，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9周年暨山东校友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100多名校友参加。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袁驷介绍了母校的发展近况，并预祝大会成功举行。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马仲才回顾了清华的求学经历，讲述了清华精神对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山东

校友会会长刘东海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刘东海连任会长，并向大家阐述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各位理事齐心协力，共同把校友工作做好。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出席本次会议。（山东校友会）

全英校友会 2020 年换届会议举行

11月21日，全英校友会第十届理事会换届会议在线上举行，共有40余位核心成员参加。会长郭毅可提名2005级自动化系校友高远为新一任校友会秘书长并获通过。高远校友于2011年和2016年分别取得纽卡斯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燃烧学博士。目前在瑞士再保险集团（Swiss Re）任量化分析师。她2010年加入校友会，历任校友会北方地区负责人、财务、副秘书长和副会长职务。郭毅可肯定了高远和上任秘书长孟巍为校友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强调未来的国际环境将充满机遇、挑战与变数，校友会更应及时把握方向，为校友事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孟巍总结了上一届校友会执委的工作。高远作了就职发言，并介绍了第十届校友会的核心组织架构以及工作展望。

（全英校友会）

河南校友会庆祝母校 109 周年华诞 并召开 2020 年理事会、迎新会

11月21日，河南校友会庆祝母校109周年华诞暨理事会、迎新会在郑州召开。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校友三创大赛秘书长梅晓鹏，清华附中郑州学校执行校长郑紫烟，河南校友会会长詹玉荣、名誉

会长施锦珊等出席，40余名新校友参会。线上8000余名省内外校友和嘉宾观看了视频直播。唐杰介绍了母校和总会的近况，充分肯定了河南校友会的工作，并作了主题报告。梅晓鹏宣读了校友总会关于“中原赛区承办方”的批复，并宣布第六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中原赛区正式启动。郑紫烟介绍了附中自落地郑州以来的发展状况。施锦珊在发言中针对国际形势及国内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作了精准解读，还在现场捐款30万元助力校友工作发展。詹玉荣做理事会2020年工作报告，并畅谈了2021年校友会的工作计划。在下午的迎新座谈会上，詹玉荣和梅晓鹏对新校友进行了勉励，与会新校友逐一自我介绍并汇报工作情况，参会的各位学长也对新校友寄予了殷切希望。（河南校友会）

广州校友会喜迎 2020 届新校友

11月29日，广州校友会举办了“广州欢迎你，我们拥抱你”的迎新活动。新老校友们先后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和小鹏汽车智能产业园。交流晚宴由徐春龙秘书长主持，校友会执行会长贺臻向新校友们表示欢迎。小鹏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夏珩（2002级汽车）讲述了他的创业历程，与师弟师妹们进行了互动。石安海学长代表广州校友会向夏珩赠送了纪念品。各分会和各运动队相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校友会丰富多彩的活动，并为各自的队伍“招贤纳士”。刚到广州工作的陈致佳、岳慧慧分享了各自对工作选择的心路历程和参加工作以来的心得体会，并代表全体年轻校友向校友会和鹏汽车表达了感谢。

（广州校友会）

一本父亲钱伟长写给我的书

○钱元凯

我出身于书香之家，书是我家三代最重要的物质财富，读书是全家人最大的精神享受。从记事起，妈妈每晚都要给我读一段故事，然后我带着书中的那些悲欢离合进入梦乡。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自己读书，无论在清风习习的夏夜翻动书页，还是在北风萧萧的寒冬围炉夜读，都成为儿时挥之不去的最温馨的回忆。大约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可以自己买书了。那时的新华书店都是闭架售书，因为是常客，售书的阿姨特许我进柜台选书，我还能缩在柜台里面悄悄地读书。有一次我买了一本讲宇宙和天文的少儿读物，书中讲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为何月亮有圆缺、为何一年有四季，地球有8个兄妹一起绕着太阳转……我和妈妈谈及此事，她告诉我，这是一套讲科学的书，如果喜欢，还可以读其他几本。于是我成为了这套丛书的忠实读者，为了满足我的需求，书店曾经向新

华书店总店调货。

一天，父亲偶然从我小书架上一堆童话书中看到这些科普读物，问我看得懂吗？喜欢什么？我说从书中我知道了很多新鲜事，还认识了许多大科学家。他问我知道哪些科学家，我如数家珍般道出了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瓦特、爱迪生……他又问我：“这些都是外国人，你还知道哪些中国的科学家？”我想了半天，犹豫地报出李冰（我在四川出生，妈妈带我去过都江堰）、华佗（妈妈讲故事提到过）。父亲有些不快，惋惜地责备我：“你是个中国人，怎么只知道外国人的本事，不知道咱们老祖宗的功劳？”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书上没有写过，你也没有讲过！”父亲沉默了。

这是我第一次让父亲无言以对。

此后我发现在父亲的书桌上，除了一摞一摞的精装外文书以外，还出现了线装中文书。

我的外公收藏古籍。在他的几个儿女中只有妈妈是学中文的，因此他到晚年就将这些珍藏都送给了妈妈。父亲书桌上的线装书酷似外公的收藏，为什么父亲要看外公的书了？也是这段时间，妈妈也常常从外面带回一包一包的古籍。这些书与家中的藏书不同，不但有文字，还有图。我好奇地翻看，妈妈急忙制止我，她说这些书都是从图书馆或叔叔阿姨家借来的，十分珍贵，万一撕坏或弄脏了，实在赔不起。我奇怪父亲为什么要读这么贵的书，



一九四六年，钱伟长回国后
与儿子钱元凯在清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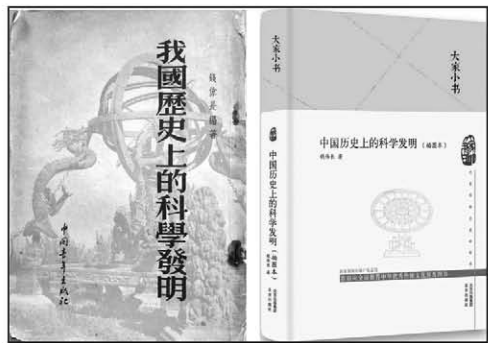
妈妈说：“爸爸要给你讲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在我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父亲把一本薄薄的小书放在我的面前，缓缓地说：“三年前你埋怨我没有给你讲过中国的科学发明，今天我讲给你。”他接着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强国，只不过晚清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才让中国积贫积弱，受尽欺凌。现在新中国挣脱了枷锁，成为东方的大国，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科技方面，我们仍然落后。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这本书，是希望你和你们这一代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受到鼓舞，长大以后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再次建设成世界强国！”父亲交给我的，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回想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刚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力学研究生，并全力以赴地展开“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研究（此后这个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也是在这时候，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被委任为中科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积极筹划组建力学所。同时他还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投身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等院校翻天覆地的院系调整与教材更新中。此外他还在1950—1951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及副秘书长、中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年代，有多少事需要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但是《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正是在这个阶段成书，显然，他认为向新中国的青少年介绍祖国古代的科学发明同样重要。

书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话首先需要精通文言文，对此父母可谓得天独厚。父亲的古文造诣来自家传。我的祖父钱挚是清末的读书人，靠教书为生，可惜英年早逝。父亲靠他的四叔——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接济读完高中。考清华时，一道有关二十四史的考题难倒诸多考生，甚至有人交了白卷，但是父亲得到满分。母亲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高材生，曾师从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等教授，有扎实的古文功底。

写作还需要大量的资料，这才是真正的难点。那时没有“百度”“知乎”，没有“谷歌”，有关科技史的材料散落在古代典籍中，即使找到有益的参考资料，按照父亲做学问的习惯，也要尽量找到原文加以印证。当时我国古籍复刻的工作尚未起步，涉及的原本多属收藏级的珍本。他们通过自己师生、朋友的关系，由母亲出面，跑遍北京各院所的图书馆、资料室，或调阅、或摘抄，并为此建立了专用的卡片柜，父亲再对获得的资料进行评价总结，并撰写成文。这些工作大都是在晚上



左：《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钱伟长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8月出版。
右：《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钱伟长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 名师轶事

12点繁忙的业务工作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有的章节甚至是在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赴东北的火车上通宵撰写的。父亲陆续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等文章投稿给《中国青年》杂志，算是阶段性成果。从1950年到1953年，父亲用了3年时间写出了6万余字的《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这是在他一生所有著作中耗时最长、字数最少的一本。书籍付梓之后，父亲还在考察、参观、旅行途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希望可以不断完善这本书的内容和图片。从1953年至今，包括北京出版社在内，已经有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本书。现在读者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是父亲与几代编辑心血的结晶，而这本爸爸写给我的书，已经激励着三代年轻人踏上了建设祖国的征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悠悠岁月中我慢慢体会到父亲当年在百忙之中坚持写这本书的良苦用心：它不仅是一本科普书，更是一本爱国主义的教材。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不单纯是一部中国科技发展史，还是一部中外科技发展的比较史。在每个章节、每个重大的科学发明中，父亲都尽可能地找出西方或其他文明古国达到同样水平的国家，还对很多技术给出了从东向西传播的路线图。他是用事实告诉读者，在人类几千年的科技发展史中，我们中国人曾经做得更早、更好，曾位居领跑者的行列。爱国不仅是爱我们秀美的山川土地，爱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爱我们蒸蒸日上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与传统、了解我们成长的历程，为我们的成就而自豪，为我们的挫折而警醒。



钱伟长和夫人孔祥瑛

人类历史不仅是朝代的更迭、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还包括文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父亲就是希望通过这本小书，默默地用爱国之情浸润读者的心灵，增强青年读者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让我们能在风云变幻的征途上临危不惧、荣辱不惊，为建设祖国奋勇前进。

1972年父亲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刁钻的记者挑衅地发问：“1949年以来，中国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呢？”父亲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穷，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当时全场掌声雷动，很多华侨、华人老泪纵横。

谨以父亲这段发言作为本书最精炼的寄语。如果年轻的读者还能从本书得到乐趣，受到教益，那么就是对一位老科学家最热情的点赞，最深情的纪念。

（转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9日）

暮年漫谈（节选）

○费孝通（1935 届研）

编者按 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本文节选费孝通先生93岁高龄时亲撰的《暮年漫谈》（刊发于《群言》，2005年第5期），讲述的是1928—1944年期间先生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在燕京、清华和海外求学及归国后在云南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经历，以作纪念。

1928年，我从东吴大学附中毕业，直接升入东吴大学，这中间曾经报考南洋大学，但是没考上。当时大学生普遍都想毕业后出国留学，不然就觉得低人一等。对我来讲这种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说起来也是年轻人争强好胜。小的时候，由于我家的经济条件比外祖父家差，我们几个兄弟心里不服气，暗地里跟几个舅舅比赛，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要超过他们。几个舅舅天分都很高，学习成绩很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舅舅在国外留学了，我当然不能落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国留学，不能落在舅舅后边。

在20世纪初，像我这样家里没有条件送出国留学的人，有几条路可走。一条是考官费。记得当时清华每年会在报上登出公告，写明这一年有哪些学科招考官费留学生，要考哪几门功课等等，一般一科只

招收一个人，各校拔尖的学生都会报名，考上了就像中状元一样。据我所知人类学只招收过一次，是许烺光考上了。我二哥费青，也是考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

另一条路是争取国外大学的助学金，这需要有教授推荐。那时国内的普通大学与国外联系比较少，所以推荐的机会也少；然而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联系多，推荐学生的机会就多。有的学生为了得到推荐的机会就多方设法托关系、走门路，甚至巴结老师。那时最好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第二是南洋大学。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东吴大学就差一点，我们讲的是“苏州味”的英文。

还有就是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先工作几年后再出去。林耀华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在东吴大学上二年级的时候，碰到了“五卅”运动。我是学生会的干部，跟



一九三六年，费孝通在清华

□ 名师轶事

大家一起上街游行。恰巧这时医务室的一个校医与某学生发生口角，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当局明显偏袒校医，学生们很不满意，事情越闹越大，整个校园闹起来，学生们开会声讨、罢课抗议。事情平息后，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因为大多数老师认为我的功课好、品行也不错，就没有开除我，但是东吴大学是不能要我了，责令我转学。这样我就到了燕京大学。

那时候燕京大学允许新入学的学生，先听课再选择专业，可以挑选先生，我就将各个系主任讲的课听了一遍。记得我听了比较有名的、教心理学的陆志伟先生的课，也听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世濂的课，最后我选定了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系我认识了吴文藻老师。我知道他是我小时候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所以从心里就认定他一定是个“不凡”的人才。后来逐渐加深了了解，吴文藻老师的确是与众不同。比如燕京的一些老师都用英文给学生上课，甚至国文课都用英文来讲，有的老师还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但是吴文藻不这样，他用中文给我们讲课，记得他曾经用中文给我们讲解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用中文讲英文教本，实际上就是现场“口头翻译”；吴文藻也不给自己起外国名字，后来他更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这是吴老师的特点，有中国味，我是很赞成的。

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是当时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要出国就得有老师推荐，我就跟定了吴文藻老师。我从燕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的机会，但是与我同时毕业的还有杨庆堃，为了不跟好朋友竞争，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听从

吴文藻老师的安排，报考清华研究院。其实吴老师有一个大计划，他想经过司徒雷登的同意，把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进到燕京，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在哈佛大学成立100周年的聚会上，同当时社会学界的领头人、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接上了头，马氏同意了吴老师的设想。可惜后来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为了“社会学本土化”，吴老师千方百计想通过各种渠道把他选中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谁去哪里，跟哪位老师学习，怎么出去，他心里都有数，他想通过清华送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

那时，燕京校园里学术空气活跃，在社会科学圈子里，一些学历史学的人成立了“神州国光社”，用马列主义观点讲中国社会史，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双方论战激烈。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争论加强了我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决心。在双方论战的人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他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的变迁的。

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经过一年准备，我终于踏上去英国留学的道路。

1938年，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国大地。我从英国辗转回到昆明，便立即加入吴文藻老师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下乡搞实地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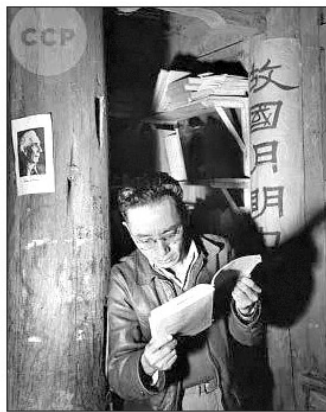
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

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经吴文藻的介绍，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我们把一层做了厨房，自己开伙；二楼摆上桌子办公；三楼住人。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等几个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情绪很高。后来大家都把这里叫做“魁阁”。

我没有住到魁阁，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按当地民间习俗，不是当地的人是不能把孩子生在这里的，我们不得不住到呈贡县城一个姓李的保长家里。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是猪圈，真是别有一股气味。不久孩子就降生了。

魁阁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我在魁阁算什么角色呢？可以说是个“小头头”或“大服务员”吧。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是在读的学生，他们是联大或清华的毕业生，是助教待遇；我在这里也不正式开课，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满意老的那套讲课方法——先生讲学生听。我就学马林诺斯基老师的“席明纳”那套，用讨论的办法，由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提出问题，想出研究的路子，然后下到实际中去观察、调查，各人做各人的题目；过一段时间再集中起来，大家一起谈感受、念论文，我谈我的看法，他们讲他们的道理，互相争论、共同研究，无拘无束。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比如张之毅跟我搞农村调查，田汝康到一家国营机器厂调查女工情况，谷苞研究地方社区、村子的行政系统……

我们出去搞调查是打着云南大学的牌



青年费孝通在魁阁

子，通过县、乡政府下去，靠了行政系统还是行得通的。当同学们选定题目，确定调查点以后，我就去跟有关单位接头，向他们讲清楚调查的内容、调查的目的、有什么意义和商量一些细节。同时我们还尽量利用一些私人关系来打开局面。田汝康去机器厂调查，就利用了跟厂里管事的人相熟，住到厂里去，能够接触到女工，后来写了《内地女工》的调查报告。我去禄村也是靠了私人的关系。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到昆明，人地生疏，去哪儿搞调查一时还没着落。这时候我在街上偶遇在昆明工作的燕京同学王武科，他的老家在禄丰，而且是个“大户人家”，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带我去去了禄丰，介绍我住到他亲戚家，这家人信奉基督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信基督教的姨母杨季威这时正在这里传教，村里人都知道她，凭着同学的亲戚和姨母的关系，我很快被当地老百姓接纳，他们愿意跟我谈心、讲真话，这对调查工作大有帮助。后来张之毅参加进来，我带着他串门调查，同农民打交道，让他知道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等。事实上我在魁阁只带了张之毅一个人。

如果说在禄村我是靠私人关系打开了

□ 名师轶事

局面，那么易村这个调查点则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仅仅和当地政府接洽一番后就贸然闯了进去。这个地方离昆明约150公里，只有一段路通汽车，剩下的路程只能骑在运货的马背上前进，这段路整整走了6天。这次旅行已经过去了60多年，然而当年旅途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天马帮在滇池边寨子里过夜，没地方住，我和张之毅就在一座破店的菩萨脚下搭个铺位睡下，月亮慢慢爬上屋顶，透过残垣颓壁洒在菩萨身上，四周一片寂静，望着幽幽的月光，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我还记得，在一所村子里的小学校借宿，清晨告辞时，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硬要塞给我们十几个鸡蛋，说是带了路上吃。

易村是一个很少有外地人进入的偏僻小山村，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却要硬生生地打进去。初到那里，村里安排我们住到一所无人居住、颇为宽敞的房子里，我对张之毅说，这里面一定有“道理”，后来一打听，原来这是一间经常闹鬼的“鬼屋”，没人敢住，所以借给我们，我们就住在鬼屋里开始工作。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自然是不欢迎，甚至生出我们会妨碍他们生活的传言。我们就和村民拉家常，不断地向村民解释来这里的目的，说明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计。那时我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课，不能在易村久留，十多天后就回昆明了，留下张之毅一个人。经过他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易村手工业》的调查报告。易村之后，我们又开辟了玉村的调查基地。

我的这套做法吸引了一批同学参加进来，在魁阁形成了一支大约有十几个人的小小的研究队伍，并且搞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除了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

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还有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政权》；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为了在魁阁的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我们就自己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刷，此外还准备了一部分英文材料。因为我们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这时许烺光来我们这里看过，太平洋学会的人也来了；还来了一些外国人，李约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我们的评价还挺高；费正清（Fairbank）夫妇参观时看得很细，回国后为魁阁做了不少宣传，以至于魁阁在国外的名声比在国内响，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劲头。后来太平洋学会出版了我们的一本书。这些事情促使了我能够作为云南大学教授，被派到美国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这段时间里我一面讲课，一面写文章，还要自己动手刻蜡版、印刷、出“小报”，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却劲道十足。

1944年我从美国访问回来，想继续在魁阁搞学术研究，但是，国内时局更加动荡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昆明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李闻事件”。我也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被迫于1946年底远赴英伦暂避。延续了6年的魁阁也在这样的局面里收场了，这个收场好像是个没有“结束”的结束。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努力争取做到自己的步子能够合上时代的节拍，这样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后话。

你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纪念童诗白先生

○胡东成（1970届电机）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电子技术学科主要奠基人童诗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童诗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胡东成教授的回忆文章，本刊特此转载，以志纪念。

童诗白先生是我国电子技术学科的奠基人，是著名的电子学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一生中在业务上受教最多、受惠最大的恩师。今年适逢童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一个跟随先生二十多年的学生，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先生的生平志业，以表纪念。

童先生的一生都和书有关：读书、教书、写书。童先生本人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充满学问和正气的书，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智慧、灵感和力量。

1946年，童先生结束了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涯，开始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教书。两年后又远涉重洋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再次读书，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局严格限制旅美中国科技人员回国。童先生的博士论文涉及军工机密，而且他了解贝尔实验室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他的回返更是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先生满腔家国情怀，心意已决。他放弃种种优厚待遇，拒绝加入美



一九九六年，童诗白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

国国籍，拒绝美国空军基地有关导弹研究的聘请。他不理睬校方的训斥，不顾忌移民局的威胁，不在乎联邦调查局不止一次的谈话和要求定期到有关部门报告行踪的监管措施。先生的一身浩然之气、铮铮铁骨，日月可鉴。所幸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留美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开展了大量外交工作，先生终于获得机会，于1955年6月踏上了日夜思念的故土，重返清华教书。

中国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亟待打开通向先进科技的大门。童先生深感科教兴国的紧迫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一回来，便在清华—中科院联合举办的我国最早的自动控制讲学班大显身手，同时立即着手创建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此后整整五十年，先生心无旁骛地在电子信息与自动化领域辛勤耕耘，担负起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之责。

童先生对全国电子技术课程的引领作用首先是通过写书实现的。先生认为，教

□ 名师轶事

材是课程内容的载体，课程内容体系的确立和改革最终都要由教材来体现，因此教材是课程之本。一定要把教材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课程体系改革的抓手、动力和标志。

先生写的书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掌控教学改革节奏。每当电子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先生总是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求新的进取精神，迅速写出新教材，反映前沿知识，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他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四种配套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结束了当时只有苏联教材的历史，并且建立了整流—放大—振荡—脉冲的新课程体系。70年代初，面对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重大变化，他和几位老师一起编著了《晶体管电路》及《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解决了我国电子工业起步时面临的燃眉之急。当集成电路兴起，分立的晶体管器件被淘汰，他又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及时主编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组织编写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为国内高校领路。当集成电路从小规模上升到大规模/超大规模的新台阶时，他又于1987年和2000年两次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启发性。童先生这些不断问世的新书，携带了电子科技发展的印记，留下了先生学术创新的足迹，也记录了我国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历史。

记得童先生说：“‘文革’结束了，我们不能把书架上的书拿下来掸掸土接着用，要赶紧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给学生最新的教材、最好的课程。”先生“掸掸

土”的形象说法，让我们理解了他的思想，也感受到了他行胜于言、勤勉敬业的作风。那些年，我们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四楼阅览室看到先生的身影，他广泛阅读国外最新期刊，孜孜不倦地研究技术发展动向，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潜心推进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即使在年过八旬且视力衰退之时，他仍凭借娴熟的英语，高度关注着发达国家的最新资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系统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电子技术发展史，高屋建瓴地思考和总结其内在规律。和童先生相比，我们这些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教学的后人，无论是学术高度还是科学精神都难以望其项背。童先生是一座至今还没有被同领域后来者逾越的高峰。

先生写的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类多、数量大。先生亲自主编的教材达12套，19本，800余万字。先生还组织指导其他教师编写教材、专著和翻译国外教材十余套，编写校内讲义十余种。由于这些教材都是国内最高水平，而且每每填补空白，满足急需，故犹如雪中之炭、久旱之雨，深受各高校和广大读者欢迎，因此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先生有多本教材的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其中《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还创下了国内同类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种教材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在先生统一的顶层设计之下互相配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它们中有关于基础理论的，也有关于实验技术的，还有关于课程设计的；有基本的教科书，也有对应的习题解答，还有全国试题汇编；有本科层次的各类教材，也有适用于研究生的《现代电子学及应用》和《电子电路故障

诊断理论基础》等。如果没有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如果没有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构建这样的教材体系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都夸赞先生是高产作家，其实我更愿意称颂先生是一位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艺术大师。他写书从不粗制滥造，而是精益求精，极为严谨。每个章节，每个段落，每句话语，每个用词，他都反复推敲，力求准确，一丝不苟。就像在不断“迭代”，直到满足条件、逼近理想目标为止。先生常说：“写书写文章难免有错漏，检查改错就像‘捉虱子’。查改了一次两次以为不会有错了，可是实际上会发现还有问题，所以要不厌其烦，严谨仔细。”我想，这不就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传世名句“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中道出的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刻苦用心的经验之谈吗？先生的精心，造就了著作的精致，也就使之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

先生令人佩服之处还在于他工作效率极高，查文献一目数行，想问题从容不迫，进退自如。我觉得，古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似乎就是先生写书过程和境界的最好写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先生的教材屡获大奖，先生主持的“电子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荣获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唯一的本科特等奖，都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二

再说童先生的教书，也是绝顶的高超。

先生讲课思路清楚，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步步深入，不仅有纵向分析，还常有横向拓展，以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



20世纪80年代，童诗白教授讲授电子学课程

通。先生教态端庄，举止洒脱，气质高雅，风度翩翩。而且难得的是先生天赋异禀，有一副浑厚圆润而富有磁性的好嗓音，使他的讲课变得更有魅力。学生反映，听先生讲课像是在海上冲浪，与其说是紧张，不如说是享受。“文革”中后期“复课闹革命”，校内传出童先生要讲电子学的消息，各系学生争相前往，结果教室爆满，不得不几易课堂。即使如此，最后大教室的墙根下仍然站满了听众。

先生的启发式教学，除在讲课中体现，在指导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时同样十分明显。先生提出问题，也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先生引出思路，也让学生通过交流讨论明确“主导思想”。师生之间，不是“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像梅贻琦老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所描绘的“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那样，童先生是前导的大鱼，学生们是尾随从游的小鱼，一起在知识海洋中遨游探索。小鱼“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从孔孟开始古已有之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梅校长作了解读和倡导，到童先生这里则发挥到了极致。

先生教书，从不忘育人。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先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常

□ 名师轶事

常在很自然的语境中引导学生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应有的价值追求。有一事让我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初每次博士生招生面试，先生总要问考生：“你为什么来读博？”然后又总会善意地提醒：“如果想当‘万元户’，就不要来我这里了！”“万元户”是那个年代大款富豪的代名词。先生的意思，不是说年轻人不应该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说读博士可能挣不了大钱，做学问难免会清贫寂寞，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先生告诫学生说，在学术的殿堂里，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经得起诱惑，持守好内心的一片净土。一旦选择了走科学的道路，确立了为我国科技现代化而奋斗的志向，就不要被荣华富贵或贫困卑微所扰乱和改变，也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童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淡泊名利、不计较得失的高尚贤达之人，他潜心于学问，醉心于科学，将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电子技术教学事业。他在默默的工作中展示自身的价值，在艰苦的努力中享受成功的喜悦。他做了学生的表率，成了学生的良师益友。榜样的力量润物无声，强过说教千百倍；学生的品格潜移默化，在从师学习过程中逐步得到升华。正是因为身教重于言教，先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先生教书，还特别强调教学和科研的融合。童先生认为，不搞科研，教学就不会有深度，就上不了水平，或者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搞教学，且不说丢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科研工作也往往会缺少知识的广度，或者缺乏系统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在电子学教研组成立不久，童先生就带领大家在承担教学任务的



1992年，童诗白先生（左1）指导博士研究生修林成，旁立者为胡东成教授（右1）、韩英铎教授

同时开展数控机床、工业自控等研究，后来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自动化仪表与装置博士点，深入开展电子电路故障诊断和可靠性理论、电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微机应用、电力电子等研究工作，承担了大量重大科研项目。童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使这里出现了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可喜局面。

科学是严肃的，科学家却可以是活泼开朗、很文艺很浪漫的，尤其是当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时候。童先生喜爱音乐，精神生活十分富有。他小提琴拉得极好，弹钢琴是他的最爱，兴之所至，还会亮出其美妙的歌喉。他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已是清华音乐室的常客，是学校管弦乐队的主力。先生不仅精于文艺，而且能打一手好网球；虽过古稀之年，仍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出现在网球场上。

三

童先生之于我个人，真是师恩如山，师恩似海。我从1973年起，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先生细致耐心的指导和教诲。从参加晶体管电路习题解答部分编

写工作，到参加中央电大教学辅导、编写辅导材料和播讲辅导课程；从参与教材编写的外围工作，到翻译出版美国著名教授 Millman 的微电子学教科书（另一位译者是孙昌龄老师）；从为工农兵学员讲课，到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六个班主讲电子技术基础大课；从申请电子电路 CAD 和电子系统可靠性课题，到赴西德学习之前反复选择学校、导师及研究方向；从作为副导师协助先生指导博士生，到自己成为博士生导师，我的业务一步一步向前走，都归功于先生的悉心栽培，都浸透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对大课教师的要求很严。对我们这批在“文革”中毕业、尚未赶上中高级职称评定的青年教师，教务处不同意担任重要基础课程的主讲教师。为此，童先生亲自到学校去介绍我的情况，为我做担保，同时又在我备课时给予许多具体指导。我给自动化系 1977 级和电机系师资班合班上的那次大课，教务处长从头至尾听了一个学期，作了深入的调研和质量监控。最后课程圆满结束，在学生评价打分时获得全校各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的最高分，处长终于松了口气。老先生对青年教师的信任提携，教务管理部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传承。

童先生担任全国电子技术课程指导小组组长多年，常安排我跟随参加一些会议或活动，给我创造机会开拓视野。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课程指导小组决定编撰《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模拟部分）》和《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数字部分）》两本书，我任副主编，负责模拟电路部分的筛选、分类和统稿。这部书不

是简单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道试题，也不仅仅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教学基本要求，分析题目的特征，如试题分值、限定时间、难易程度、题目类型、答题方式、章节内容等，建立评价体系，给师生以指导。为便于计算机检索，还要编出试题特征码。这是课程建设中一次新的尝试。我所涉及的部分有 154 万字，约 2000 道题，工作量巨大。而且由于评价体系复杂，又要求准确性和权威性，所以困难重重，有几次我都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每到这种时候，童先生就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还亲自复审稿件，为我指点迷津，解决疑难问题。是童先生替我撑起了一片天。此后我回想自己的业务成长道路，我得到过很多老师和同事的帮助、指导，但是对我帮助最大、指导最多、时间最久的，唯童先生一人。常有人说，人生相逢是缘分，而我想说，与童先生相遇是我的幸运。

童先生不仅对我如此，对教研组其他中青年老师也都是尽力扶持，帮助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先生指导别人写了论文或完成了科研课题，常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甚至干脆不署名；先生写书时会拆分章节让年轻人上阵，让大家都得到锻炼，大家都有功劳。但为确保书稿质量和文风统一，他最后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全部稿件，甚至几乎重写。他就是这样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子，甘当小字辈的坚强后盾，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奇峰突起。

四

童先生的为人为学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他自身真的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教科书。这次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我们重

□ 名师轶事

读先生这本书，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和认识：

我们读懂了，“童诗白”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代表着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着一种高尚的精神情操和道德风范。我们读到先生的言行举止，看到的是恢弘的清华精神和中华文化的根脉。我们读到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做法，看到的是教育的根本和未来的方向。先生是大师，是脊梁，是表率，先生的著述与思想都将作为宝贵财富而载入史册。

我们读懂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要想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就要像童先生那样自强不息。先生做事，目标明确，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先生的精神还表现在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又“无问西东”，虚心学习别国长处。

我们读懂了，在团队中要学会与人相处，做人要像童先生那样厚德载物。先生谦逊良善，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助人为乐，处处以身作则。在先生的团队里，长者提携后辈，青年尊敬前辈。事实告诉我们，教学科研工作要想健康发展，一靠领军人物，二靠和谐团队。

我们读懂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教育教学的热爱、忠诚与坚守，是对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脚踏实地，无怨无悔。用内心宁静抵御外界喧嚣，用聪明才智把握教育规律，用辛勤汗水收获桃李满园。

我们读懂了，从事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要做好读书、教书、写书三件大事。读书是终身的，停止了阅读就停止了进步。教书是一门艺术，在讲台上达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引人入胜的三个境界需

要台下的扎实功夫。教书有一件要务，即必须和科研融合，这是“核心价值”，需要加倍努力和付出。写书是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与提炼，它基于历史的积淀，反映当今的水平，培养未来的栋梁。写书就要学习童先生，尊重科学，坚持思考，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及时跟进新科技，永不止步求完美。

在纪念童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健在的童师母——郑敏老师，今年7月18日她也过了100周岁生日。郑老师集诗人、哲学家、教授、歌唱家于一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闻名于诗坛，是“九叶派”诗人中如今唯一在世的一叶，被誉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常青树”。郑老师的成就斐然可观，同时她扶助了童先生一生。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童先生的“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多年来，郑老师对我们这些童先生身边的学生和教师一直十分关爱，每次和郑老师聊天，我们总能增长知识。有一次她聊起结构和解构的关系，既有诗人的激情和独特视角，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和逻辑思辨，令我这个理工学子茅塞顿开。郑老师现在身体很好，头脑清晰，她的女儿童蔚告诉我，她如今完全活在诗意的境界里。她时常会大声呼唤“诗白”，问“诗白哪儿去了”，并不显得烦躁，而是流露出一种对最亲近、最理解的人的惦念。日前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高秀芹副院长发文说，“郑敏先生百岁，声音还那么好听”，“诗人生命之树长青！”我不由得想起郑老师那首广为流传的诗作——《金黄的稻束》，耳边传来了她仍然年轻却发人深思的声音：“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

想”。愿童先生和郑老师的坚实厚重的金色稻穗也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延续在和他们有过接触以及无数没有接触过的人中间而得以永恒。

最后，我谨用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词句敬献给童先生以作纪念：“云山苍

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想说，童先生的品格和修养像云山一样高耸，令人景仰；童先生的学问和智慧如江水一般涌流，恩泽久长。童先生的英名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心房。

（转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9日）

钱钟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

——以1948年《东南日报》报道为线索

○肖伊绯

难以搜寻的钱钟书“佚文”

因为从事文史研究之必需，笔者经常在距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旧报刊中搜寻第一手史料。虽然现有的各类文集、选集、全集，已然形成了相当量级的文献资源，为文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事实证明，在这些尘封已久、蛀蚀溷漫的旧报刊中，往往有着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史料，常常有着不少至今尚未发现的史事之记载。

众所周知，钱钟书（1910—1998）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钱钟书集》业已出版、再版、重版多年，其著述篇目业已为读者所熟悉。那么，钱氏会不会亦有一些“集外文”与“佚文”之类的稀见史料，散落湮没于旧报刊之中呢？

遗憾的是，笔者经年搜寻，除了发现《清华周刊》上有一些零星的钱氏“少作”，且皆已辑入其文集之外，其余关涉钱氏的“佚文”以及其生平事迹相关报道，都少之又少，几近于无。这样的情形，与钱氏专心学术、倾心治学而少有社会活动，更少有公开发表言论有直接的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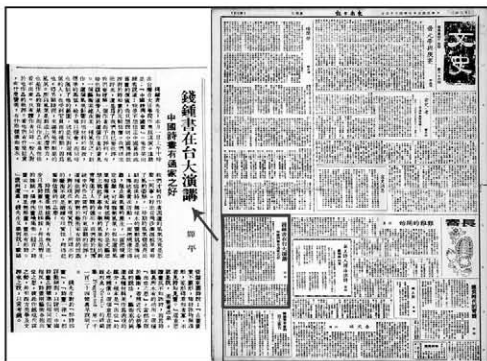


钱钟书一九四八年存照

系。可以说，仅据笔者所见所知，钱氏乃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也是著述极其丰富却又最难于从旧报刊中“辑佚”的著名学者。

偶然寻获钱钟书台湾讲演报道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笔者亦有一次颇感幸运的意外之获——那就是偶然在一份1948年4月14日的《东南日报》之上，寻获了一篇题为《钱钟书在台大演讲》的报道。关于钱钟书先生早年演讲活动的史料，可谓少之又少，更何况这还是其早年远渡台湾的一次演讲，更是少为人知，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钱钟书在台演讲消息刊登于1948年4月14日《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副刊

在此，为披露史料计，亦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鄙陋，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钱钟书在台大演讲

中国诗画有通家之好

○ 媛 平

钱钟书先生，本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台湾台大法学院作专题讲演。讲题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他含笑向听众说道：我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我们要了解一个作者而予以评判，有时也该知道旁人对于这个作者的意见。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一种风气之下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材料的取舍，标准的高低，给予他以机会，而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反对这种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推动，因为他不得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所以风气是创造上的潜势力，也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来。只有读作者同时一般

人对于他作品的批评。看他们有什么贬责，有什么赞美，有什么标准和要求，我们才明白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纹里看时了（解）风的姿态，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出（应为“时”）期而能保持，无根本的变动就是传统；传统常常在活动，一面把规律定得严，限止新风气的产生，一面把规律定得松，可收容新风气。假如这新风气和旧传统太相抵触了，于是文艺思想上就起了革命。新的风气和新的教育增进了人类的健忘，我们对于该传统中的作品当然可作更客观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对于艺术家有新的认识，对于现代更有现实性——所谓不朽的艺术不就是继续有现实性，经得起重新估价的作品么？

诗跟画是姊妹艺术，有些人进一步以为诗画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孪生的姊妹，张浮休《画境集》卷一《跋（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说到这里，钱先生又举例说：欧阳修《盘车图》诗说：“古画画意不尽形，梅诗咏物无遁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这意思就是说，若要看迹象，读画反不如咏诗，因为诗倒具所本有的功用。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艺术，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补偿。这个意思在诺娃利史（Novails）的《碎锦集》*Fragmenet*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里早说明了。

钱先生对于“即诗即画”，“诗画一律”，都详征细剖，以证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以资考镜。

钱钟书台湾讲演的深远影响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严格说来，只是对钱钟书演讲内容的概要性质的简述，并不是完整详尽的记录稿。不过，仅从此报道的基本内容来考察，也至少透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为1948年4月1日上午10时，时年38岁的钱钟书在台湾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这对于研究钱氏生平乃至编订年谱，自有助益。二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是在钱氏撰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宣讲，为此做一番文本与演讲内容上的比较研究，及至将这一比较研究纳入到钱氏学术思想的衍进历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话题。

依据笔者所知，一般读者及研究者接触到《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大多是通过《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初版），此书迭经多次再版重印，流传渐广。《七缀集》乃是钱钟书将其非常重视的七篇旧文结集而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居于书中首位，发表时间也属其中最早者。

事实上，在辑入《七缀集》之前，《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又曾辑入《旧文四篇》（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初版）。据此书钱氏所撰“卷头语”，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最早乃是发表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初版时间为1947年3月。

溯源至此，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至迟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一年之后，1948年4月1日，钱钟书选择以此文内容为基本框架，远赴台湾大学做同主题演

讲，足见其对此文的重视。此次演讲，仿佛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缩写版”，且是由钱氏远赴台湾，现场宣讲出来的“缩写版”，真真是此文诸多版本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讲演报道发表在《东南日报》“长春”副刊。《东南日报》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是民国时期畅销海内外之大报，发行面覆盖东南半壁。

钱钟书台湾讲演的历史细节

另一方面，钱钟书此次赴台演讲，究竟是以什么名义、以何种身份去的，也是需要考索一番的。

最早对这一历史事迹予以考察的，乃是台湾学者林耀椿，其著《钱钟书与书的世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初版）之中，有《钱钟书在台湾》专章考述。大陆学者方面，新近有桑农所撰《钱钟书的台湾之行》（原载于《书屋》杂志2018年第12期），对这一历史事迹钩沉索稽，在史料文献不甚充分的情况之下（当时此《东南日报》演讲报道尚未被发现），仅据台湾林氏著述及《槐聚诗存》所辑的两首钱氏诗作，基本梳理出了钱氏台湾之行的来龙去脉。

原来，钱氏是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文化宣慰团成员赴台的。此行相关活动，当年台湾《自立晚报》上有连续报道，对钱氏演讲亦详实报道。那么，此次团体赴台的缘起，或者说活动目的又是怎样的呢？

查阅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一书，可知抗战胜利后不久，钱氏曾

□ 名师轶事

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因中央图书馆归属教育部，随着抗战胜利之后的台湾光复，教育部方面希望通过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促进台湾当地的文化发展，于是便有了文化宣慰团的台湾之行。

此次文化宣慰团名士云集，阵容可谓强大。其中，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以及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钱钟书。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北京大学教授、敦煌学专家向达，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屈万里以及画家王季迁、俞子才，学者李宗侗等20余人。

据台湾当地报刊报道，宣慰团于1948年3月18日抵达基隆，24日在台北市的省级博物馆和图书馆办展，展出从南京带去的661件图书、瓷器、陶器、铜器、银器、俑及善本古籍等。3月30日至4月2日，分别安排了几场演讲，钱钟书的演讲安排在4月1日上午。

当时，台湾《自立晚报》曾经报道，钱钟书的演讲大受欢迎，是宣慰团赴台三日以来听众最多的一场演讲。因演讲时值4月1日，恰逢西方习俗的“愚人节”，钱氏即以此为由，来了一个十分幽默生动的开场白：

刘院长（指主持演讲的台大法学院院长刘鸿渐）介绍使我心里很惶恐，像开出一张支票，怕不能兑现。好在今天是“愚人节”，我这“愚人”在这里演讲，接受大家的审判。

这样风趣幽默的开场白，即刻引来在场听众会意的笑声，也于无形中拉近了学术演讲与一般听众的距离。这一代学术大家的演讲，也能令普通民众深感兴趣，这

恐怕是主办方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此次演讲33年之后，时至1981年，台湾翻译学会理事长苏正隆曾邀钱钟书访台，以作旧地重游，期以旧事重温。钱氏复函婉谢，信中这样写道：

承邀愚夫妇访台湾，极感厚爱，但弟自年前访日归来，自觉老懒身心，不宜酬应，且无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故前岁远则欧、美、澳，近则新加坡……皆有招邀，一律敬谢。今复多病，更安土重迁。台湾为弟旧游之地，尝寓草山一月……

据考，钱氏信中所言，乃是其本人生前唯一一次谈到1948年的台湾之行。而台湾学者林耀椿也正是循此线索，着手查访相关史料，方才撰成《钱钟书在台湾》一文。

期待两岸相关文献“合璧”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关于钱钟书此次演讲，台湾《自立晚报》的相关报道，笔者至今尚未获见。试想，如果有一天，能将当年台湾方面的报道，与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合璧”，更充分地还原演讲原文原貌，更深入地探研此次演讲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特殊影响，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欣然之事。

无论如何，笔者已然寻获《东南日报》报道，已实属幸运之至了。毕竟，恰逢今年2020年，正值钱钟书先生110周年诞辰——在这样特殊的年份里，这一篇70余年前的钱氏远赴台湾演讲之报道，竟忽尔于故纸堆中悄然浮现，难道真是冥冥中“书缘”使然乎？

对此，笔者自感欣幸无已，自当珍藏永铭。同时，也衷心期待终有一日，能亲睹两岸相关文献“合璧”，完整再现此次重要演讲的历史原貌。



科学攀登 55 年历程回忆

——吕应中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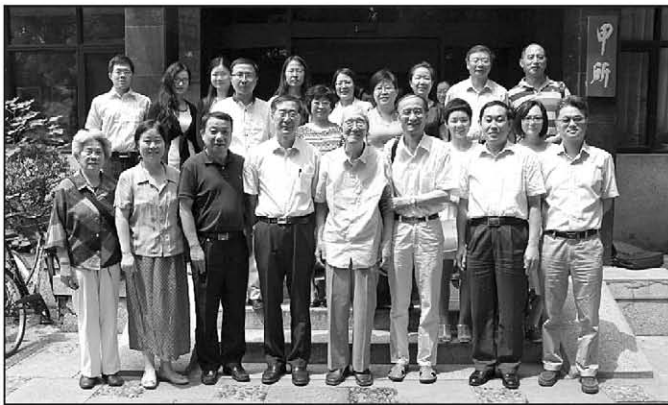
吕应中，1926年出生，江苏丹阳人。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留校任教。曾任工程物理系副主任兼反应堆工程教研组主任、核能技术研究所所长、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8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指导联合培养博士生，后从事能源经济与环境工程及先进核动力堆研究，兼任联合国与世界银行主办的“全球环境基金”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20世纪50年代中，参加我国原子能专业的创建，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核反应堆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1958—1964年主持清华大学屏蔽试

验反应堆和零功率实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并集体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1985年参加并协助主持中国能源研究会期间，作为中国能源研究报告主编之一，集体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航空救国”到“革命救国”

我原籍江苏丹阳，1926年6月24日生于南京。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我亲眼目睹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惨相。后来我随家人从南京迁居重庆附近的江津县，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重庆，造成防空洞窒息大惨案，我们小学生也经常“跑警报”，不能上课。因此我幼小的心灵就立志将来长大后要学习造飞机，现在称为“航空救国”。1946年抗战胜利，我就来考清华航空系，因为清华有庚子赔款，可以公费留美，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理想。

来清华以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沈崇事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以后所有的学生运动我都参加，接受了学生运动锻炼。清华有几个最有名的社团：“大家唱”“民舞社”和“识字班”，还有一个叫“团契”。在过去的音乐室灰楼（现在西北门附近），办了“一二·一”图



2016年6月29日，“陈槐庆-吕应中比较文学研究基金”启动仪式暨二老90寿辰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图为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左5为吕应中学长，左4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

□ 回忆录

书馆，里面放了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籍。我年纪慢慢大了，思索生命的真正意义，想到将来中国的前途，很苦闷。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说还有一本书我可以看看，那本书是红色封面，叫《大江流日夜》，书架上没有放。我说好啊，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叫《新民主主义论》。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不错。因为旧民主主义也不好，我知道八国联军打中国，杀我们中国人，假如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那中国就有救了。这样，我慢慢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也找我聊天，这样我就有了追求新民主主义的思想。

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地下党提出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以班级工作为主。有人开始来找我，说我学习成绩很好，鼓动同学把我选成班上的“学习委员”，让我办壁报，上面把有些难解的课程习题，或者学习上的问题，由我或者其他同学写出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还很多，包括青春期的问题和国家大事。机械系二年级的壁报就这样在机械馆内首先问世，以后又贴到明斋后面原来的大餐厅前面布告栏上，一贴一大片。我们自称“机二突击队”，除了办壁报以外，还有人负责替同学谋福利，比如说谁要买卖自行车等，给登广告，还有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办法。这样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也罗致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八一九大逮捕”后，很多地下党员去了解放区，清华的党组织一下子就减员，需要发展。在这个情况下，我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顺理成章地先被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然后成为地下党的党员。

1948年12月份，东北战役已接近尾声。我们接到上级的任务，第一是劝教授

不跟着梅贻琦走，第二是在解放过程中要保护好学校的财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地下党派学习好的学生党员做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保护学校财产却很费劲，我们赤手空拳，怎么保护财产？但我们也还有优势，因为我们同学平常学习认真，对工人挺好，不管是看门还是扫地的工人，特别是机械系有很多实验工厂的工人，他们当然拥护共产党了。只要有人组织，不用花太多时间，他们就成为保卫系馆和学校的一支队伍。在国民党把石景山发电厂送来的电源切断后，我们和机械系工人开动实验室里从来没有开动过的一台200多千瓦的汽轮发电机，向全校供电，算是对护校有点贡献，对这件事我们还挺骄傲的。

全城解放了，大家选我做学生会主席，因为机械系替全校同学服务是出了名的。当选不是靠耍嘴皮子，全靠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譬如办“面粉银行”，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飞涨，助学金一发下来，同学们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跑到“面粉银行”存钱，负责人立即打电话到城里面粉厂，买几袋面粉，替同学保值。

后来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当时不实行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由于当时还没有党员教授，委派我作为学生代表委员，去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学生会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10月1日，在校行政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共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星夜从清华园车站进城参加开国大典。我以学生会主席身份，荣幸地与代表校委会的钱伟长教授，在清华队伍前列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走到广场中心时，隐约听见扩音器中传来主席台上中央领导同志对话的声音，有领导同志向毛主席指点说：“这

是清华大学的队伍……走在前面旗帜下面的是钱伟长教授……”我们全体欢呼，其热烈情景终生难忘！

1950年大学毕业，我留机械系任“理论力学”课助教。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与教学改革，蒋南翔校长到校。蒋校长指定我担任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协助教务长进行专业设置，编教学计划，组织速成俄文学习，以及苏联教材翻译和教学方法研究等方面的工作。1955年清华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又转任科学处科学研究科长，协助留苏归国的博士处长高景德教授进行科研选题和项目管理。

科学救国：攀登核能科技高峰

为了源源不断地提供我国自己培养的原子能青年干部，中央决定由清华大学带头，在全国几个高校内设置原子能专业，并派蒋校长率领教育代表团赴苏考察原子能专业设置，还聘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在这一背景下，1956年清华大学建立工程物理系，一共设立210~250五个专业编号（其中210之下又细分为五个专业）。我被指定筹建240“原子核反应堆工程”专业。不久，蒋校长又根据他一贯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办学方针，争取到建设“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实验基地的任务，于是又指定我负责筹建该实验反应堆。

没有理论指导的话，原子堆是设计不出来的。当时世界上原子能技术尚处于高度保密时期，公开资料极少。弄到美国的一本教科书，叫《原子反应堆理论概要》，我就首先要读懂这本天书。念完第一遍，根本不懂里面的专业名词和概念，

因为那些英文名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只能猜想。好在我还有点数理基础，只能自己慢慢推导那些公式，懂一点再推导下一个，并自己创造新的技术名词。这样念到第三遍以后，有点儿懂了，然后就动手翻译，一节节翻了又改，改了再翻。翻完以后，出版了第一本原子反应堆理论教科书《原子核反应堆工程原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

1958年开始设计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时，工物系年轻师生平均年龄为23岁半，我当时年龄最大，为32岁，他们都比我小，所以流传“23岁半设计原子反应堆”。实际上参与设计反应堆本体的才是这批年轻人，而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的整个系统，和反应堆本体内的许多具体工程技术设计，我们得到了学校其他几乎所有系各专业教职工的全力支持。只举一例：反应堆内必须用极高纯水作为“慢化”与冷却剂，因此对于大池壳材料的抗腐蚀性要求极高。当时不可能按照苏联图纸要求，从国内取得不锈钢薄板做池壳，我们决定采用高纯铝板“阳极氧化”后代替。但有两个技术难题：一是焊接，焊接教研组主任潘际銮教授立即派了他的“系宝”李庭贵老师傅来工地，用他的绝技“氩弧焊”解决问题。同样，铝池壳“阳极氧化膜”防腐蚀难题，也是在230专业李恒德教授和化学教研组周昕教授的指导下解决的。

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自1958年上马，1960年在昌平县虎峪村破土动工，当时正值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发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1964年国庆节按期

□ 回忆录

建成。1965年8月，我们按照蒋校长的指示，写出了一个总结《六年的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由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工程物理系总支上报，在校内外广为流传。1979年此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5年，在清华“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建成投产后，我们就想“飞跃”一步，攀登两座外国还没有攀上去的高峰。一个就是一体化船用动力堆，也可用于驱动核潜艇；再一个是钷的利用。因为原子能的原料除了铀以外，还有一种叫钷，是稀土元素中含量最多的一种元素，我们国家的稀土元素并不稀少。教育部批准并支持我们提出的建议，拨款开展这两项前瞻性的核能研究。于是200号的同志们用前面建造屏蔽实验反应堆经验总结出来的“尖端分解为一般”办法，一天三班倒，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

1966年5月下旬，我作为中国首次出国参加原子能学术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到英国出席“气冷反应堆”会议，李恒德教授为团长，我为副团长，为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合作探寻道路。6月初开会回来，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迎接我的是给“200号黑帮头子”戴的高帽子，放在我家桌上。造反派闻讯我回国后，就立即前来抄了我的家，拉我去批斗。其中第一条罪状就是说我搞蒋南翔的“黑任务”，跟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唱“对台戏”。因此可以用于核潜艇的动力堆就成了“黑任务”，戴罪下马。我至今心疼不已：世界上一体化核潜艇用动力堆是我们第一个搞起来，凭什么几个“红卫兵”就可以这样轻率地把我国海军技术储备的生命判了死刑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不死心，跟所内一商量，200号

的人齐心协力，实施迂回战术，拿它的基本设计和部分未完工的主体部件，大材小用，1985年以“低温核供热堆”名义，申请国家批准立项。我后来把这个5兆瓦低温供热堆移交后任所长，经他领导和全所的辛勤劳动，于1989年建成运行。

第二个是钷的利用项目，它的命运就更艰难曲折，甚至带有传奇性了。1968年两派武斗迅速升级，造反派把我关在旧水利馆顶层的一间单人囚室里，局势非常险恶，我也没有准备活着出来。但我想既然我活着，就还要做点儿正事，痴心想念着钷的利用没有人研究不行。所以叫我写检讨，给了我纸笔。纸是点数要交的，我就在手纸上用笔计算钷增殖堆方案，算出一点结果就记在心里，将手纸在大便池里冲掉。后来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救出来，随即由卫戍区把我送到一处监狱里“保护起来”。我被告知不许跟家里写信，但可以写个便条索要日常生活用品。我灵机一动，就在生活必需品中间向家里要纸笔和计算尺，等于告诉他们我并不是犯了什么罪，而是在一个秘密地点进行科学研究。我根据记忆的计算结果，在卫戍区做了钷增殖堆的方案计算初稿。1969年春节前，从卫戍区放出来回家后，我就写了一个正式报告，通过军宣队转呈给周总理。总理于10月24日批示国防科委的5位负责同志，请他们多找些人仔细研究后，然后就批准我报告中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大到钷增殖堆所需几十公斤的高浓缩铀，小到为多年两地分居的几十名科学骨干解决家属的北京户口，下达清华核研所，正式上了钷增殖堆的“八二〇”项目。

“八二〇”项目开始不是采用高温气冷堆，因为我1966年从国际会议上知

道高温高压氦气技术有很多难点，估计国内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因此我最先提出采用低压力的高温融盐堆，虽然也是用石墨慢化的反应堆，结构跟现在高温气冷堆差不多，但国内生产设备较易。但不幸后来由于融盐堆所用的特殊高镍合金研制单位（太原钢厂）发生武斗，研制工作停止，材料无法解决，三年后被迫转到用气体冷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解决了西德高温气冷堆预应力混凝土壳的技术，做了实验，成功了，我们才决定搞气冷堆，气冷堆就是这么变化过来的，不过当时没有改革开放政策，还不能与西德合作。

1979年，我被批准参加在西德汉堡举行的美国与欧洲核学会联合大会，成为我国在这种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的人，内容是我在造反派狱中构思的中国发展“钍增殖反应堆理论”，还没有具体设计。但论文立即引起了到会的西德高温气冷堆专家、被世界誉为“球床堆”之父的苏尔登博士的重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会有人做与他们同样的工作。我从此和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次年他应邀来我所向国内各单位的技术专家讲了80小时的课程，受到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的接见，并与我所订立长期全面合作协议。他的鼎力相助，大大加速了中国发展高温气冷堆的进程。

我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任职25年，从1965年开始研制上述两种新型反应堆20年的过程，竟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经历：第一座是完全“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第二座最后走的是“改革开放，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天壤之别，真是难得的奇缘！这段经历使我萌发了进一步走出国门，到世界上探索更多新研究领域的动机。

第二次飞跃：“软科学救国” 解决我国的持续发展问题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能源必须先行，形势空前严峻。

1979年12月某日，我忽然接到科委主任方毅同志紧急通知，当天晚上去科委开“鸣放会”。他约了一批能源老专家，我是最年轻的三个例外之一。方毅说：“国家经济现在处于崩溃边缘。中央提出到2000年国家经济要翻两番，但现在到处是缺能，怎么能够保证翻两番呢？”结果大家七嘴八舌讲了三天。12月底又去杭州，开到第二年的1月。

出席这次杭州会议的有100余人，百家争鸣，终于形成共识，大胆向中央领导提交报告，如实反映当时中国能源的严重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政策失误。我自始至终参与这些材料的整理与起草，深受教育。会议认为：中国已有能源危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过去“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方法，应当改用科学的方法制订中国能源政策与能源规划。

不久，科委通知：已获批准成立能源研究会，并在各地成立分会。可是如何解决能源研究会的经费或人员编制？我灵机一动，就派了所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到科委二局（能源局）为能源研究会办公，自带“粮票”。能源研究会先后向中央呈送了两份综合性能源政策建议报告，1982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民间的国家政策研究成果：《中国能源研究报告》，其中以大量事实与数据阐明中国能源的严峻形势、问题与对策。科学的能源政策实现了它所保证的诺言，到2000年，中国果然提前实现了“能源翻一番，国民经济翻两

□ 回忆录

番”的世界奇迹，最终证明了科学决策的力量。我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期间，我就把这十年参与制定与执行这部能源政策的经验，总结写了一本书，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先进经验”，1993年以英文在美出版，书名《为十亿人民提供能源》。出版后，该书获各国能源专家重视与好评，认为是研究中国能源问题必读物，还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选为研究生教材。

鉴于能源—经济规划在国际上也是一项新学科，需要在我国培养一支专门队伍，所以1980年我又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内，选了一批技术骨干，“转行”学习西方先进的采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模型的规划方法，并在所内成立“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室”。之后，清华大学为了加强软科学研究，在全校建立跨院系的“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由我兼任所长。1985年我主动提前辞去核研所所长，专任该所所长职务。

1980年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也将工作重点转向国际舞台，先后与许多国际机构及外国能源研究所取得联系，开展合作研究。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在1980年后短短的五年内，就冲上国际舞台，参加了联合国开发署及环境署、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共同体等主办的多项世界性、地区性或国家性的能源规划、研究和人员培训及项目，并与五大洲20几个国家的60多个著名研究所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后来欧洲共同体还资助在清华大学内设立“北京能源培训中心”，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培养能源规划与管理人才。在这一时期，我还

在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内建立了多学科的博士点，我也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还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条件，送往国外联合培养或短期进修，他们回国后都能独当一面，有些成为清华大学校方与研究所的主要领导成员。

80年代初引进能源规划学科的同时，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大收获，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超出能源本身。1980年我邀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老主任温伯格博士访华，他介绍了“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即所谓的“温室效应”。由于过去没有听说过“温室效应”，科委决定在校外科学院401所举行，安排更大范围参加。专家们听完报告之后，反应十分强烈。我国是使用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而煤炭燃烧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最多。所以我开始研究“温室效应”问题，并推动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研究。1985年回访温伯格博士主持的美国能源分析研究所时，我提出了一份《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与地区分布》的报告，为他主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填补了一大片空白。此后，联合国为全球环境保护问题，先后举行过几次各国元首会议，并制定了国际公约。中国也积极参加，成为主要一员，核研所也与国外许多单位合作开展了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工作。

1983年，国家计委与科委在制定全国能源规划的基础上，又着手制定中国核能政策，我代表中国能源研究会参加。会议通过热烈讨论，统一了长期在有关部门之间争论不休的发展核电站的堆型、容量、发展路线和研究重点等问题。会议接受我在中国应发展核能供热的建议，从而制定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核能政策。会



2018年校庆日，吕应中与毕业50周年的返校校友在一起

后，清华核能技术研究所制定了一整套发展由低温、中温到高温供热反应堆的研究规划，并立即将已有的实验原子反应堆改装在所内进行低温供热实验，由国家科委主持现场检查鉴定，证明核供热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1985年，核能技术研究所的核能研究获得国家低温供热实验新项目，重新走上轨道，我认为当时已有条件将核能技术研究所所长的的工作移交给副所长，自己可以走出国门，用更多时间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探寻更广大的新研究领域。

第三次飞跃：致力于“技术救世”

记得1946年投考清华，为的是争取庚款公费留美，学先进技术制造飞机“航空救国”；60年后，我果然留美，不过目的变了：想让中国率先发展最先进的原子核反应堆，“技术救世”。这段奇缘起始于1979年与温伯格博士的相遇。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老主任温伯格博士是美国核动力的主要创始人，先后设计研究与领导过包括石墨水冷堆、压水堆、重水慢化堆、水均匀堆、先进高温气冷堆、高温液态金属燃料（飞机）动力

堆，和高温融盐燃料钚增殖堆等多种先进反应堆，成为美国当时重要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第二代主任。后来他担任过美国政府能源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等要职。1980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居然和我一见如故，立即邀请我回访。

1985年回访温伯格主持的美国能源分析研究所后，我更为他的人品与作风高尚所折服。1988年我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担任经济系教授，为该系培养经济理论课程的青年教师。在温伯格博士热情帮助下，由美国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所出资支持了我们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1990年，他邀请我到橡树岭，合作研发他主张的“固有安全动力堆”，并介绍我到他担任顾问的公司，让我分管“小企业科技”项目。我有了这样的学习研究机会，经常回清华向师生介绍研究成果，前后有20年。

在橡树岭的20年中，我除了完成包罗万象的研究项目（如天然气处理）外，还应邀参加美国和国际组织中与发展中国家能源环境有关的顾问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与世行合办的“全球环境基金”第一届科学技术顾问，前后约3年，经手审查许多亚洲地区或国家（含中国）的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扩大了科学眼界。

在2010年，研究工作获得突破，我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名为“在任何功率下长期自动运行生产高温核能的方法”，又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该项目基本达到温伯格所要求的高标准，能够实现他自传中所期望的：采用先进核能，开辟第二核纪元，到21世纪末，世界100亿人口不再

□ 回忆录

担心资源短缺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平地共同享受更高的物质水平。

在50余年科研和创业的漫长岁月里，我有两个座右铭。一个就是马克思讲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另外一个就是苏联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讲的，“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不够的。”我自己是按照这两个座右铭走过60年，愈走体会愈深，终于“合二为一”，原来讲的是同一真理：一山还比一山高，需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切莫过早地自以为到达了光辉的顶点。我们的第二次生命在哪里？就在我们一代一代的新人身上。

（摘编自《清华记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郑小惠、童庆钧、高瑄编著）

过往征程 铭刻于心

○傅 珺（1950届外文）

“十八罗汉”闯关东

1949年初，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东北军工部孔希同志找到潘梁。孔希是潘梁的妹夫，潘梁则是清华地下党原负责人之一，当时已调至北京团市委筹备委员会。孔希说东北急需技术人才，组织上要他找些清华同学去东北。

潘梁找到张炳萱（地下党员）要他去动员，张炳萱串连了18位同学，现在记起来的有：航空系张炳萱、蔡奇图、周钦、

顾胜良；机械系徐应潮、吴佑福、冯登泰、王提涛、朱荣超、苏世范、唐突；电机系顾慧、唐道周；化学系吴庆云；外文系傅珺。

1949年2月28日，我们18人随孔希同志坐火车去了沈阳。后来我们被同学们戏称为“十八罗汉闯关东”，但只有一位“女罗汉”，就是我。

我们到沈阳后，东北军工部何长工部长很爱护清华学生，在培训期间，他腿不好，还拄着拐杖亲自带我们下工厂参

观，到沈阳51厂和52厂。何部长说：“你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有出路，要不就是墙头草，随风倒，扎不下根。”下厂回来，他又请“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吴运铎人很瘦，穿了一身旧军装，戴着墨镜，他给我们讲了自己是怎么在党的培养下奋斗过来的。他说：自己虽然负伤，眼睛看不见了，可是还有双手，还可以为党和人



奔赴东北工作的部分同学参加顾胜良同学婚礼时合影。前排左起：徐应潮、傅珺、顾胜良（左4）夫妇、苏世范（右2）夫妇；后排左起：张炳萱、朱荣超、周钦、顾慧、冯登泰、蔡奇图、□□□、吴庆云、唐道周

民、为解放军做很多工作，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他的报告使我们很受教育，会后讨论时大家纷纷表态，一定要向吴运铎同志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的培训大约两个星期结束，然后就分配工作。

当时，领导让我先到一个技术图书室去工作。其余的机械系的去设计室设计枪炮，化学系的到火药室制造火药，电机系的去了哈尔滨电工系统。

最初，我们所在各单位都属于东北军工部的技术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成立了许多军工研究、生产部门和军工院校，大家都分散调到了各部门：张炳萱去了北京航空学院；顾胜良去了南京航空学院；蔡奇图和苏世范去了船舶工程公司；吴佑福因为会说广东话，很快调他随四野南下解放广东、海南岛，后留在海南铁矿；我和应潮辗转调到航空工业部。

我开始去的东北军工部第三研究所（即火药炸药研究所）在沈阳，我在技术图书室工作。那时的图书室存放着一大堆技术书籍，没有整理，各种书籍中有日文、英文和德文的，其中日文书籍最多，而中文书籍则很少。还有俄文技术书籍，阅读困难时好在有字典可用。

起初，我请领导买了一本图书分类法的书。还在清华大学时，我曾经在图书馆工作过，有些经验。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起把技术图书馆所有书籍整理好，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架上，给每本书都贴上标签。还将编好的书号贴在纸口袋上，把借阅卡片放进去。我们还印了一些借书证，发给研究室的同志，他们就可以借书了。记得1949年的“五一”劳动节，图书室获得集体二等奖，是一面大红锦旗，我们三

位女同志都特别高兴。

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我从技术图书室调出来搞运动，负责整理材料和搞外调。

秘书生涯

1952年底“三反”运动结束后，我被调去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给所长当秘书。此后七年多时间里，我又受到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影响。

我的第一个领导是肖淦。他是“一二·九”时期从上海交大去延安，由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到东北军工部技术处，后来任第三研究所所长。他待人和气，说话声音总是很低，从来没有听他大声喊过。他注重职工队伍建设，每个月都要给党员上课，给团员上团课，给工会会员讲课。

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业余学习，晚饭后上课。我还给不识字的工人师傅们扫盲，有时自己也去上课，学习有机化学，由所里的工程师、技术员讲课。徐应潮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学习。那时肖所长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主要学习专家的技术经验，不要学他们的生活作风。

我觉得肖所长不光是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也很严格，以身作则。他虽然严格，但批评人时是以理服人，耐心说服。

记得有一次肖所长带我出差，从沈阳去西安要经过北京，那时我爱人徐应潮已调到北京第四研究所工作。我们到北京后当天晚上，肖所长让我去四所看望徐应潮。我自己一个人去四所，从颐和园乘坐46路公交车到红山口下车，在解放军医院门口给四所打电话找应潮。那时他正在灯

□ 回忆录

光球场打球，听到广播接了电话，找了个车接到我。那天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返回城里，跟肖所长一起去西安。

从西安出差回来不久，第四研究所来了调令，我就离开三所，到北京第四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给高所长和陈克书记当秘书。

第四研究所是搞火炮、弹药研究的，也是保密单位，所的规模要比三所大多了。每天早晨上班时，所长、副所长和各研究室、车间、科室领导干部开会，布置一天工作。开会时领导讲话，大家都在保密本上记笔记。每天下午下班时间，都把保密本统一收上来，交到保密室锁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再去保密室拿出来分还给各位中层领导。那时所长是高霁亭，副所长有洪明光、蔡克非、余琢之、陈根丰，党委书记是陈克。“运动”来了，先是“插红旗、拔白旗”，后来是“梳辫子”。“拔白旗”时是应潮挨批，说他是“青年中的一杆大白旗，要坚决拔掉”。

记得在应潮挨批前一两天，所里中层干部去部里开会时，他还受到部里的表扬。当时教育科丁克中从部里开会回来，对我笑笑，说了应潮受表扬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应潮在“大跃进”时期，曾设计了一台小型精密磨床，为此获得了国家计委发明创造乙等奖。他设计的磨床由天津磨床厂生产，还销往海外。几年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他们研究室集体搞的一项科研成果也得过奖。

运动中，我们搞不清楚，也不知道问谁，每天就是看看大字报。后来，我不在办公室工作了，要整改，把我和蔡克非的爱人调到幼儿园去搞整改。去的时间不长，好像运动也结束了。随后第四研究所

就分所了，四所一室搬到车道沟，归属第五机械工业部。我被分在新成立的第六研究所办公室继续做所长秘书。六所是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是航空材料研究所，对应苏联的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当时来了很多苏联专家，所里有27个研究室，基本上每个研究室都有苏联专家。所里成立了专家工作组，我就转去做专家工作了。那时专家办公室有两个同志，一个是俄文翻译郭泽佩同志，再一个就是我。老郭是苏联专家组长格吉兹杨的翻译，这位专家是耐热合金专家，六所1室负责研究耐热合金。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贯彻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然后每星期到部里的专家工作办公室栗阳同志那里汇报。记得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北京开了一个专家招待会，所里的专家全都出席了，翻译同志们也去了。我没有去，把票给了另一位翻译同事。她们回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周总理出席了，她们都见到总理了。

不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们就撤走了，连资料、样品都带走了。

向技术翻译转型

1966年邢台大地震，震区好多人都失去了手和脚，需要人工关节，六所18室是研究钛合金的，他们就做了一些人工关节，给地震受伤的人试用，效果不错。于是六所18室就做钛合金的人工关节，还推广到全国。

这段时间，没有了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六所的科研继续，我们开始从英、美的技术资料中找参考。那时所里的科研技术人员大多不会英文，六所是苏联援助

建设的，好多技术骨干都是留苏学生，他们懂俄文，但是不懂英文，所里就让我来教英文。每天早上7点上班，我先给研究室的主任们上课，主要教语法。晚上再给科研课题负责人上课，也是教语法。我还用“灵格风”的一套英文教学唱片来做教学资料，这样边教边学我自己的英文水平也有了提高，就是有点太忙太累。

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展技术座谈，与英、美、德、法等国家的有关专业专家们举行技术座谈，还是我去做翻译。当时我在22研究室负责科技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被领导分在金属专业组，负责耐热合金专业。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有时就去1室，看他们做实验，有时就跟他们一起炼钢，确实挺有意思。我参加过25室的高低温疲劳试验技术座谈，但有一次参与同美国的胶接技术座谈，涉及非金属专业，我因为技术外行一点都不懂，只好临阵磨枪，抓紧背相关技术名词。那次我们参谈小组住在城里航空工业部的招待所，每天晚上我们集体讨论白天老外讲的资料，有不懂的地方就提出来，准备会面时再问。一天，和老外座谈并一起吃晚饭，主谈的外宾喜欢喝酒，我担心他喝多了，就提醒他少喝酒。因此，那位外宾就叫我“小妈妈”，我的同事就说，我得了一个“干儿子”。

那段时间，我参与接待了好几个国家的技术专家，主要是金属专业的。后来航空工业部调我去北京航空学院和一位英国专家夫人Mrs. Carrot一起教英文，她是英国Rolls Royce公司派来的代表，我教口语，专家夫人教阅读。每天早上我先去北京饭店等专家夫人，然后一起坐车去北航上课。下课后又一起坐车回北京饭店，我

再坐公交车回住处。

北航教完书后，我就借调到部里进口处做翻译。原来进口处有一个翻译，但是实际上不会英文。我去后就是做英文翻译，处理每天来往的文件、传真等，给不会英文的项目经理们当“拐棍”。那时，应潮已经调到航空工业部外事局（后改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我借调到部里工作了整整10年，因为六所不同意我正式调动，但是实际工作已经与研究所无关了。

1988年春节前，部里让我出差英国，原计划给一个“机载设备局”的索赔小组做翻译。事后我才知道，那次出国是瑞典的Jourgh Quike公司请徐应潮当顾问，应潮帮助瑞典公司把英国发明组合夹具的老牌公司打败了，瑞典产品占领了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瑞典公司还因此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发的“最佳夹具销售商”奖状。瑞典驻英使馆为此召开一个晚宴来庆祝，邀请我们夫妇出席，所以这家公司就发正式请柬并附上往返机票。航空部利用机会，让我做翻译还省了一份往返机票钱。

陪应潮转战欧洲

那次出国，我先给“机载设备局”的小组做翻译，参与索赔谈判。中方认为外方“卢卡斯”公司出口的机载设备有问题，外方却觉得是中方操作不当。为验证问题要各自操作一遍，找出问题，明确责任。索赔谈判的工作还没完，我就被调到另外一个小组去，给“量具修理”小组做翻译。这个小组的翻译工作比较轻松，中午在公司吃午饭，早晚在驻地自己做饭吃。那时我们小组住在英国的一个

□ 回忆录

小城市Eastleigh，房东去非洲后托人出租房子，我们离开旅馆住进那栋房子。那是一幢两层楼房，还有一个阁楼。我们小组3个人，每个人都有两间房。白天我们去Drapper公司工作。每个星期我都去一趟中航技驻英代表处，领取小组3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晚上，下班回来我就听听音乐，小组的江师傅和小陈看电视。

那段时间，应潮仍然在瑞典公司当顾问，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知道这家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要参加一个关于“柔性制造”的国际会议，想介绍中国的组合夹具。应潮觉得中国的组合夹具应该由中国人来介绍，便在国际会议组委会截止收取论文前一天，赶写了两篇相关论文。应潮来到我们驻地，让我帮他打印并对论文文字做些完善。那天我们两人整整忙了一个上午，把他的两篇论文打印出来交到国际会议组委会。后来应潮的两篇论文都被选中，刊登在国际会议特刊上。会后组委会送给应潮两本会议特刊，其中一本是精装版。应潮回国后，把这本精装的特刊送给清华机械系了。

借调航空部工作期间，记得有一年，



1986年5月，徐应潮、傅琨夫妇在英国Eistleigh驻地院内留影

肖所长出差北京。那天我去招待所探望肖所长，并陪他到六所看望从三所调来的老同志们。我们只能坐公交，到了所里后，我想请肖所长去杨大烁家，又把杨学恒找来，接着找魏所长（他和肖所长在延安时就认识）。老同志们在一起，很高兴地聊天。在返回城里的路上，肖所长告诉我，“文革”中他的肋骨被红卫兵打断了7根，还罚跪了很长时间。自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肖所长，若干年后才知道肖所长已经离开人世了。

我离开中航技后，最初和应潮一起去德国汉堡乐嘉文公司（Recherman Ltd.）建立起一个合作经营部，中方提供出口产品组合夹具，外方出办公地点，中方工作人员的工资中方支付，出差费用由德方支付，产品销售后的收入两家平分。这样我们就在德国汉堡住下来了，中方3个人，应潮是负责人，也就是这个部门的经理；我是翻译，542厂的宋师傅负责组装。

刚开始时，组合夹具没有销量，宋师傅无事可做。好在不久应潮把组合夹具推销到了意大利一家公司，宋师傅就和我出差去意大利。宋师傅教外方如何使用组合夹具，我做翻译。那时我不会意大利文，德文也不太会，只能用英文。可是意大利人的英文也不太好，没有办法，我买了一本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小字典来帮忙，好不容易总算完成了任务。我们在意大利一个星期就把工作做完了。回德国后，宋师傅不习惯在国外生活，眼睛又疼，他要回国。于是应潮跟542厂赵厂长联系，把宋师傅调回了国内，换来了黄国桢副总工程师。黄总来后，我们一起出差过瑞士3次、瑞典4次、意大利好几次。最后，应潮和意大利的Mr.Jelardi合作得很

好，除了销售组合夹具，后来还销售组合平口钳。组合平口钳原本是意大利的产品，经过应潮和Jelardi改进后，由542厂生产再外销。由于市场打开，中国产品销售扩大，德国的乐嘉文公司老板和意大利对合作经营都非常满意，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实现了合作共赢。

坎坷但愉悦的晚年

1997年11月29日，应潮上午去医务室量血压，大夫发现他血压太高，建议他赶快回家睡觉。可他睡不着，脑子想工作停不下来。他觉得如果去游泳，活动累了，可能就能睡着了。下午，他去了英东游泳馆游泳，谁知天气太冷，一下水刚游100米就头晕、呕吐，泳池急救员看到后急忙下水把他扶上岸，他说了家里电话号码和去安贞医院，人就陷入了昏迷。

那天下午大约4点多，我接到英东游泳馆电话，得知应潮已在安贞医院抢救。我和儿子傅强赶忙坐公交车赶到安贞医院，那时应潮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我说赶紧给刘力生大夫（应潮南开中学的同学，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血压联盟主席）打电话。费尽周折给刘力生打通电话，他马上又与老友洪昭光大夫通话，商定赶紧给应潮做CT判断病情。但那时安贞医院的CT坏了，洪大夫马上给朝阳医院的两位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用急救车送应潮到了朝阳医院。经CT检查确诊应潮是小脑出血，并因瘀血压迫导致颅压升高昏迷。第二天早上，大夫告诉我：“抢救要在头部钻孔引流，降低颅压，但对大脑的伤害比较小。”我同意后手术顺利进行，随之应潮就转到了新建的ICU病房。



清华老同学聚会。前排左起：吴宏宛、贺文贞、彭珮云、汪家镛、傅珏，后排左起：钮友杰、黄庆华、张其锬、王洪

三个月后，应潮又转到朝阳医院脑外科病房，做高压氧治疗。那时“皮球”（陈莹，原名吴勤娟，清华校友）每天早早就来到病房，帮着我把应潮推到高压氧仓去做治疗，然后再推回病房。那段时间，徐绍仪大夫还每天请北医康复科的一位护士下班后来给应潮按摩。

1998年5月1日，应潮顺利转到中日友好医院，住进了一个单间病房。经过一段治疗后病情稳定，应潮就出院了。

从病倒到去世的17年零4个月中，应潮因病情反复多次住院、出院。我们要感谢清华校友们的无私帮助和关爱。应潮患病后，不能自主行走，说话也有障碍，主要在家里调养。找一位有经验又尽责的护工十分重要，赵葆元和陈伯时真是帮了大忙。赵葆元得知亲戚家有位保姆张小霞，有护理瘫痪老人的经验，就千方百计动员她来我家。对此他亲戚很不满意，骂得赵葆元狗血喷头，他也不在乎。小霞来后细心照料，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后来赵葆元得了胰腺癌，他去世前两天，小霞代表应潮和我去医院看望赵葆元，他说：“有你

□ 回忆录

照顾应潮，我就放心了。”

应潮始终顽强不屈地和病痛作斗争，开始说话不清，他就练习唱歌，努力一字一句地说话，最后终于又可以和校友们交谈了。他还用那个可以活动的手使用电脑，敲键盘写文章。过去他是老同学合唱团的朗诵主力，现在不能上台朗诵了，但逢年过节合唱团有活动时，他用电脑写朗诵诗，请别的校友朗诵，有时还坐着轮椅上台。有一次参加清华研究生毕业大会，请校友朗诵他的诗，他上台陪着，极大地感动和教育了在座的年轻校友。

那段时间，清华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校友常有聚会，应潮总是坐轮椅参加。以“松明团契”为主的老同学们每年至少有一两次在我家聚会，平时也常有校友来家和应潮聊天，大家谈天说地，忆往论今，并在电脑上交换讯息，应潮一点也不寂

寞，也不闭塞。

2015年3月5日，和我相伴60年的应潮安详地走了。老同学们特意在我家开了个追思会。大家深情地回忆和应潮的交往，对他乐观坚强面对困难、深情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母校的精神深为钦佩。我现在还常常聆听追思会的录音，可惜有好几位老同学已去见应潮了。

要感谢的老同学太多了，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他们，一个个不是走了就是病了。趁我的脑子还不糊涂，我想赶快写完，否则就来不及了。最后希望大家多多保重，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清华老同学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庆幸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愿清华永远青春勃发，一代更比一代强，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奋斗终生。

读者·编者

2020年11月7日，本刊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之后陆续收到不少校友、读者的来信，对办刊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和良好祝愿：

张其锬（1950届土木）：《通讯》复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召开的新闻报道写得很精彩，既报道了《通讯》的发展历史，又报道了她的定位、作用和未来。感谢历届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

田芊（1970届精仪）：座谈会开得很好。《通讯》是校史的记录，是传统的载体，是校友的纽带。编辑们很辛苦，是勤勉工作的无名英雄。

吴竹涟（1966届建筑）：作为老校友、校友总会老理事，为《通讯》复刊

40年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每次收到《通讯》都急不可耐地翻阅，她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将我们与母校、校友与校友联系起来，未行万里路，而知天下事。40而不惑，愿她越办越好！

赵国际（1989级研，核研院）：《通讯》办得好，每一期我都留存，有空仔细阅读，给人以鼓舞和激励！

戴美政（联大史研究学者）：83期封面设计新颖、典雅、美观，新鲜气息扑面而来，此创意太好了！

龙美光（联大史研究学者）：《通讯》也是联大历史文化和联大精神的传承阵地，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四家，论校友和校史工作，清华一直是领头雁。



一张被放弃的早期清华入学证

○袁帆（1975级建工）



袁帆学长向清华大学档案馆捐赠珍贵收藏，左起：校史编委会委员白永毅、袁帆、档案馆馆长范宝龙

编者按 2020年11月6日，袁帆学长将收藏的一套上世纪30年代国立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等7份入学资料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为母校迎接110周年校庆献上一份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特殊礼物，也为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证。作为资深文博爱好者，袁帆学长在本文中对这套资料进行了深入解读与考证，使我们能够通过这几片油印资料窥见90年前清华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多个侧面。

随着一年一度的高考落幕，2020年中国高校录取季接踵而来。近日，一份《清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以其精心的设计和丰富的内涵闪亮登场，博得网上一片惊羨之声。

无独有偶，我在这个难忘的庚子年夏天也意外地得到了一张《清华大学入学

证》。不过别误会，这不是让我再一次“上清华”的通知书，而是被我收藏的一套早期清华大学新生录取资料。

一、这是一套怎样的录取资料？

这是一套完整的1931年清华大学录取资料，包括《录取通知书》《入学证》《入学报到程序》《入学志愿书》《入学保证书》和《新生入学须知》等共七件文档。这套资料的稀缺性、完整性、史实性使其成为了解清华史、社会史的重要物证。通过对这套珍贵资料的细细品鉴，我们不仅可以直接了解90年前清华入学的新生录取注册以及学校管理状况，而且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民生等各方面情况有所感知。

对清华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早期的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是从1925年开始，史称“第一级”。至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再到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在清华园共录取了十二级学生，近3000人，平均每年约200余人。如此少的新生录取数量，自然与现在清华每年录取3000多名本科生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但同时也证明了那时上清华的难度，以及早期清华录取资料能够留存至今的珍贵程度。

（一）《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证》

根据史料，清华在1931年共录取184名新生，史称“第七级”。那么，新生录取资料具体有哪些内容呢？首先来看《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证》。这两份文件是

□ 史料一页

加盖了“国立清华大学注册部”公章的正式文书，是新生被录取的主要凭证。《录取通知书》是经过手写刻在钢板上，再油印于注册部的竖式公函信笺上。内容主要是通知“足下已被录取。兹附上入学证、志愿书暨保证书各一份，即希验收，如期来校报到”，以及需要准备的必要学籍证明等。行文呈现出文言文的基本风格，并且没有标点符号，显露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入学证》则要比通知书的内容具体许多，最主要的是注明了被录取新生的姓名。其中第四项是报到时需要缴纳的费用，计有：学费，每学期拾元；预存赔偿费，伍元；体育费，贰元；科学实验费，每学期约伍元；制服费，贰拾元；洗衣费，每学期约叁元；褥单及洗衣袋费，每学期约柒元。

也就是说，不算上伙食费，那时候上清华每年要缴77元学杂费。除此之外，就是告知新生入学报到程序，包括6个步骤：1.到注册部对照片；2.到医院复验体质；3.到体育馆试验体力；4.到会计处缴

纳各项费用；5.到注册部注册；6.到宿舍办公室交志愿书及保证书。其中的“到体育馆试验体力”是清华的特色，也是对清华长期坚持体育传统的生动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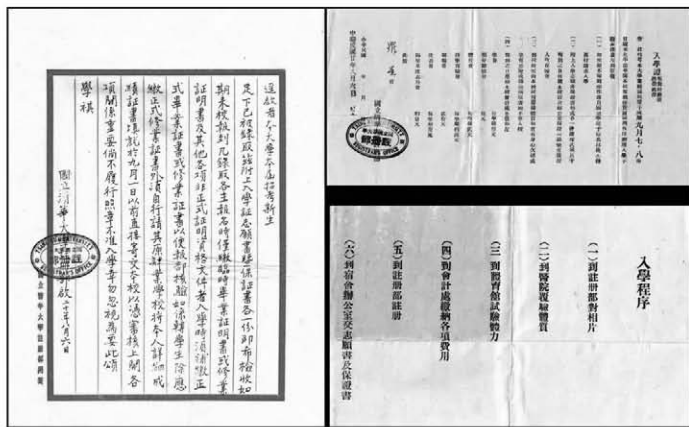
（二）《入学志愿书》和《入学保证书》

如果今天告诉你，上清华要填写志愿书，要找担保人，你一定会很诧异。而这在清华历史上是真实施行过的管理措施。在入学手续中，每名新生必须完成一个程序，就是由本人签署《国立清华大学入学志愿书》，保证“入学后愿遵守学校一切章程及临时校令，专心循序修业；在校外愿束身自爱，誓不玷污校誉。”最后还要家长签名盖章担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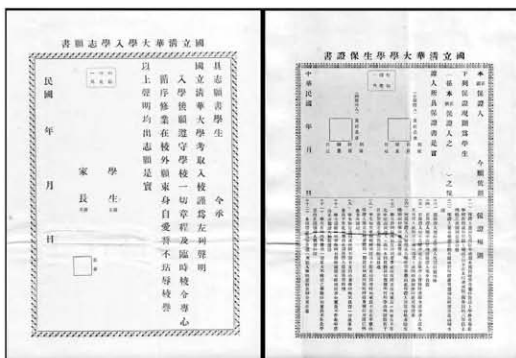
在学生管理方面，早期清华采用了一项现行教育体制下已然不存在的制度，那就是“上学担保”制度。这项制度首先对能够承担责任的担保人设定资格要求，其次对担保事项进行了具体规定。

担保人的资格锁定为三种人：政界官员、教育界人士、商人。官员必须是“委任官以上”，教育界人士必须是“现在学校教员或学监以上职员”，而且不能是清华本校的；商人必须是“纳六等以上铺捐之商铺铺长”。这样的制度颇具时代特色，也算得上是非常严格的。

担保的事项包括：学生非假日以外的请假出校门；学生不能在校医院医治的重病需要外出就医；学生因故身亡的后事料理；学生退学时与学校的财务清理；学生在校内外发生的一切重大不规则举



1931年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入学证》



《入学志愿书》和《入学保证书》

动，等等。总之，在关乎学生行为能力的主要方面都需要担保，可谓“面面俱到，一丝不苟”。

（三）《新同学须知》

《新同学须知》由“来校前应注意之点”“到校后应注意之点”“本会招待职务”三部分组成，是由“国立清华大学学生会新同学招待委员会”发布。这份须知总计2500字，就是一份事无巨细的“入学指南”，告诉新生来清华如何乘车、乘船、乘公交，甚至如何“坐洋车”；告诉新生到清华后该怎么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可谓“洋洋洒洒、细致入微”。让新生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感受清华大家庭的温暖。

尽管如此，你会发现这份《须知》还是将“对新生价值追求的引导”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校后应注意之点”部分，第一条就告知新生：本校校训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从而使学生在入校之初，就能够以言简意赅的形式对他们的价值追求形成正面引导。另外，倡导学生“衣服贵朴素整洁轻便，相处贵诚实而有礼节”“注意

体育及学生精神，在校步行，亦须挺胸正步，勿作萎靡不振之怠惰形态”“本校同学，多不吸纸烟。来校时能戒绝最好”。这些都说明早期清华已将“立德立言”作为对学生价值追求的明确倡导，并施行具体指导。

同时可以发现，这个新生接待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在校的三、四年级同学为主，他们承担了接待新生的具体工作，可以说是清华早期的“志愿者”团队。除了在报到的几天里，学生会组织老同学为新同学提供各种周到服务外，“上课后，新同学对于校内一切疑问，可随时向本会接洽，无不竭诚帮助”。由老带新，尊老爱新，清华的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学生会的作用历久弥新，成绩有口皆碑。

二、这张通知书的主人是谁？

从《入学证》和邮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上，我们可以确认，这位1931年被清华录取的年轻人叫“罗星”。在清华大学当年的录取名单上，可以发现，“罗星”的名字排在184位被录取者的第42位。但在四年后的毕业生名单中，罗星却没有再出现。



《新同学须知》（局部）

□ 史料一页

从我得到的这套新生录取资料的完整性来看，这应该是一份没有经过报到的入学证明，也就是说，罗星当年考上清华后，因故没有报到，放弃了入学资格。

这位“罗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考上了清华却没有报到？好在我还同时获得了罗星本人的一个笔记本，其中竟然包含了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撰写的一篇自传体“自我批判”的文章，记述了他的出身与部分经历，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部分真相。

原来，罗星是福建人，于1911年5月20日出生于一个“茶商兼地主的剥削家庭”。从1919年开始上教会小学，1925年至1930年夏“在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

中学和厦门大学预科读书”。1930年秋他考取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至1934年夏毕业。也就是说，罗星是在南开念一年级时又考取了清华。而在1931年清华的招考资格要求中，是允许大学在读一年级学生报考“转学生”的。这也同时解释了罗星被清华录取的通知书为何是寄到南开大学的。

罗星考上清华没有报到的原因不明，也许是他只想试试自己的实力也未可知。总之，他与清华“擦肩而过”，毕业后去了厦门大学担任助教。两年后又去美国留学。1938年留学归来，先后在“贵阳大夏大学、四川大学、铭贤学院、成华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学院、中央工校西南师范学院、求精商学院和西南贸易专科学校，担任了14年的教授职务”。按他自己述说，“在这漫长的14年教学当中，担任不同门类的功课，不下30种。”

从罗星的笔记中分析，他是一位“统计学”专家，在数理统计学领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教授能力。1952年，他担任西南贸易专科学校统计科主任兼教授。以后，该学校并入四川财经学院，直至成为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至于罗星后来的经历，没有找到更多的详细资料。但“罗星”确有其人，他确实考取过清华大学，则是可以完全确认的历史事实。

罗星的人生脉络基本上可以理出一个头绪，属于一生“读书、留学、教书”的典型知识分子。虽然他与清华失之交臂，但也绝对是“术业有专攻”的统计学专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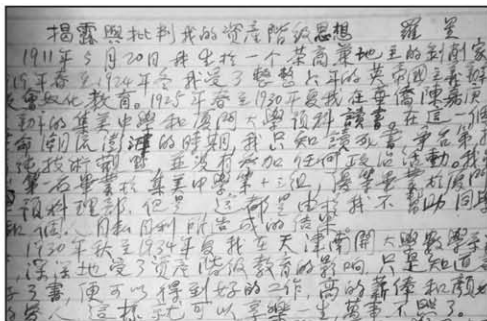
三、罗星的清华录取资料价值几何？

2021年，清华将迎来建校110周年的重要时刻。而与清华同岁的“罗星”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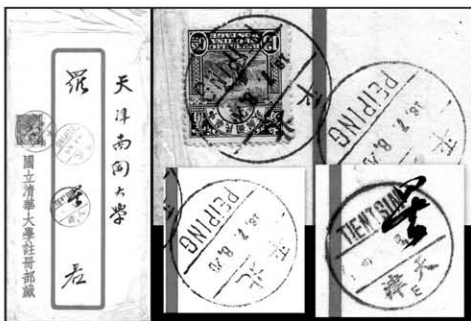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录取新生名单 [*]					
(一)					
一年级新生共一百八十四名					
杨定九	邵毓秀	张明哲	汪德熙	陈新民	冯名世
罗霖霖	周保珍	彭桓武	谢锡爵	费隽法	李长植
杨厚志	张新亚	林士涛	钱伟长	张景桂	王宗淦
卞慧新	韩斌宗	赫贵忱	檀家彪	汪廷葵	夏善昌
高仕吟	司征	顾宪良	罗建本	张光世	郑葆祿
李斯彦	祝新民	王文萃	洪秀华	范新润	魏惟诚
李一鹤	陈振汉	梁树康	郑林宽	李鼎初	罗星

注：有*号为女生

1931年清华录取新生名单（部分）



罗星手迹



邮寄通知书的实寄封

保存的早期清华新生录取资料，90年后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多少带有“戏剧性”的传奇！清华在罗星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不用说这90年间世界经历了多少战乱纷争，中国经历了多少世事更迭，就是任何一个犹豫的念头，任何一个保存的疏忽，都会让这份承载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宝贵文物毁于一旦！

90年前的早期清华入学资料保存至今，可谓“绝无仅有”，它对于完整再现清华演化真相，研究清华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由于它包含了大量的清华历史信息，将它形容为清华历史，甚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化石”都并非夸大其词。

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化石”，它所包含的所有信息都为后人了解其生成时期的社会发展状态提供了鲜活的证据。具体而言，这套完整资料涉及清华史、经济史、社会史、邮政史等多个中国近代史的分支，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状态，在了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

总而言之，这套资料历经近90年的辗转，最终落入一位清华人的手中，我将这看作是历史宿命的“量子纠缠”。带着十分复杂的心绪，我抄录了资料的全部文

字，对每份文件的细节进行了辨析与考证。这个过程令人兴奋，就如身临其境，跟着90年前的清华新生走了一趟报到之路，体会接到录取通知的兴奋；旅途的颠沛不易；初到古城北京的第一印象，乘上校车开进清华园的那种新奇；完成报到流程的懵懂，开始新生活的憧憬……同样，这个过程更令人深思，面对珍贵的历史化石，每一个断面的解剖、每一个细节的探索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我在感叹历史对清华如此眷顾的同时，从内心非常感谢罗星先生。这位“老学长”虽然没有注册成为“清华人”，却用几近一生的执着坚守为我们留下了一块不可多得的珍稀“化石”，为必将成为人类文化瑰宝的清华增添了一份珍贵史料，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启迪。这张入学通知书本应在90年前回到清华园报到，却因为不知道的原因而被搁置。但幸运的是，如今“她”已经踏上回家之路。虽然“迟到”，但终归没有缺席！这正是：

人生贵在有信念，必然存在偶然间；
颠沛游离九十载，归心终落清华园。

2020年7月25日于上海

袁帆，1975年作为海军学员进入建筑工程系学习。1979年毕业时，曾荣获首次恢复颁发的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奖章。袁帆学长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对中国近代海军史、建筑史、教育史的研究情有独钟，颇有心得；对清华大学文化发展极为关注，曾多次向清华大学档案馆、科学博物馆（筹）捐赠珍贵史料和收藏，退休后的心愿是做一名“清华文化遗产宝藏的开拓者”。

故园魂牵 同窗梦绕

——从孙立人参加上海清华同学会活动谈起

○袁 帆（1975级建工）

编者按 2020年11月19日，是清华1923级校友孙立人学长逝世3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孙立人学长诞辰120周年。袁帆校友所撰《故园魂牵 同窗梦绕》一文中，披露了孙立人学长70多年前与上海清华同学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谨以此文纪念孙立人学长，并向所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20年的夏季，我在检索资料时无意中获得了一份《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的电子文档，原始刊物于1947年12月底出版，系当年第7、8期的合刊。这本刊物的发现令我十分意外，不仅因为以往从未听说过有此刊物的存在，而且刊头竟然还是

由梅贻琦校长亲自题写。循着这份会刊的线索一路探寻，上海清华同学会在70多年前的诸多史实透过历史烟云，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则报道引出的清华人抗战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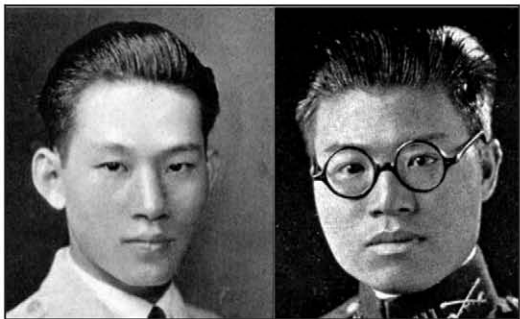
在这一期《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的第一版，一则题为《欢迎孙立人校友 义卖手册五亿元》的报道最为吸引我的眼球。报道全文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半，在本会所举行冬季全体大会，欢迎校友孙立人将军，并为孙校友所办之东北清华中学筹募基金。由会长王祖廉同学担任主席。在风雪载途中，到会者仍有二百余人。孙同学戎装莅会，英姿焕发，和蔼可观。当报告校友齐学启殉国经过及身后安排时，悲壮义烈，听者动容。孙同学将战利品日军宝刀一柄，赠与同学会，由王会长郑重接受。

王会长报告清华手册经一月余之惨淡经营，即将出版，内容精美。为收一举二得之效，拟将此册义卖，得款捐助孙同学所办东北清中。并谓前日已有一部分同学热烈赞助，如唐星海同学以二亿元买二册，其他同学亦至少以百万元购一册云。当场各级热烈响应，最高者出至一千二百万元一册，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均



《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1947年第7、8期合刊



在美学习军事时的孙立人（左）、齐学启（右）

成绩极佳，结果总数逾五亿元。未有音乐茶点助兴，全体均尽兴而散。

这则不长的报道却蕴含了很大的信息量。首先是1923级校友孙立人（1900—1990）到沪参加上海清华同学会活动，前所未闻。孙立人是著名爱国将领，抗战中率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打击日寇，取得“仁安羌大捷”等一系列胜利，彪炳史册。文中提到“校友齐学启殉国”，则涉及抗日战争中清华人的另一重大事迹。

齐学启（1900—1945）也是1923级校友，与孙立人在清华同窗九年，又都在毕业后赴美留学，学习军事，以图报国。在抗战中他担任孙立人将军的副手，一起赴缅甸作战，功勋卓著。1942年在战斗中不幸负重伤后落入敌手，被囚于日军战俘监狱达三年之久，坚贞不屈，最后惨遭变节者刺杀，于1945年3月13日牺牲。1947年秋归葬于长沙岳麓山，孙立人亲撰《祭齐故副师长长文》，文中有“呜呼旧事历历，思之凄梗，山岳可移，沧海可塞，余之哀君者，其无时而已也”之句，足见孙、齐二人同学加战友的生死相交之情义！孙立人在清华上海同学会的这次活动中想必详细讲述了齐学启事迹的“悲壮义烈”，方令“听者动容”。再则是孙立

人还将一柄在抗战中缴获的日本军刀赠与清华上海同学会作为纪念，这也是意义非凡！

至于文中说到的“为孙校友所办之东北清华中学筹募基金”，这又涉及了另外一段史实。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在东北鞍山驻军时，决定利用一所旧校址创办一所“清华中学”，以纪念母校清华。为了筹办这所学校，孙立人迅速联系一些清华校友组成董事会，他自己则亲自担任董事长，并利用各种机会为这所学校募捐。在他与清华校友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声名遐迩，后来演变为“鞍山市第一中学”，至今仍是一所名校。上海清华同学会在这次聚会中，出于对孙立人将军英勇抗战事迹的崇敬，以及对他兴办教育回馈母校的支持，也组织了义卖，所筹款项悉数捐给了“东北清华中学”。

一本《手册》记载清华上海同学会历史

这则报道中说到当天同学会“义卖手册五亿元”，乍一听，这个数字很吓人，但这却是1947年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是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真实记录。根据有关研究文献，以1937年为基准，当时的通胀率高达2.62万倍。照此推算，这5亿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抗战爆发时的1.9万元。即使如此，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仍可证明清华同学对孙立人将军办学义举的大力支持。

那么，这里提到的“手册”又是怎么回事呢？恰在此时，我通过拍卖渠道获得一本上海清华同学会编辑印刷的1948年《清华手册》，仔细一看，竟然就是报道中义卖的那本“手册”。

这本手册64开大小，布面精装，深蓝色封面上烫金印刷有“清华手册”的图案

□ 史料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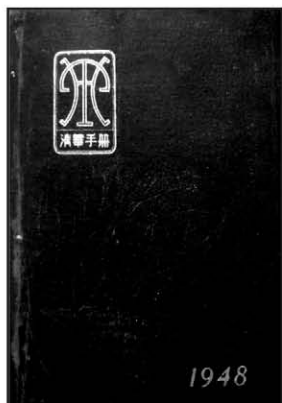
和“1948”字样。内页共200余页，分为“资料、记事、广告”等三个部分。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资料”部分，简直就是抗战复员后的“清华一览”。包括“国立清华大学校史概略”“清华大学规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清华大学历任校长一览”“清华校友创办各地清华中学一览”等内容。在最后一项中，明确记载了“东北清华中学”是由孙立人担任董事长，建立于1946年的有关信息。

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我过去从未见过，也是我特别想了解的上海清华同学会的专门资料。包括“上海清华同学会沿革”“清华大学上海同学会章程”“上海清华同学会大事记”等基本情况。更为珍贵的还有“上海清华同学录”，记录了从1909年至1947年共39届当时在上海的毕业生，以及“庚款”津贴生总计886人的名字、服务场所、住址等信息。在一届届清华校友中，我看到了蒋廷黻、黎照寰、茅以升、关颂声、钱端升、吴国桢、董大酉、罗隆基、顾毓琇、冀朝鼎、王造时、王炳南、李健吾、徐铸成、钱钟书、乔冠华、吴宗济、季羨林、陈省身、许国璋等

众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在1947年前后都曾在上海清华同学会注册为会员。

清华同学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13年6月29日，是由1912级和1913级在清华园组织发起的。1914年后，在美国逐步演变为“清华留美同学总会”。1920年后由于归国毕业生逐年增多，始在国内设立分支组织，称为“支会”或“支部”。而国内各地支会的建立有先后之分，最早设立的当属华北支会和上海支会。校史资料上最早明确记载的上海支会活动日期是1924年9月19日，而成立日期应该不会晚于1921年（确切日期待考）。直至1933年10月29日，“清华同学会总会”在北平（北京）恢复，并成立董事会（梅贻琦任会长），各地分设组织根据规模称“分会”或“支部”，也有以地名加“清华同学会”的，如“上海清华同学会”。

通过“上海清华同学会沿革”，可以了解到上海同学会的组织，盖因“历届毕业同学散布全国，上海一地，人数尤多”，于是大约在1930年左右在“北四川路北京路转角中国信托公司四楼”觅得部分房间作为会所和招待所，这就是上海同学会有固定活动场所之肇始。之后到1933年迁入大陆商场新厦三楼，重新设计装潢，成为“当时最理想之会所”。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同学会再次转移至法租界内“静安寺路金城别墅沿马路的二楼”。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占领全上海，同学聚



上海清华同学会编印的《清华手册》（1948）封面、扉页

会已无可能，清华上海同学会遂决定“将房屋出租，会所取消，会务暂时停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来上海的清华同学日益增多，于是同学会恢复活动，急需一处会所作为平台。在“中区房屋租价奇昂，且不易获得”的情况下，幸得1915级钟可成同学的协助，才租得九江路花旗银行大厦二楼，作为新会址。同时得到“唐星海、钟可成二同学及其他同学之经济上协助，会所以蒸蒸日上”。同学会组织也日趋健全，会务由理事会、监事会负责，每年改选一次。这也说明在七十多年前，上海的清华同学就已经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管理同学事务。最难能可贵的是，“每届改选之时，同学莫不互相谦让。但遇有推进会务事宜，则又莫不争先以赴”。清华同学“不慕虚名，行胜于言”的优良作风尽显，围绕这本《清华手册》的问世，以及“义卖”就是一次典型例证。

上海清华同学会在1947年底编辑印刷“清华手册”，主编是中国语言学家、1934年毕业的吴宗济（1909—2010）。这一举动不仅在上海同学会历史上是第一次，就是在全国各地的清华同学会历史上也是首开先例。然而由于当时政治局势激变，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迅速，“纸价狂涨，生活指数激增”，任何一项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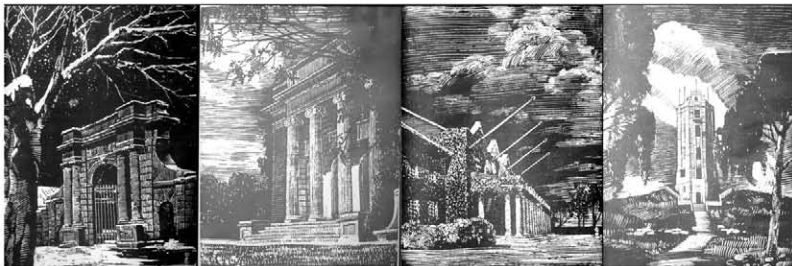
策划无不因为经费无法控制而头疼不已，举步维艰。按照当时预算，手册制作所需费用最少也要超过“一个亿”（折合1937年的4000余元），而同学会并无此积蓄。于是向在沪同学公布制作“手册”的募捐意向，得到大家积极支持，“数日之内巨款立集，精美之册遂得出版”。

不仅如此，在1947年12月15日的聚会上，全体与会同学还踊跃参与义卖，筹得“五亿元”支援孙立人将军的“东北清华中学”，充分体现了清华同学“急公好义，相习成风”的优良传统。

一位建筑大师曾为《手册》绘画装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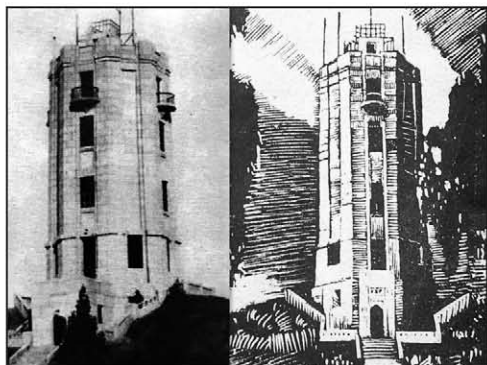
浏览这本《手册》后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内容详实，图文并茂”，73年前的策划、设计与装帧水平一点儿不输当下。尤其是穿插在其中的四幅版画插页，因为描绘的是当年清华园内的著名建筑，尤令清华人备感亲切。

这四幅版画分别是清华的“二校门”“大礼堂”“体育馆”和“气象台”，画家的视角独特，透视准确，描绘细致，效果极佳，绝对是表现早期清华园景色的美术佳作。第一幅画面上的“二校门”没有采用正面视图，而是将一棵严冬中覆盖白雪的枯树置于显要位置，使人不禁联想到抗战八年清华园惨遭日寇肆意涂炭，百废待兴；



戴念慈创作的清华版画

而标有“清华园”的二校门依然巍然矗立，更象征着清华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第二幅“大礼堂



清华气象台（左：照片，右：版画）

堂”则显得静谧恬适，在树影婆娑中，大门前四根挺拔的“爱奥尼”立柱在夏日余晖中散发着独特的人文气息，令每一个清华人流连忘返，心驰神往。还有象征清华人体育传统的“体育馆”，既表现了“爬山虎”覆盖外墙的经典画面，又采用一个由南向北的“非常规”视角，将体育馆前的检阅台摆放在画面中央，使人对十八根罗马“塔斯干柱”形成的柱廊建筑之美叹为观止，加上四根旗杆斜指蓝天，让体育馆在晴空之下散发出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魅力。

如果说“大礼堂”“体育馆”作为清华早期“四大建筑”已为人熟知，那么不在此列的“气象台”出现在美术作品上则十分罕见。清华气象台建成于1931年，1932年正式发布天气预报，为当时中国大学中唯一符合国际标准的气象台，在清华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气象台建筑设计由1921级清华校友、著名建筑师杨廷宝担纲，在他众多经典作品中属于一个特殊的“建筑小品”。画面上的气象台五层塔楼耸立在一个小山坡上，八角形的外观，垂直的线条，错落的窗户，别致的小阳台，楼顶的测风仪器，完美地统一在十

分别致的建筑中，极好地诠释出气象台的科学属性，令人过目不忘。

那么，是谁能够创作出这样既有绘画艺术，又有建筑特色的版画作品呢？一般的画家肯定不行，单纯的建筑师也做不到，一定是具有很高绘画造诣，精通建筑艺术的建筑师才能胜任。在这些画作的角落里，都留有“念慈”两个字，按照常规，我猜想这应该就是画者的名字。果然，在《清华手册》最后一页“编后赘言”的鸣谢内容中，出现了一句“戴念慈君代为绘图装帧”，这就明确了四幅版画作品的创作者是“戴念慈”。

说到戴念慈（1920—1991），熟悉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他是继梁思成（1901—1972）、杨廷宝（1901—1982）等建筑设计元老之后我国第二代建筑师中的杰出代表。在他近50年的建筑设计创作生涯中，由他主持设计的重大建筑有100多项，其中著名重点工程有北京饭店新楼、北京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杭州西湖国宾馆、曲阜孔子阙里宾舍、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及纪念碑、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等，都达到了当时国内建筑的最高水平。他也是1990年第一批被授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称号的20人之一。

戴念慈并不是清华培养的建筑师，那他为什么对清华情有独钟呢？这里面肯定与清华有着某种特殊关联。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求学的四年中，清华出身的杨廷宝曾是他的恩师，他也是杨廷宝的“得意门生”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杨廷宝是如何向学生们详细介绍自己的母校，但他对清华的感情，以及1930年重新为清华进行校园规划，亲自设计图书馆新楼、生物馆、学生宿舍

（明斋）、气象台等大小项目的事迹却一定为学生们所熟知。也许正是因为老师的清华情结深深影响了学生，所以当戴念慈1947年在上海兴业建筑事务所服务时，会与在上海的清华同学互为相知，并欣然为《清华手册》绘图装帧。而他选择的绘图内容，就是清华的四座经典建筑。其中的“气象台”，虽然没有大礼堂、体育馆的名气大，但因为它是杨廷宝设计，戴念慈仍选择将其精心绘出。我相信，这绝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巧合，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行为，蕴含着他向恩师致以的敬意。只要你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知恩图报”的秉性，就会认同对戴念慈的这种推测，并且不会感到牵强。

在明白戴念慈创作清华建筑版画的背景和善意之后，你一定会为他73年前的这几幅佳作所折服。这些作品显然不是对着照片的临摹，只有亲临现场细致观察，现场写生后，再进行版画创作后才可能完成。这些作品出现在清华抗战复员后的特殊时期，既是以艺术形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毁灭中华文化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声讨，也是对清华园人文魅力的尽情讴歌，反映出戴念慈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博爱情怀。这些在《清华手册》中出现的



杨廷宝（左）和戴念慈（右）

珍贵画作是留给清华文化史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同时也为“戴念慈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结 语

从73年前的《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和《清华手册》中，我深深感受到清华同学会“联系校友，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了解到上海清华同学会的历史沿革，重温了一段清华校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认识了一位以画“致敬清华”的建筑大师。这在极为不平凡的2020年中，又是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

清华校友资源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人文宝藏，在这座“金矿”中，无穷无尽“感人的事迹、独特的传奇、深邃的思想”可能在不起眼的地方被神秘隐藏，但在岁月的长河中总会发出熠熠之光。只要心存对百年清华的感恩，满怀对全球校友的尊敬，你一定能随时从清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受益，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我手中这本《清华手册》最初的主人必定是一位清华老学长，他当年肯定也参加了为“东北清华中学”举办的义卖，并将这本手册长期珍藏，伴随他走过几十年不平静的岁月。今天虽然已经无法得知他的姓名，但我能通过这本《清华手册》与他“握手”，并能让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上海清华同学会历史重见天日，这是我的莫大荣幸。就让我以此文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学长，以及老一辈清华人表达深深的敬意吧！这正是：

故园魂牵游子心，同窗梦绕手足情；
申城从来多义举，轶事钩沉赞精英！

2020年8月28日初撰

2020年11月13日修改于上海

为人 为学 爱国 奉献

——在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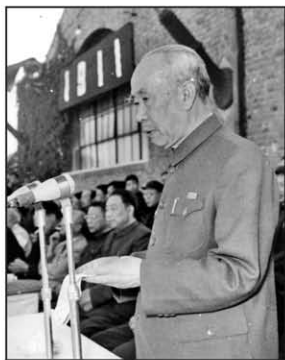
○贺美英（1961届电机）

编者按 2020年10月17日，我校举行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和史料图片展。刘仙洲，我国著名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从1932年起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刊特刊发清华大学党委原书记贺美英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以致怀念。

我是1956年入学的，当时刘仙洲先生是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很遗憾我没有上过刘先生的课，因为我是电机系的，他是机械系教授。但是他的教学严格、为人正派在同学中流传很多，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清华的学风非常好。我们那时候上课，从化学馆到西主楼，没有自行车，就是走路。当时南北主干道不是马路，是土坡高起的铁路。大家急匆匆穿过铁路，赶到下一个教室，一点儿不敢迟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刘仙洲要求严格，其他老师也很严格。学校这种严谨的风气，对“文革”前毕业的我们这代学生都有着深刻影响。大家都知道刘仙洲先生上课到点关门、学生不敢迟到的故事。他和他们那一代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后代清华师生，使这种严谨的学风传承下来。清华的风气不是讲出来的，是在这种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是刘仙洲他们老一辈的教师传下来的。

我们系的一些老教师给我们上课，也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刘仙洲在清华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上讲话

受到刘仙洲的影响。我们是后辈受益的学生。传统是靠一代代人传承下去的，不是抽象的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会议开始前我们观看了会场外举行的“纪念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史料图片展”，其中有今年99岁高龄的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院士的回忆文章，回忆他被刘仙洲先生打零分的经历。王希季在西南联大上刘仙洲先生的“机械学原理”课，有一次，刘仙洲命题考试，要求学生做题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由于当时验算主要靠计算尺，而计算尺的准确度又有限，若想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得借助笔算。王希季很快用计算尺把题做完，却忽略了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要求。刘仙洲没有宽恕他对小数点位数的忽略，判卷时毫不留情地打了“零分”。这个零分犹如一剂清醒剂，使得王希季认识到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这也督

促他日后时时刻刻注意在工程上严谨认真，保证做到“零缺陷”。

刘仙洲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源于他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理念，他一向认为：严谨正规是培养工程师基本素质的重要步骤。他对学生说：“将来你当了工程师，在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如果小数点错了一位，那将会造成什么结果！所以一定要加以严格的训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刘仙洲先生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从他那里，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学会了治学方法，还懂得了如何做人。我们纪念刘仙洲先生，就是要认真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传承他的严谨学风，并使之发扬光大。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刘仙洲先生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是一位少年革命者。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的不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思索，反复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55年11月7日，65岁高龄的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最早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刘仙洲在教育界资格老、威望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引起了清华校内师生的关注，在全国，在教育界、知识界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在他之后，张子高、张维、梁思成等30多位教授、副教授相继入党。蒋南翔校长曾经说：“一百单八将（指当时在学校的100多位教授、副教

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刘仙洲的入党，给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政治上的努力方向。在刘仙洲入党的支部大会上，蒋南翔作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成为清华师资队伍建设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一名同盟会会员到共产党员，我想，贯穿刘仙洲一生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升华。如果说，早年刘仙洲的爱国思想是朴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境界发生了较大变化，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的爱国精神集中表现为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诚；自觉地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懈努力。刘仙洲入党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地位，而是源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其看做自己人生归宿。这才是他入党的“初心”。面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他不停地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主动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正像何东昌同志说的那样：“他的一生，是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清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努力奋斗，奉献终生，是清华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纪念刘仙洲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老一代清华人的光荣传统，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勇攀高峰，把对祖国的爱倾注于学习中，倾注于生活中，倾注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中，倾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我想，这将是我们对刘仙洲先生诞辰130周年最好的纪念。

陈定昌院士：毕生追梦的战略科学家

○ 苗珊珊 张铁柱 付毅飞



年轻时的陈定昌

2020年9月7日，曾研制了中国首部激光雷达的导弹专家陈定昌院士走了。

陈定昌是我国武器系统总体、防空反导及制导雷达技术专家，我国精确制导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防空体系研究和三代防空装备的实践者、拓新者和谋划者，取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是站在时代前沿具有超前思维的陈定昌，用一生推动着我国空天防御体系能力建设，为信息化条件下新质杀手锏装备研制，形成制衡强敌的战略威慑能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掀开了我国空天防御力量建设的新篇章。

回顾几十年的航天生涯，他说自己并不是思维超前，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喜欢从全局出发，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我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在实现中国梦上多做一些工作。”

“让国人不再受欺负”

从少年时代起，遭受国破家亡之痛的陈定昌就立志报国，下定决心“长大了一

定要投身国防，为国家研制精良武器，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负”。

1955年夏季，陈定昌即将完成高中学业。同学都在热烈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谈论该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在选择专业这件事上，陈定昌的内心曾有过斗争。老师看到他的写作之长，建议他报考中文专业，将来可以从事写作，当作家、当记者……

可真到了眼前，他犹豫了。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科技生产力低下。他深爱的这片土地，曾经被外夷欺辱、掠夺。寒窗数年知回报，此刻，“科技强国”成为陈定昌的心愿和夙求，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想，毅然选择了理科。

1957年，陈定昌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北京留苏预备部，随后，因苏联单方面取消了留苏名额，500余名学员直接进入国内大学，其中300余人进入清华大学，200余人进入北京大学。按照报考志愿，陈定昌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陈定昌被分配至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从此陈定昌与航天结缘，开始了逐梦航天的传奇人生。

以创新为利刃披荆斩棘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技术开始出现。钱学森提出：激光能不能做一个信号源，像无线电一样，也能做各种各样的探测和制导应用？这个“激光之问”最终交到了陈定昌手上。

经过数月资料调研与分析，陈定昌拿出两份报告，肯定了激光确实是一个发展方向。钱学森听完报告后当场决定，“在航天里面，要把激光与无线电放在同等位置来发展。”于是，先期调研任务变成了预研项目。

因为激光雷达在国际上刚刚起步，事关重大，钱学森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3家单位联合攻关，20多岁的陈定昌被任命为项目组长。为了项目早日能够实验，陈定昌一天跑五六家单位，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这项工作使陈定昌深深感到：科学就是要创新，要不畏艰难，才能有所作为。

“创新”对于陈定昌，如同手中的一把利刃，他用它披荆斩棘、点石成金，剑锋所指，形成的是战斗力和生产力。其间，他收获了无数的喜悦，也吞咽了无尽的孤独与寂寞。

在当时条件下，尽管研制工作困难重重，“激光雷达项目”仍然取得了可喜成绩。该项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激光雷达样机，用详实准确的实验数据，突破了“四个科学原理”的限制，发展了中国第一部全反射式激光雷达，比美国林肯实验室领先多年。

激光雷达项目，只是陈定昌前瞻性眼光和创新胆识的初步显露。1996年他担任首席科学家后，牵头深化了领域发展战略研究，提出新的目标。他一方面深入一线，带领团队运用航天系统工程的办法，理出目标，梳理关键技术，通过试验不断缩短与目标的差距；一方面竭力争取各方的支持，甚至签下“军令状”。有关领导对于他科学的设想，以及他和团队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攻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技术上是可行的，很重要”。

陈定昌认为，创新集中在关键技术、途径、方法的创新上，要瞄准十年二十年，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要有前瞻性，紧抓关键技术的攻关、集成，才会形成更加精良的设备。这种指导思想直接维持了技术优势，推动了专业的发展，让他所从事的空天防御事业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无私无我的战略科学家

所谓战略，是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陈定昌就是一位致力于前瞻性地策划、布局、引领方向的战略科学家。

“20年前走得不对，20年后就没有结果。”他曾说。

他有几大特长，在工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紧密跟踪国内外新知识、新技术发展，捕捉新信息速度之快，对趋势之敏感，令人敬服。其二是擅长对信息进行真伪和优劣的鉴别，对事物判断准确，善于抓住重点。其三是擅长超前思维，物理概念强，善于做顶层策划。

陈定昌的前瞻性思想是出了名的。



1992年陈定昌院士（左1）在试验基地与黄纬禄院士（左3）、型号总指挥徐乃明（左2）、王尚虎（右1）讨论问题

□ 怀念师友

1984年，他出任二院二部主任，全面规划和未雨绸缪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在二院研制第二代防空导弹的同时，以陈定昌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开始前瞻性地提出第三代防空导弹的设想。该设想得到了包括任新民、梁思礼、陈怀瑾等航天系统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三代防空导弹系统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俄罗斯后第三个具有自主研制同一水平装备能力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导弹研制、试验能力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但是陈定昌并不满足于此。在第三代研制的同时，他又将眼光瞄向了第四代。当年他提出的发展规划设想，已被事实证明富有先见之明，他提出的空域和体系思想一直沿用至今。

进入新世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成立。担任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的陈定昌和科技委专家们，带领相关人员

完成了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等多项重大任务，为我国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出谋献策，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精确制导技术的大跨度发展。

近年来，从陈定昌任组长的第一届原总装备部精确制导专业组，一共走出6名院士。陈定昌与该组其他专家，成为我国精确制导技术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步入晚年的他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一线，他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航天科技集团有关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有人不解：陈定昌为什么能做到眼光超前，思维超前？答案是，这些都源于他站在更高层次，置个人荣辱于度外。陈定昌总能站在国家层面、战略的角度，保持着一种大视角，在为国家的安全谋划。

陈定昌是国防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也是中国科技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转自《科技日报》，2020年9月10日）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逝世 享年 100 岁

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南联大哲学系校友张世英，于2020年9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张世英，1921年5月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经济系、社会学系、哲学系学习。1946—1952年先后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助教、教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59—1966年负责《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张世英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重点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德国哲学丛刊》主编，南京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论黑格尔的哲学》《欧洲哲学史稿》（合编）、《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等。

追忆核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



李冠兴
院士

2020年12月1日，我国核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1岁。

李冠兴是我国著名的核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新型特种材料研发及应用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核材料与工艺技术、粉末冶金、金属材料、高级陶瓷与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在生产堆、研究堆和核电站燃料元件与相关组件及铀材料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清华大学工物系核材料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他选择扎根一线，在原二机部二〇二厂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勤恳耕耘。他推翻了苏联专家的结论，为军用生产堆元件成品率的大幅提高和降低堆内事故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二〇二厂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四处奔走，争取支持，筹建了核工业唯一建在工厂里的重点实验室，建设了研发基地，争取到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被任命为二〇二厂厂长后，他领导组织建成了我国第一条重水堆核电燃料元件生产线，为秦山三期核电燃料元件国产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以学者治厂为理念，力求为每一位员工提供施展

自己能力的舞台，受到了全体员工的敬佩和爱戴。2004年10月，李冠兴从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委托，参加第三代核电站的国际招标，任燃料组组长，前后历时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008年至2018年，李冠兴担任中国核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2018年至今任中国核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监事会监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核学会在学术引领、产业发展、国际交流、科普宣传、人才成长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书香门第 外柔内刚

1940年1月14日，李冠兴出生于上海。李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父亲李守仁在大厦大学念商科，没有毕业就开始接替祖父做生意。母亲王妙贞是茧厂老板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李守仁利用李家的大宅办了一个小学，名为道达小学。父亲自任校长，母亲任语文老师。李冠兴就是从道达小学毕业的。1956年李冠兴从上海卢湾中学高中毕业。高水平的老师和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令他难以忘怀。

清华苦读 受用终生

李冠兴于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他仅16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却是班上的尖子学生之一，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后来又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并在毕业时获评优秀毕业生。1962年大学毕业，李冠兴留校攻读核材料专业研究生，师从李恒德先生。1966年，李冠兴研究生毕业，虽然当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 怀念师友

远不如现在的规范，但是那时候大家不惧怕困难，完全开放式地思考问题，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锻炼，这一点让李冠兴终生受益。

扎根一线 患难夫妻

研究生毕业后，1967年，李冠兴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核工业部二〇二厂第二研究室工作。1968年与张珊珠女士结婚。同年李冠兴受父母牵连被隔离审查，被分配到工厂施工连劳动改造，那是一段饱经艰难、困厄坎坷的岁月。难得夫人张珊珠一直不离不弃，李冠兴才可以在12平方米的斗室里静下心来潜心学习，熬过这场劫难。1970年后，李冠兴被调回二〇二厂第二研究室做科研工作，内部控制使用。他开动脑筋，抓住主要矛盾，打破了苏联专家的权威结论，为军用生产堆元件成品率的大幅提高和降低堆内事故概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项工作得到了当时的核工业部核燃料局总工程师张沛霖先生的高度赞赏。

出国访学 成就斐然

1980年，李冠兴母亲的冤案得以昭雪，李冠兴也得到彻底的解放。1982年经导师李恒德先生推荐，李冠兴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冶金工程系访学（教育部公派）。李冠兴在两年的时间里听了六门研究生课程，完成了两项研究课题：一是完成了“二元系统中的反应扩散理论”的研究，1984年2月在加州洛杉矶召开的第113次冶金学年会上做了报告。文章发表于1985年的冶金杂志*Acta Metal*。二是于1984年4月，完成了“快速凝固三元铁-铝-硅粉末混合压实体的扩散均匀化”的研究工作。李冠兴的才干和勤奋受到了导师

Powell的高度评价。

勤奋耕耘 学者治厂

1984年李冠兴回国后，于当年12月被任命为二〇二厂第二研究室副主任，主管科研工作。1990年12月李冠兴被任命为二〇二厂总工程师兼生产副厂长。当时正值核工业转型期，非常困难，李冠兴经过两年的努力，扭转了被动的态势，开创了军品科研和生产的新局面。1993年在二〇二厂筹建了核工业唯一一个建在工厂里的重点实验室，1997年通过正式验收。2001年1月，李冠兴被任命为二〇二厂兼总工程师。2002年12月，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重水堆核电站用燃料棒束生产线，2003年开始向秦山三期核电站稳定供应国产化燃料棒束。2004年10月，李冠兴从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委托参加第三代核电站的国际招标，任燃料组组长，前后历时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93—2007年李冠兴获得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还担任了中共十六大代表和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冠兴学长（中）在二〇二厂车间

学会十年 砥砺前行

2008年至2018年，李冠兴连续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李冠兴院士领导中国核学会工作的十年，学会国内外学术交流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成功举办中国核学会学术年会、国际核工程大会、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国际青年核能大会、世界核妇女大会、中国（国际）核电仪控技术大会、中国核学会“三核”论坛、海峡两岸核能学术交流大会、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等重要会议和活动。推动学会成为首批工程教育认证、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及团体标准试点单位，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在李冠兴院士的领导下，学会荣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十二五’实施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举办了“魅力之光”杯核电科普知识竞赛及夏令营活动、“院士行”活动；开展了中国核学会科普奖、中国核科普教育基地评选。在李冠兴的领导下，学会对核科技工作者凝聚力不断增强：学会拥有26个专业分会、156家团体会员单位，联系23家省核学会，加入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中国科协清洁能源学会联合体。着力做好组织建设和会员服务，激发广大核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推动我国核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缘素位 自知自胜

随缘素位，是李冠兴给自己树立的人生目标。随缘指要摆脱名利，顺应自然，随遇而安。要以平常心，办平常事，做一个平常的人。素位就是讲究保守本分，作



2006年李冠兴（左2）回校参加工物系建系50周年纪念活动

为院士就是要保守学者的本分。生活中他为人厚道、以诚待人，学术上他求真务实、创新图强。2019年1月李冠兴获中核集团院士荣誉勋章，2019年8月获中国核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1月被中核集团评为核工业功勋人物。步入耄耋之年，李冠兴仍然在祖国核事业领域奋力拼搏、矢志不渝。李冠兴院士历任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名誉总经理，核工业特种材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国核宝钛铝业股份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反应堆燃料及材料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双聘教授及精细陶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核集团核燃料与材料研发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先进核燃料元件研发（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李冠兴院士，我们永远怀念您！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核学会”，2020年12月2日）

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

○钟秀斌

2020年10月19日，中国著名建筑评论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逝世，享年85岁。

2010年夏我因拟出版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先生的著作，读了曾先生2002年写的《江河万里》那篇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的大作，感慨万千，我专程前往造访清华园西南侧简陋的曾府，拜会曾先生。那年曾先生75岁，身体尚健，他和师母在家照看着活泼的小孙女。此前我和先生素昧平生，但曾先生和蔼可亲，一见到我，就热情招呼进屋，引到一间约十多平米的小书房里。师母心直口快，为我沏茶，切西瓜，偶尔也会加入我们的聊天，令我颇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说一口广式普通话的曾先生打开了话闸，讲述了他数次拜访黄万里先生的情形和体会，他颇支持我出版黄先生的著作。说来也巧，2001年至2004年我和家人就曾住在清华园八公寓，与黄万里先生住的九公寓相邻，和曾先生的家也很近。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两位先生，错过了更早认识他们的机会。曾先生敬佩黄先生的精深学问、一身正气和敢为真理而搏命的精神，也为黄先生自1957年以来的不公遭遇而唏嘘不已。

随后，我与曾先生多次见面交流，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印尼华侨，客家人。1960年华南理工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建筑系任教，曾是梁思成先生的助教。1982年起，他参与创办《世界建筑》杂志，1985年任主编，直至1995年退休。他是建筑评论园地的拓荒者。他学养深



曾昭奋教授

厚，思想深邃，文风朴实而观点犀利。他深入研究过北京长安街两侧的建筑，撰写了多篇掷地有声的评论文章，褒贬著名建筑的设计得失，批评过北京西站华而不实的风格。他反对建筑形式的因循守旧，提倡建筑形式随社会生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而创新，提倡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反对固步自封和铺张浪费的复古主义创作潮流。他像黄万里先生一样追求真理，敢于批评一些名流的不实风格，热情肯定中青年建筑师的探索方向。曾先生是国内很早研究圆明园建筑及园林风格的学者。他知道我对圆明园感兴趣后，给过我《一代名园圆明园》一书，这是他和何重义先生合著，由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老书，内容很扎实，如果稍加修订和编辑，会成为圆明园的重要科普书。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圆明园，曾先生热情引荐，让我认识了时任圆明园管理处主任的陈名杰先生（现为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但由于我所合作的出版社编辑不太重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到现在还未能修订重版。

2004年4月，曾先生在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过《清华园随笔》这部随笔专著。我是这本书的铁粉，也正是从该书中看到本文开头提及的《江河万里》那篇文章的。曾先生自1960年进清华园后，就没有离开过，对清华的感情很深。他说，这本书主要内容是他以历年清华校庆为契机写的10篇随笔文章，始于1994年校庆，文章长短不一，多数曾发表于《读书》杂志上。这些文章围绕与清华有关的人、事、物展开，或针砭时弊，或怀念故人，文笔质朴，格调高古，笔锋时而凌厉，时而深情，娓娓道来，韵味深长，阅读该书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我当时特别想再做这本书的修订版，跟他商量，可否每年校庆继续再写这样的好文章，充实到这本书中？曾先生谦逊地说，现在精力不如从前，新写恐怕不太容易了。不过，他仍然将这本书的手稿修改稿准备了复印件，很信任地交给我，让我腾时间慢慢琢磨。此前曾先生写过很多建筑方面的评论文章，出过好多部专著，我并不担心这本书新修订或新增内容有什么困难。于是我就积极向一著名出版社推荐，无奈出版社不在意内容质量的高下，以作者并不知名为由，

没有批准这一选题。我颇感沮丧，觉得愧对曾先生。而他却一直安慰我。

201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水木清华》杂志主编王正在清华园胜因院举办一场读书会，曾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时我俩已是熟识的老朋友了，见面自然高兴。更令我开心的是，《清华园随笔》那本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改为《清华园里可读书》。曾先生愉快地在新书扉页上给我签了名。这年曾先生79岁，身体还算硬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曾先生，他留给我的，依然和四年前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样的笑容。上周二（10月20日）我常“潜水”的一清华资深校友微信群里，有学长发出沉痛悼念曾先生逝世的讣告，确实令我感到意外而心痛。曾先生在清华园里60年来著成的道德文章，一篇篇地在我脑海晃过，但首先令我忆起的，就是这本书和这篇文章——《清华园里可读书》。今天我就与朋友们分享它，藉此怀念曾先生！这篇文章虽是曾先生26年前所写，他当时所忧虑的清华，现在是否有所改观呢？如果没有，那么这篇文章就更值得现在再读了。

2020年10月30日

我校体育部老教授王维屏逝世 享年 104 岁

2020年9月22日，我校体育部老教授、中国足协原副主席王维屏仙逝，享年104岁。

王维屏先生1916年12月出生天津宝坻，194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1943年受聘于西南联大，1949—198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57年1月7日被评为国家级裁判，1979—1985年担任中国足协副主

席。他是我国第一批足球国际裁判，曾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执委，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广大师生尊敬和爱戴的资深体育教授，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华体育教育和中国足球事业，1995年中国足球协会授予王维屏“一生奉献、绿茵功臣”的荣誉称号。

我的爷爷王凯

○ 方世宽



青年时期的王凯

我的爷爷本名王凯，1948年到解放区后改名方安逸，他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少时求学，他先后考取北大、清华，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立志报国，后服从祖国秘密调动参与铀矿勘探一线的工作，晚年在铀矿产地江西抚州教育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2001年10月5日，爷爷在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8岁。

回顾爷爷的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406大队地质工程师，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勘探专家。他的一生是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少年求学 危难立志

爷爷出生于当地大家族，生活富足，但他勤俭刻苦，毫无少爷习气。中学时，北平已沦入日寇之手，他在教会学校汇文中学上学，因而少受日本奴化教育，1943年考入在北平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学习之余，他经常思考

改变时事之路径。当时的北大已有地下党活动，他曾积极参与北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并与友人共同发起《大学周报》刊物，为当时进步同学发表进步见解提供平台，并被选为北大工学院学生会主席。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教职员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和毕业生进行歧视性的甄别审查，甚至称他们为“伪学生”，其实沦陷区学生绝大多数是抗日的。这引发知识群体极大不满，地下党因势利导发起“反甄别”运动，并按照“争取理解，培养信任，发展组织”的路线，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同时揭露了国民党“下山摘桃”、反人民等恶行。这也使广大学生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爷爷当时是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会主席，他积极组织 and 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反甄别”运动。

当时“反甄别”运动得到了由昆明等大后方复员回来的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南北学生运动骨干和地下党进行了会师，从此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爷爷于1946年由北大地质系转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在清华，他不但潜心学业，而且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7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一生奋斗的方向。

学成报国 不计得失

听我的叔公、爷爷的堂弟王泮说，他

是1946年由昆明考入清华航空系，也参加了地下党，因为不是一个系统，虽然互相猜到对方是地下党员，但心照不宣，互不通气。1948年暑假我爷爷毕业，组织通知他去解放区工作，我叔公也正好被通知去解放区参加短训班，为了互相掩护，党组织批准了两人通气。后来，我叔公学习后回校，我奶奶还抱着不到周岁的我父亲到清华找爷爷，叔公说爷爷到保密的地方实习去了，把她劝回了老家。

爷爷到解放区后便按规定更名为方安逸，解放后也没有改回，所以现在我们家仍姓方。他先分配在晋察冀边区工业局机械工业部情报研究所工作；1949年4月太原解放，5月他随太原军管会工业组军代表组参与接收工作，后任太原轻重工业管理处地质组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任务，对龙烟铁矿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测，确定这里的矿石类型为赤铁矿、菱铁矿和磁铁矿，且

矿层的厚度和储量丰富国内罕见。1950年，他调入河北宣化龙烟铁矿任计划科科长，1953年又调入省钢铁局地质处主持地质勘探工作，1954年调入国家重工业部地质局任地质工程师。

1955年，一份神秘的调令下达，选调的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历史清白，政治面貌党员，初中以上学历。但去哪儿，干什么去，调令上只字未提，只是被告知在规定时间内要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报到后，他们被直接送上专列，整整三天三夜时间，每天每顿饭两个烧饼一杯水，日夜兼程到达了甘肃兰州。在兰州进行后勤补给，给大家配发了皮袄、皮裤和皮靴。看着这些东西，大家开始猜测，应该不是去西藏、青海，就是去新疆。果然不出所料，带队的领导宣布了工作地点和目标任务。他说：“同志们，现在要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挺进新疆寻找铀矿石，为祖国原子能核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时，大家才知道，急切把大家集中起来日夜兼程赶到这里，原来是为了国家发展原子能核工业，创建铀矿地质勘探队。

当时勘探铀矿石采用的是航空放射性测量，先由飞机飞到距地面150~200米的高度，通过仪器接收放射性信号，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就会从飞机上投抛石灰包定位，实现概略找矿。然后再由地面普查队员根据飞机投抛的石灰包定位进行查找、勘探。由于飞机从高空投抛石灰包会有一定偏差，因此地面搜索工作依然很艰巨。地质队员们硬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飞机空投石灰包的范围内外仔细寻找。准确位置找到后，再由地质



王凯（左）学长和王浒学长清华读书时，在航空系飞机库前合影

□ 怀念师友

工程师和物探工程师绘成详细图纸，最后进行大规模勘探采样。十几斤重的仪器每人背一台，走一走停一分钟，打开仪器进行一次测量。每人一天要数着步子行走20公里，漫山遍野地到处跑着找有价值的矿石，有时跑上几天都没有一点收获。

新疆的地质勘探工作相当艰苦，爷爷带领地质勘探队员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野外寻矿，晚上加班整理资料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他们没有休息日，从开春一直忙到大雪封山方才收队，历时三年，夜以继日。

1958年，406大队成立，爷爷任地质科科长、工程师，被分配至江西境内勘探。同年，他们不畏艰苦，勇于探索，发现并勘探明确数以百计的各类放射性异常区域，查明的铀矿床数和探获的铀资源，其储量名列全国第一。其中不少铀矿床现已开发利用，为我国国防事业和核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根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原子能核工业总体战略方针，爷爷服从组织调动，由406大队调到同属核工业系统正在筹建中的江西抚州地质专科学校（后曾扩大为华东地质学院，现改为东华理工大学），负责培养原子能材料的后备干部，直至2001年去世。

“文革”期间，奶奶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曾被红卫兵押送回老家批斗。爷爷全家被扫地出门，落户农村。但由于爷爷、奶奶干农活非常卖力，又为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受到农民拥戴，曾推举他做乡党总支书记。“文革”后，爷爷一家被平反，返回学校。我叔公王泮曾说：“50年代，你爷爷在重工业部工作，安家在北京百万庄，我们常来往。后来听说他去苏联

学习，又调到江西工作，就很少联系。

“文革”后才知道，由于他从事的是保密级很高的原子能材料工作，所以“文革”前我们联系很少，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有了联系，但他对过去的事仍不多谈。”

安贫乐道 直道而行

1984年，我爷爷获组织批准离休。在学校里，他虽然资格老，年纪大，但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为人低调，作风正派，从不计较职位高低和个人得失，不谋取私利，不向组织提要求。我奶奶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师，后来随爷爷到处奔波，子女又多，就丢了工作。“文革”后在学校烧锅炉当杂工，我爷爷从未为奶奶的事找组织提什么要求。离休后，家中没有特别的私产，也断绝了回老家的想法，长期居住在学校分配的住房，一日三餐，简而有序。

1995年，爷爷因多年的隐疾发作，中风偏瘫在家。学生会组织了互帮互助小组，轮流去照看他。他虽然行动不便，但尽可能不去麻烦同学们。互助小组中有一个学生，每次来照看的时候都非常尽心尽力，但是爷爷发现她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问其缘由，原来她来自一个贫困县，家中贫穷。爷爷当即表示，她如果愿意，可以免费到家里吃饭，并帮助缴纳了学费。平时她遇到不懂的问题，爷爷便悉心教导，传道授业解惑。事情传出去后，一时间，请教的同学络绎不绝，爷爷都能不顾身体劳累，耐心讲解，用独有的人格魅力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他为人师表，全心奉献，影响并感染了一批年轻师生。

爷爷一生中默默奉献，他没有担任什么高级的职务，但从不计较，是一位平凡而高尚的共产党员。

落叶满空山

——忆父亲徐义生

○徐大元 口述 谢喆平 整理



一九三三年，病愈后的徐义生摄于清华宿舍

我的父亲徐义生190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焦溪镇，家里是做粮食生意的。他自小聪慧，学习成绩优异。12岁时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称江苏省常州中学）。1925年他16岁，中学要毕业的时候，由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地的大学都停止招生了。在长辈的建议下，他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在北大预科的两年，他接触到很多爱读书、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朋友，兴趣慢慢从理工转到了文法。临毕业时传来消息，说北大要改组为京师大学堂，由张作霖派校长。他觉得在那些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北大的前途可想而知，就决心到清华大学去。

一、清华

当时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学生的学费毕业时全部返

还。父亲1927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是第三级学生。进清华后，家中发生变故，经济情况急剧下降。父亲只好靠课余翻译稿件挣稿费来继续学业，还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

清华读书风气很盛，学生求知态度认真。由于和美国的亲密关系，清华学生比较活泼，作风洋派。课外活动一直受到美国学校的影响，蓬勃发展，丰富多彩。清华把读书叫“开矿”，健身打球叫“斗牛”，重视体育等各种活动，培养健康快乐、有创造力与领导力的学生。在清华上学期间，父亲对太极拳、昆曲、笛子、书法、篆刻都有一定的造诣。

清华学生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书。读书环境的得来不易和对国家的责任，使多数人都不要妄自菲薄，不浪费光阴。当时政治学系的课程偏重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公法、国际关系等方面，教材多用外文书籍，中国的较少。学生需努力以赴，否则过不了关。

因为课业重、要求严、淘汰率高，清华学生的学业水平比较整齐。经过近四年刻苦学习，毕业的最后一学期，父亲感染了阿米巴病疾，在清华医院躺了整整十个月，1931年底才出院，但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保送本校研究生。

当时清华研究院对研究生的挑选极为严格，即使是陈省身先生，也是南开大学

□ 怀念师友

毕业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后才考入的。在研究院，父亲的导师主要是政治学系的张奚若先生和钱端升先生。当时清华教师年龄比较轻，大多受过西方教育，不但汇通古今，还汇通中西、汇通文理。他们大多认真教学、勤于研究、引导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他们也关心社会，发表言论，促进社会和政治改革。这时期清华的教师阵容也比前期开放，成了一个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学府。

二、留学

1933年，清华大学恢复公费留美招生。同年8月，父亲参加了选拔考试，考取了民国二十二年度（1933年）的留学名额，专研公共行政，成为清华大学（新制）的第一届留美公费生。

1934年1月，父亲乘船去美国。那时的美国正是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他先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了一学期，觉得哈佛的空气太保守，当时比较进步的学者们大多在纽约，于是就转

学到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父亲在哥大研究院学习了两年，学满学分，获得硕士学位。因为清华公费还有半年，他又转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了半年，为的是听英国政治学者洛克（Locke）的课——当时认为洛克是比较进步的学者。他到英国几个月后，清华公费满期，他就启程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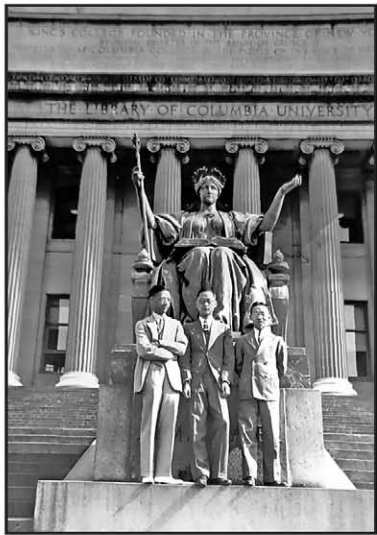
当时，苏联新宪法草案刚公布，得到英国进步学者们的一致赞扬，所以父亲回国时决定参观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和苏联，从西伯利亚回国。1937年的2月他回到北京，但是接到了祖母得病、要他马上回家的消息。

三、中研院

父亲回江苏老家后，接到清华导师张奚若先生来信，约他回清华任教。但当时祖母病在床上，希望儿子能离家近些。恰好那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新添了研究行政组，钱端升先生就把父亲介绍给所长陶孟和先生。1937年4月，父亲进所工作，担任副研究员。陶孟和先生在学术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年轻人放手扶持，深得研究人员的尊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央研究院就开始了向后方的大搬迁。父亲当时单身年轻，负责押运图书资料。8月中到长沙，9月搬到湖南衡山南岳圣经学院。1938年由衡山南岳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学术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他在广西的一年里进行了广西省的行政研究，到各县去收集资料。

1939年1月，社会调查所又迁往昆明。当时西南联大也设在昆明，张奚若先



一九三六年夏，徐义生（右）与好友曾炳钧（左，一九二九届政治）、黄文熙（一九三三公）于哥伦比亚大学

生和钱端升先生邀请父亲在西南联大兼中国地方制度课程教学。陈省身先生从法国回国后也在西南联大任教，与父亲等一批单身教师常在一起打桥牌。1939年7月的暑假，父亲到上海结婚，对象是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我母亲黄湘君，陈先生随行。

外公黄首民（1890—1976）是浙江湖州人，早年参加革命党。辛亥革命时他是督教员、黄兴的卫队长，由于追求有文化又漂亮的我外婆，被约法三章，不准做官——怕他娶小老婆。在跟黄兴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典的船上，他向黄兴表示不要做官，想去读书。他带黄兴的信去见孙中山，孙中山连声夸奖：“年轻人不要做官，要读书，好！好！”他中学学的是英语，就安排他以革命党退伍军官的退休金去了美国南部半工半读学农。当时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外公眼里美国什么都好。回国后他们学农的大多转了行，外公给荣家上海纺织厂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以后又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械化的泰山砖瓦股份公司并任总经理。外公说他“衣食住行”就差没有来得及搞“行”了。

外公总是夸父亲聪明，翁婿关系很好。母亲当时受到外公影响，非美国留学生不嫁，通过她表姐夫王家辑（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她说父亲脾气好、人好。婚后，她放弃了上海明德女中的教职，与父亲经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

当时昆明经常被日军飞机轰炸，不得不常去跑警报。从城里搬到乡下后父亲专心整理他在广西调查搜集的资料，写成《广西省县行政关系》一书。1940年冬



徐义生（前排右1）在桂林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与同事合影

天，所里要迁往四川李庄，那时我母亲刚生了大姐要照顾，陶所长让父亲在昆明负责收尾工作，1941年7月才到达四川宜宾李庄的石崖湾。

当时的李庄是全国学术研究最活跃的地点之一，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担任社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文字研究所（傅斯年担任所长）、同济大学都已在此地。父亲在李庄期间，多次到四川各县和成都去进行社会调查，目睹了四川农村农民抗战中的沉重负担和被拉壮丁的凄惨现实。他在李庄还参与了“中国人文学科社”和“中国经济建设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撰写了《抗战建国与地方自治》及《行政委任的问题》等文章，并于1943年晋升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在陶孟和所长不在李庄期间，他与1949年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明代赋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先后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

1946年10月，社会所从李庄回到南京。1947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系兼任教授，讲行政法，很同情因为“反饥饿”游行而被迫害的同学们。后来所里派父亲到上海进行善后救济的行政制度研究——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出版了

□ 怀念师友

父亲的《善后救济工作的行政制度》。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应该是和平建国的极好时机。父亲和大多数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一样，所学所教多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知识和理念，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信念是“为学术的使命而生存”。当时，他们希望能建立联合政府或按美国调和方案：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互相监督，和平竞争。这一时期，他写了《中国新宪法》等文章。

父亲是相信改良主义的，他总是在问：为什么现在总是说革命，不说改良？他当时认为北欧的改良主义是最成功的，社会代价最低，人民福利最好。但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国情，国民受教育程度低，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国共两党终于还是发生了大规模内战。人民希望和平，厌恶腐败，怨声载道。国民经济不支持战争，战争的巨大开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人民解放军取得大规模胜利，国民政府终于大溃败。

1948年临解放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坚决要去台湾，多次催促陶孟和先生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台湾，但是陶先生仅将旧报纸冒充图书资料装箱运台，坚决不走。

四、1949年后

1949年南京解放后，父亲仍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研究员。1950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专任研究员，并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当兼职教授。他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调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还听了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同志的讲课。在南京时他还向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李元先生等学习了一些天文知识，当时大家都住在南京成贤街92号。

1952年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院系调整，将欧美体系全部改为苏联体系。清华大学的文理科大部分并入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陶孟和副院长从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改为兼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在院系调整中，人事部门征求父亲意见，将他调往北京政法学院，可保留原职称和待遇——当时钱端升先生是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他带的研究生罗典荣先生去了北京政法学院，“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国著名环境法专家。父亲通过到革大的学习和考虑政治学被取缔的现状，选择了留在经济研究所，改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职称也从二级专任研究员调整为七级，1956年又回调二级。他拒绝了人事部门提出可以领取每月480元的保留工资的建议，决定他什么级他拿什么钱，还经常说领取保留工资是“鸭屎臭”。他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多箱西方政治学原版书籍赠送给了北京政法学院。

父亲转入经济史研究，参加了俄语学习班，1953年与其他同志一起翻译了《苏联经济的工业配置》一书，与严中平等同志一起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第一种，他承担了其中商埠、租界、租借地章节的撰写工作。由于精通英、法、德、日、俄等多门外语，又有深

厚的古文字功底，父亲在经济所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外债史和部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1956年他在《经济研究》期刊上连载了《清政府的外债》。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一书。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先生主编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引用了该书数据。

当时，因为国民政府外债资料都被运到台湾去了，外债研究工作没法继续，父亲提出研究内债和公债，但是没有得到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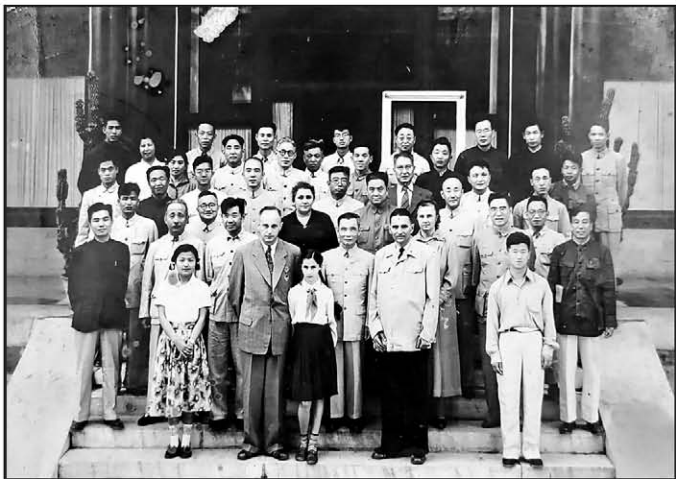
1961年8月，父亲调到安徽大学政治系，教“中国近代经济史”。1965年，政治系搬到安徽劳动大学，因为年岁较大，父亲留在了安徽大学马列教研室当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他曾经不堪凌辱想自杀，但是被母亲开导和制止了。在劳改队经受了繁重的劳动和“斗批改”

后，1969年9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安排到了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父亲为人谦和，做事认真，责任心强，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1979年，父亲在第4期《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关于楚相孙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1982—1983年，父亲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的邀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选写“外债”“外国在华洋行”“商埠”“租界”等条目；为经济学卷撰写“近代中国的外债”“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庚子赔款”“善后大借款”“国际银行团”等条目。他还为改革开放编写了《1840年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公司名录》（未出版）。

1983年，美国民间部分湖广铁路债券持有者提出要求偿还债券本息，并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法院立案。由于这个案子，中央对旧中国的外债问题非常重视。父亲向中央陈述，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美国人以很低的价格从德国持有者手中购买的，无权要求我国偿还本息；再说旧中国外债至少650笔，本金总额61亿元（以上世纪30年代初通用银元为准），加上一百多年的利息，决不能开赔偿先例，否则后患无穷。之后，父亲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聘请为“近代财经史研究组”顾问。在中央充分调查旧中国外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发挥了重要的资料文献作用。以



1955—1956年间，经济所顾问苏联专家阿·毕尔曼（1排左2）与经济所部分人员合影。其中2排右2为徐义生，2排左3为于光远

□ 怀念师友

后，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聘请律师，打赢了湖广铁路债券民间索赔案，制止了其他想拿旧中国债券向我国索赔的案例，为国家避免了巨额财政损失。

五、终曲

父亲年轻时一帆风顺地做了政治学的名教授。院系调整后是“王小二过年”，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他在年轻同事和学生面前特别当心，生怕别人说他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从事理工科，踏踏实实多做实际工作。好在“反右”运动中父亲发言较少，加上国家对科学院的特殊政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们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姐学医，二姐和我学了工科。父亲的自尊心很强，家庭观念比较重，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文革”中他是不可能不甘屈辱挺过来的。

1973年高校招生按录取人数四倍推荐，文化考核中张铁生交了白卷，我在安徽和县考了第一，被合肥工业大学拖拉机设计制造专业录取，父亲非常高兴。我插队当了近5年知识青年，25岁才进了大学门，还算是当时的幸运儿。可是程度不齐，教材太差，还经常出去开门办学。父亲说当时的大学就是干部培训班，哪里是做学问。

父亲常和我们说人年轻时多吃些苦没有关系，怕的是老了吃苦，人要芝麻开花节节高才快乐。有一段时间电视上放清宫戏很多，父亲很反感，说怎么还总是宣传皇帝一人之下全是奴才？他对吃吃喝喝也非常反感，总和我们说结交酒肉朋友是最没有用的。

1991年春节前，父亲在家煤气中毒。

当时我正与解放军105医院（当时合肥市唯一有高压氧舱的医院）神经外科合作科研项目。105医院的病房与高压氧舱离得较远，往来要经过室外，本来就是2月冷天，又来了寒流，结果父亲染上大叶性肺炎去世。

父亲生前表示要把骨灰撒掉，但两个姐姐坚决不同意。1998年清明，我们父母合葬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陵园，与许多安徽高级知识分子相伴。

父亲一生受老清华传统影响，只做学问，不去做官。他自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总是教育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也是一个有很多爱好的人，喜欢打太极拳，唱昆曲。在合肥时，晚上常在教工球场看星象，在家搞篆刻。他是中国科学院唯一被降级的研究员，对于名利他早已看淡了，他只是希望能用他的知识多为国家做些工作。父亲做学问非常认真，自己收集资料，严格核对数据，一丝不苟。虽然他专研的公共行政在1949年后未能得到重视，但改行后所从事的外债史研究为国家避免了大额的外债赔偿，也为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看到自己清华理工科同学的大量的论文和成果，父亲内心还是很痛苦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在科学院工作的同学都受邀请去参加清华校庆，他说不知道他还算不算校友。后来安徽省清华校友会成立，邀请父亲作为第一老前辈在会上发言，父亲非常高兴。

父亲去世后，安徽大学送上挽联“学贯中西 经国文章存史册；行同日月 一生正气在人间”，我想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文中照片由董杰提供）

追忆刘炯朗校长二三事

○李 军（1980级自动化）

看到刘炯朗校长已于2020年11月7日因病仙逝的消息，才想到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C. L. Liu在学术界大名鼎鼎，有朋友在清华读书时的离散数学教材就是他的经典之作*Element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但我最早知道刘校长，却是因为他于1998年就任新竹清华校长伊始，就遇到一位女研究生情杀同学的恶性事件。那时，我正在旧金山湾区校友会服务，对两岸清华的信息都比较关注，在中文报纸上看到刘校长被搞得很狼狈的样子，觉得他很倒霉，因为发生这样的惨剧，实在让一位从美国聘去的新校长很难应对。

在我回国多年以后，有次偶然看到报道，刘校长在2002年离任新竹清华校长时，曾独自背着个双肩背，悄然地去监狱探望了那位女生。不放弃一个学生，哪怕是曾因引发媒体风暴而给自己带来下马威的在监犯人，这样的校长令人肃然起敬。

第一次谒见刘校长，是在硅谷东湾的ESST公司。当时我以校友会的名义，协助推进邵晓风和曹敬军等人发起的留美学者暑期赴清华讲学项目。经时任公司首席科学家、原清华无线电系茅于海教授介绍，去见CEO陈先生，争取捐款支持。这个项目是史宗恺倡议和

推动的，前期得到了斯坦福教育基金会和老校友刘天宏纪念奖学金的赞助，历时多年，请了李彦宏（当时还未回国创立百度）等每年10人，暑期在清华开设短期集中课程。那天，在接待室等着会见的还有一位长者，就是刘校长。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耐心地和我一起静候，只为给新竹清华募捐。后来在校友会组织的欢迎刘校长聚会上，才知道他来硅谷筹款的项目之一是为了送新竹清华学生大三后赴美游学，但也听他提到有些学生因为那几年台湾经济“太好”，而不愿“去美国受苦”。如今在大陆，这竟也成了一些都市出身独生子女的状态。回想当时刘校长与校友的交流，亲切随和、毫无官腔，他心里想



1998年11月，刘校长（前排左3）与硅谷校友相聚。多位北加州湾区校友会会长参聚，包括前任会长张耀华（前排左2）、苏启明（后排右3），当任会长李军（后排左4），当任副会长、后任会长林玮铭（前排右1），后任会长李庆（左侧最高）、白晓云（后排左2）、周幼兰（后排右1）

□ 怀念师友

的、嘴上说的，都是培养学生。

2001年，是清华建校九十周年。我有幸参加了先在新竹、后在北京两个校园举行的庆典和相关活动。不知是否都是刻意安排，但我觉得刘校长真的很大度。首先，毕竟先有北京清华，后有新竹清华，北京的校园是清华最初的发祥地，所以正日子留给了北京清华，新竹提前举办校庆，方便北京清华代表团，也方便希望参加两岸校庆的校友。其次，在新竹清华的校庆典礼没有悬置“国旗”，奏唱“国歌”，除了当时的新竹市长，也没有其他政要讲话，主席台上并排端坐的，是王大中校长和刘炯朗校长。我在两岸校友共同参加的湾区校友会服务过，深知这是很难平衡的事情，因为即使在硅谷的每次大型校友活动，这都是需要谨慎关注的敏感因素，更不要说在“国立”大学校园里。最后，在刘校长带队参加北京校园的校庆活动时，庆典上和我们一样坐在综合体育馆的看台上。这让我等内心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但刘校长很谦和，看上去并不介意。我想能让他更高兴的，是学生对他的爱戴。回想新竹校园庆典的当晚，在去观看学生联欢活动的路上，学生们自发而



左起：北京王大中校长、新竹刘炯朗校长和北京胡东成副校长在北京清华90周年庆典晚会上

热情地欢呼“刘校长好”，我作为随行的旁观者，都很感动。

2008年，信研院成立五周年。4月19日下午，院庆（也是校庆活动一部分）非常有幸请到刘校长以“演算之美”为题演讲，真是学者风范、儒雅气度，妙趣横生、精彩绝伦。当晚，北京清华的几位老友请他吃便饭，回忆了一些两岸清华交往的故事和各自教学研究的趣闻，大家非常高兴。刘校长退休后不但继续为学术界和工业界服务，还做了一个广播节目（后来才知道这个名为“我爱谈天你爱笑”的节目持续了十几年），并笔耕不辍，出版了多本人文和科普著作。饭后，他给大家送书作别，我开车送他到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休息。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校长。其实我一共也没见过他几次，更遗憾没能单独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更多为人做事的道理。有些人，萍水相逢，几面之交，但却让人敬仰崇敬不已。刘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睿智、和蔼、大度的长者”（王岩学长语），让人向善，令人难忘。

深切悼念刘炯朗校长。



刘炯朗校长在信研院演讲

怀念遇平静同学

○吴永新（1966届土建）

遇平静同学于2020年9月5日下午在深圳逝世，享年82岁。

遇平静同学是我校土木建筑系1964届校友，工民建专业。后因身体原因延期毕业，1964年转到我们班补学“钢结构”课程，教师是王国周教授。“文化大革命”时期毕业分配，她被分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来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九设计院工作。她工作努力，钻研技术，曾在《建筑结构学报》及《中国科技之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世纪80年代初，她和爱人葛俊卿校友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来到深圳大学，并参与组建深大结构与市政工程系，以后又担任深圳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并兼任党总支书记。她为组建深大土木系到全国各地招募土建专业人才。她自己还兼任钢结构教研室主任。遇平静平易近人，热爱事业，关心学生，提携后辈，为深圳大学培育了一批建筑结构及管理专业人才。

遇平静同学退休后，在清华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后改制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组建了结构诊治中心。后又在清华大学卢谦先生等几位知名教授参与下成立了深圳市清华苑工程结构鉴定有限公司，培养了一批接班人。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在为深圳的建筑行业提供很有价值的服务和贡献。

遇平静同学尊师敬长，关爱同事、同学和朋友。她每年都回母校参加校庆，参



遇平静学长

加校友总会的捐赠项目，看望老师和校领导。校党委老书记高沂和王国周老教授在世时，她每次回校必去拜访。校党委原书记方惠坚和土木系方鄂华教授都是她常联系拜见的前辈老师。遇平静同学能和同事同学打成一片。她乐于助人，也乐于资助有困难的同学。她还关注民族团结，与新疆哈萨克族托列吾汗同学经常联系，相互关心。

遇平静同学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她深爱事业，关爱他人。她生前有遗言，遗体捐献给深圳大学医学部，为医学教学事业做最后的贡献。

遇平静同学一生都活跃在她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也活跃在同学同事们的友好交往中。大家都敬佩她、喜爱她。用我们的老师梁鸿文教授的话说，遇平静，她的善良和爱心，是人性中永恒的光彩！

遇平静同学千古！

西南联大老学长陈雨波逝世 享年98岁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西南联大老校友陈雨波同志，因病于2020年9月15日不幸逝世，享年98岁。

陈雨波，原名陈燕，1922年8月20日生于无锡。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土木系。1945年4月毕业后，志愿参加战时运输管理局第一公路工程总队，赴广西抗日前线修路修桥，抗战胜利后复员回上海。1946年10月，陈雨波应聘为清华大学土木系助教，1947年9月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炼社”。1949年7月，哈工大校长冯仲云去清华公开招聘助教，陈雨波参加应聘，并于9月初与新生一起赴哈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哈工大第一位中国专业教师（哈工大先后受俄、日控制）。196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9月，陈雨波调任哈工大土木

系助理主任，1953年起先后任基建设计室主任，土木系副主任。同时，陈雨波重入研究生班随苏联专家学习并参加教学工作。1955年7月，陈雨波调任教务长助理，后任教务处副处长。

1959年4月，土木系自哈工大分出成立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陈雨波被调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1973年3月被任命为建筑设计院负责人。1979年4月担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1982年2月担任院长，同年被评为教授。1983年8月担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1986年2月，陈雨波退至二线后，曾担任《中国土木建筑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并担任辞典《建筑结构》分卷的两位主编之一。1991年5月离休。

沉痛悼念韩至骏教授

2020年10月21日，清华大学机械系韩至骏教授因突发事故去世，享年90岁。

韩至骏，江苏省镇江人，1930年出生。1953年9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同年分配到清华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在机械制造系机械制造工艺、金属切削机床及工具教研组任教，一生从事数控技术的科研教学、研究生培养和实验基地建设等工作，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任数控组组长，数控机床实验室主任，数控实验室主任，数控研究室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理事；是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他是我国第一台数控铣床设计研发的参与者，该机床1960年正式移交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使用，1963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获国家科委三等奖。作为我国老一代的数控专家，1989年他协助机械工业部制订了我国数控发展规划，引导和促进我国数控事业的发展；并参与我校CIMS国家工程中心总体设计和建设。结合国家“八五”重要攻关项目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国产高端数控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打下坚实基础。多年来，他以科学、严谨的精神培养了大量数控技术领域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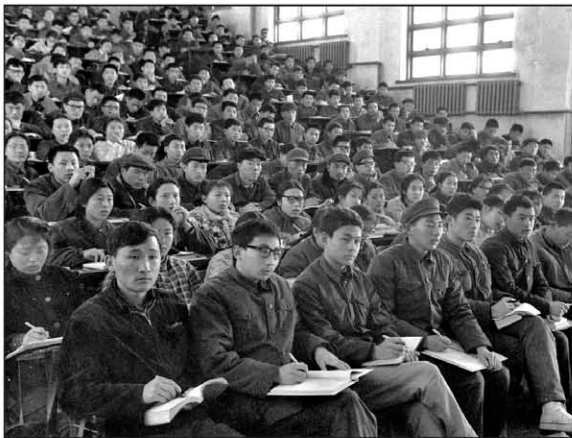
历史前排的固七班同学

○贾海东（1977级力学）

2018年9月，北京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国家相册·致敬历史——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典藏展”。百年国史，在一幅幅经典照片里呈现；光辉历程，在一段段难忘记忆中延伸。在展厅端头，一张巨幅历史照片，几乎占满了整个墙面。

这张由新华社记者顾德华于1978年拍摄的照片《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凝固了那一段珍贵的历史场景，展示了那一批1977级同学的历史风采，一直是一幅纪念恢复高考及记录新一代大学生的经典历史作品。

在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中，坐在前排主要位置上的，是当年工程力学系固七班的几位同学。前排左起，第一位是王均同学，第二位是张中民同学，第三位是邓勇同学，第四位是周叮同学，第六位是刘玉民同学。



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

我曾在2017年写的《清华一九七七级赋》里，描述过这段历史：

是日，高数大课于西阶。记者入，摄吾生于书堂，定瞬间于永恒。后刊兵部画报，流传至今，竟成经典。其风貌之淳朴，其神态之专注，其远方之向往，其未来之期待，非后辈所能及也。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金色的十月之后，又迎来了科技的春天。1977年底，全国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据记载，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为570余万，而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只有4.7%。1978年初，经过“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纷纷走进校园，由此诞生了标志着中国时代变迁的新一代大学生。

1977级，一个响亮的名字，是在特殊时代下具有特殊含义的一批大学生，是在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具有远大抱负的一群年轻人，是在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并在后来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建设者。

固七班的36位同学，幸运地成为1977级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幸运地走进了清华园，幸运地坐在了见证历史的最前排。

历史的必然，充满着许许多多个体的偶然。

固七班的29名男生和7名女生，好像没有一人是报考这个专业的，

□ 荷花池

多数人也都没有报考工程力学系，其中大多数同学甚至都不大清楚什么是固体力学，唯一相同的是在报名志愿表上，都填写着“服从国家分配”，加上在各自的高考分数中数理化成绩都比较好，结果就被学校“分”到了一起，组成了固七班。

固七班的那几位同学，同样也是偶然的，坐在那张历史照片中的第一排。当时在西阶梯教室上“高等数学”大课，许多女同学早早地就进去坐在了前面的几排。由于第一排的座位没有桌板，不方便做笔记，反而没有人愿意去坐。而我们班的那几位同学，几乎都是同一间宿舍的，前一天晚上夜自习睡得太晚，早上都差点儿睡过了头，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匆匆赶到阶梯教室，见到满教室都坐满了人，唯有第一排的几个座位是空着的，只好别无选择地坐了下来，把书本放在腿上记笔记。

这就是历史。最美好的瞬间，总是留给在最合适的时间里出现的最合适的人。

工程力学系的1977级有两个班：固体力学专业的固七班和流体力学专业的流七

班。1978年3月入学时，我们固七班里年龄最大的，是两位30岁的“老大哥”，带着工资上学，家里还有小孩（在校期间又生了老二）；年龄最小的，是两位才满15岁的“神童”。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北至黑龙江，南到云南；入校之前的身份也是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教师、下乡知青、应届生，等等，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军人。

我们入学后，男生住在一号楼的一层西侧，浴池就在路对面；女生住在新斋三楼东侧，下楼不远处就是开水房。宿舍里一般住6个人，三个上下铺，两三个小书桌，房间里大都塞得满满的。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年代。经过了刻骨铭心的高考，走进了心仪已久的校园，入校后的我们，和其他七字班的同学们一样，开始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快乐紧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至今仍让每一位同学记忆犹新。

当年同学们刻苦认真的学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晚上11点钟，校内各教室必须关灯关门，只有几个阶梯教室还“网开一面”，于是大家纷纷翻门越窗而入，坐满了整个教室，继续晚自习，成就了一段“不夜城”的往事。

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将各位力学大师请来给我们上基础课。记得“材料力学”的第一堂课，是由当时的副校长张维教授讲的。张先生授课生动风趣，谈笑风生，挥洒自如。他对我们说：让老教师上台讲课，很好很开心。但老教师也常常会出错，经常会“心里想的是—，嘴上说的是二，手里写的是三，其实应该是四”，逗得我们开怀大笑。

“高等数学”课由谭泽光老师教，几



王均同学（左）与作者贾海东（右）在多伦多

个系相关专业的三百多名同学，让西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新华社记者就是在这间阶梯教室，将我们固七班等1977级同学上大课的情景摄入镜头，成为那张著名的经典历史照片，永久地珍藏在国家相册里。

“普通物理”课由张三慧老师教，他一上来就直接用英文授课，害得不少同学“云里雾里”晕了好一阵，常常在复习时将课堂内容又重新转译温习一番，无形中加深了记忆和理解。

“英语”课采用《工程英语》课本，教英语初班的罗老师尽管很年轻，但对班里几位入校前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的同学照顾得很细心。罗老师授课非常卖力，刚开始时多少有点紧张。记得上第一堂英语课的时候，罗老师上了一节课就把两个课时的内容都讲完了，第一节下课时刚准备走，才发现还有一节课没上呢！

在工程力学系，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著名教授有：张维、杜庆华、黄克智、王勳晟、徐秉业、余寿文、黄炎、庞家驹、郑兆昌、张如一等；还有当年就非常出类拔萃的中青年教师：贾书惠、范钦珊、夏之熙、宋国华、薛明德、邵敏、姚振汉、叶宏开、潘文全、孙学伟、刘信声、李德葆、任文敏、郁吉仁、周辛根、何积范、刘宝森、蔺书田、查明华、潘真微、王笃美等。记得我们对德高望重非常敬仰的老教授，不论男女，均称“先生”。除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宋国华老师和薛明德老师之外，系辅导员还有陈兆玲老师和陈克金老师。当时我们工程力学系的系书记为李德鲁老师，系主任为王和祥老师和朱文浩老师。

在此，我们固七班的全体同学，再一次向力学系的老师们深深致谢！感谢你们的尽心尽责，感谢你们的呕心沥血，感谢你

们的言传身教！你们的教导和指引，是我们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相比之下，当年的政治学习，是一件让人不得不重视的事情。每周的时事学习，念报纸就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北方同学念起来还比较利索，南方来的同学就费点劲，常常整出点笑话来，当然也借此把普通话发音练好了许多。

清华一直非常重视体育锻炼，每天下午4点半钟的《运动员进行曲》，督促大家放下书本、走出教室，来到西大操场打球、跑步。班里的同学，将偌大的校园里每个角落都跑遍了。当然了，圆明园是我们跑步时最常去的地方。

周末或节假日，颐和园泛舟，北海游园，十渡戏水，云水洞郊游，还有八达岭登长城，都留下了我们年轻的足迹，都凝固在当年黑白现已泛黄的那些珍贵照片里。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文艺晚会上，有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是由我们七字班同学在校时创作的。这首由我作词、牟文殊作曲，曾经在校内传唱过的《我们大学的歌》，不仅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紧张而快乐的校园生活，同时也让我们能在毕业多年之后才真正懂得：厚德载物，任重而道远；自强不息，伟大而平凡。

我们大学生活，充满年轻的歌。

那是轻快的歌，也是紧张的歌，
轻快紧张一样快乐。

我们大学生活，充满智慧的歌。

那是丰富的歌，也是平淡的歌，
丰富平淡一样火热。

让我们珍惜这生活，让我们唱起这歌，
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永远朝气蓬勃。

一转眼，我们毕业都快40年了。我们多么期待，固七班的全班同学们，能够再

□ 荷花池

一次相聚在清华园。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年报到时的二教，让我们一起去一号楼和新斋看看当年住过的宿舍，让我们一起去四食堂原址看看当年吃饭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去系里看看老师们，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西大操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图书馆、大礼堂……

当然，一定别忘了一起去看看大礼堂旁边的西阶梯教室。在那张历史照片拍摄

的地方，让我们各自找到并一同坐回到当年的那个座位上。让固七班同学再一次并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前排。

2020年9月30日于多伦多

贾海东，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校田径队男子短跑队队长。毕业后，曾在建筑设计院和政府部门工作。后旅居加拿大，现从事结构工程设计工作。

亲历一张“经典”照片的前前后后

○ 邓 勇（1977级力学）

从十余年前起，常常会有同事朋友熟人向我问起，“照片上那个人很像你！”“照片上那个人是不是你？”所谓照片（见P147），指的是那张题为《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的照片，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标志性“经典”，曾于2009年在报纸、期刊、网络、电视上有过热络出现。

2018年，又值“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那张“经典”又一次在公共媒体上露头，同样又是新一轮的关心询问。当年亲历者们，现大多已退休有了闲暇，在微信群里也有了不同热议，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对“前排那几位提前知道要拍照”做了或是或非的探讨。本人属于“前排那几位”之一，在当年出于小小虚荣心，对事情前后有着深刻印象，遂记叙一下当年“撞大运”进入那张照片的故事，与关心的人们分享。

照片的时间，应该是在我们进校后的一个月左右，从衣着上也看得出，大致是1978年3月底前后；地点是在“西阶”

（礼堂西侧阶梯教室），应该是“高等数学”课或者“普通物理”课，力学、力师、工物、物师、数师等1977级同学们一起在上大课。

在300座位的“西阶”上课，是几个系在一起“上大课”，印象最深的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这两门课，分别由极富盛名的谭泽光、张三慧老师主讲。这得益于学校对1977级的极度重视，挑选了最优秀的教师。这两位老师正当壮年，并都有着循循善诱、由浅入深、严谨诙谐、引人入胜的本事，且一开口那极富感染力的洪亮声音就能够响彻大教室的每个角落。可教室毕竟太大，坐在后排会影响听课效果，所以最早进到教室里的同学在选择座位时，一般都会从第二排开始。因为从第二排起才有桌子，既是离讲台较近听课效果较佳的位置，又是有长条课桌方便做笔记的位置。第一排虽离讲台更近一点，但没有桌子，只能是在膝盖上摊开笔记本做笔记，总有点别别扭扭的。所以，第一排就成为了大家不太情愿选择的座位，往往

成了最后进到教室者不得不落座的位子。

在那张“经典”照片上，幸运坐在了第一排的6张脸依次为王均、张中民、邓勇、周叮、李赛牧（物师七班）、刘玉民。其中，我们固七班有5位，并且属于1号楼135宿舍的就有4人。事后的复盘回忆，是因为那天早上135宿舍全体成员“集体睡过头了”，包括老大哥刘玉民。在我们135宿舍的这4名成员中，只有刘玉民被同学们尊称为“老刘”，他时年30岁，且是两个娃儿的爹；余下的周叮21岁、邓勇20岁、张中民16岁，当然也就统统直呼其名。这位颇受全班尊重的“老刘”老大哥同学，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励志故事，不仅是我们勤奋学习、简朴生活的活标杆，又是135宿舍“卧谈会”的主讲人；而且，他的作息习惯从不与我们几个为伍，必须熄灯就睡，晨曦则起，还极为注重保养肠胃而必吃早餐。当然，那时候的我们，也全都称得上是刻苦学习的模范学生，标准的“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而早晨7:30就要开始上第一堂课，这时间在北京冬季也就天刚蒙蒙亮，确实是早了点，往往我们来不及了就会把食堂早餐这环节给省了，绝不能上课迟到。唯有老刘不一样，总是能够钟表一般的精准，把个人作息时间安排得从从容容，绝不会放弃早餐。

可就在那天早晨，老刘竟也是一样地睡过了头；也许我们能够坐在“经典”照片头排，该是由他罕见地睡过了头而带来的幸运。那天早晨的135宿舍，定是一片酣睡，记不清是谁突然吼了一声：“坏了，

要迟到了！”哥几个急忙起床，旋即操起书包就一起匆匆忙忙赶到了“西阶”。踩着点进了教室，只见黑压压一大片脑袋瓜已经乌泱泱占满了教室，也就远处最后几排座位还零散有空；哥几个见状，略不情愿，但也顺势就跟着稍早一步且眼神不好而喜坐前排的王均班长，落座在了第一排。就这样，幸运之神眷顾了我们这几个睡过了头、差点就迟到了的似乎仍还迷迷瞪瞪的傻瓜们。

上课期间，几无虚席的300座位阶梯教室里，所有同学都专注于讲台上老师的流畅板书和潇洒讲解，忽见与讲台同侧一旁的教室门被缓缓推开了，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一位中年女子，手里拿着一只相机，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相机，一副飒爽干练的样子。也许是见到了大家齐刷刷投去的目光，她随即轻慢而小幅地摆手示意，好像在说自己“只是个旁观者”，然后驻足在



全班同学入学后的第一张合影，摄于颐和园。从左至右，第一排：马若涓、钮麟、袁珩、王耘、朱一无、宋国华老师、秦少文、肖颖；第二排：潘立功、贾海东、王丹洪、周叮、张丕辛、王卫东、盛善定、刘玉民；第三排：李平、肖世忠、章柏钢、冯雨生、周小平、张伟、王均、谭明一；第四排：黄民丰、樊辉、邓勇、邓小铁、李彦、林建华、但威、安永民、张中民、虞源

□ 荷花池

门旁，站着不动了。自从进了清华之后，同学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场合举着相机的记者，甚至图书馆大阅览室一两百人悄无声息埋头自习时，各种观摩队伍或进出或拍照，大家也会无动于衷。何况这课堂上，老师正讲得眉飞色舞，大家也正听得聚精会神，谁会一直在意这位女记者的“旁观”。

时隔不久，也许过了一月或者更久，我听到同班景群智同学不经意说起：“你们宿舍上了《解放军画报》。”这位景群智老兄，是我们班当时为数不多“也闻窗外事”的主儿，经常有闲暇会翻翻报刊杂志，传播点天下发生的大小事。听他一说，我饶有兴致地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翻查了近几期《解放军画报》，找到了这张照片。后来，出于小小虚荣心，我还悄悄关注到《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刊物也对这张照片有了刊登。再后来，在我妈的来信中，讲起了贴在家乡小城街边宣传栏的《新闻图片》中有一张我们上课的照片，照片里我的衣服比起左右两边同学都显单薄，不知北京到底会有多冷，问我要不要添一件小棉袄。

这张照片，虽在40余年前就有过不少传播，但大家都想不到它将要成为一张流传几十年的标志性“经典”。在当时，得知了有这张照片之后，我们135宿舍全体成员肯定都对“露了个脸”暗自有过窃喜，记得有过一次复盘回忆的小小议论，并对“集体睡过了头”达成共识。补一句，我们135宿舍当时是5名同学，还有一位黄常山同学，因酷爱建筑专业，进校后就获特批而直接跟着建筑系上课去了，所以缺席了这次“西阶”的幸运。再后来，哥几个就都绝口不再提起这张照片了，也

许故作淡定，也许都想要做出一副成熟稳重的样子。

在我们固七班里，有校队的三级跳健将林建华、百米健将贾海东，都会在运动场上引发一波波欢呼热浪；还有，每到下午4:30响彻全校的那“同学们，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到操场上去、到校园里来……”的昂扬女声，就是我们班朱一无同学的录音；还有，把越剧《梁祝》唱得余音缭绕的肖世忠；入学前就是省少年围棋赛冠军的周小平，直接跨过了高中而考进清华；还有“高等数学”考试免修的邓小铁；更还有成绩顶呱呱的谭明一同学，他每个期末都可能会放上几颗“卫星”（考100分）……加之那个时代提倡戒骄戒躁，谁的潜意识里都会规避“露了个脸”就得意的嫌疑。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前不久，我们固七班微信群里又议论起这张照片，袁珩同学“精辟”地作了评论总结——“就这样，我们固七班的这几位懒觉大神，很幸运地被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相框中，成为中国那一段不朽历史和我们青春的见证人。这个故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想要出名，最重要的不是努力奋斗，而是会睡懒觉和运气！”当



如今的“西阶”教室

然要辩解一下，我们这几位幸运者还真不是“懒觉大神”，都是严格“三点一线”刻苦认真的普通一分子，所以，我们只承认是运气。当然也必须承认，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必然的是，全国77级大学生的27万群体、母校前辈们赢得的清华声誉、全校同届1017名的同学们，必然要托起几张青春脸庞，永远定格在某个经典的历史相框里；偶然的是，我们135宿舍的难得一次“集体睡过了头”，却偶然地成就了那份幸运，不服不行。

2019年底，在北京展览馆“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的展厅里，我又看见了这张“经典”，就用手机来了个“穿越”合影。驻足在这张熟悉的经典照片前，不仅有着幸运于身在其中的感受，更是有着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的感慨。恢复高考的1977级，是整整10年求知若渴群体中的幸运者；而照片上的这些青春面庞，又幸运地成为全国1977级27万人的缩影，还幸运地见证了40多年来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强盛的全过程，并幸运地参与其中，或多或少、尽心尽力地做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应有贡献。

如今，照片上这5位“大神”早就各奔东西，大多也已当了爷爷或外公。王均，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水科院工作十几年，目前旅居日本；张中民，毕业后在山东的石油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任教十余年，目前旅居美国；我，母校学习工作了17年之后调出，在团中央工作5年、中科院工作18年，目前已退休；周叮，毕业后一直在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当教师，目前是二级教授，现仍在为课题和研究整天忙碌，还不歇息；老大哥刘玉



“穿越”照片：邓勇参观国庆70周年成就展

民，毕业后到了机械工业部郑州机械研究所当工程师，单位改制时他与领导进行了一场甚至“惊动中央”的卓绝斗争，争取和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正当权益，然后就凭着清华看家本领，在市场经济的各种力学科技需求中“月进斗金”，目前七十出头还在“老骥伏枥”。

一年多前，陪同久未来京的马若涓同学重游清华园。我俩从清华学堂、同方部、老力学系馆、新水利馆、大礼堂，一路来到了西阶。从外貌上看，仍旧还是那个“西阶”的轮廓，但其新门脸却变得典雅洋气了很多。推开西阶大门往里探头望去，也不再是那一眼可见的300个座位的一大片阶梯桌椅，里面已有了全新格局的功能分区。写此文时，颇不甘心，就跟母校一位现任领导电话问起，答复是“西阶在2007年被重建，改造后的二楼是200座位大教室，一楼是两个会议室”。听毕，感慨清华对传统风貌“修旧翻新”的本身，也留下了念头——再有机会回母校，一定要进到“西阶”里看看，当年那几百座位大阶梯大空间的壮观印象，如今是否还能找到一点点的旧时余韵？

2020年10月

● 新书推荐

边走边画“游世界”

○吴冠英（1978级美院）

近日，汇集我300多幅速写和心得的《游画世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年来，本是无目的的日常速写，却“无心插柳”地成了这本书。在编选过程中，重新翻阅画自上世纪90年代直至现在的近千幅速写，每一幅都仿如一个定格画面，瞬间勾起那些陈旧的记忆。1992年9月11日八月十五中秋节画于中山公园、1994年9月21日画于北海公园、1992年夏日画于故宫养性门、1991年9月23日于重庆千厮门码头、1994年9月22日永安里农贸市场……看着每幅画面边角上留签的日期，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一幕幕久远却依然清晰的带学生外出写生的情景。

还记得，那时的重庆江边上很多木结构的吊脚楼，层层叠叠沿着坡势而建。房子的夹缝中会有一道窄窄的石阶蜿蜒地伸向高处。我们坐在那里画速写，耳边听到的是收废品的吆喝声，看到的是挑担子的“棒棒”们爬石阶的身影，以及家庭主妇在屋外生炉子做饭、孩子围在边上玩耍

嬉闹……那种形、声、闻、味、触五感都被调动起来的感受，自然而不觉地融入笔下的线条中。现在回看，仍能感



吴冠英教授

受到画面氤氲鲜活的气息。我特别喜欢画这种充满人间味道的人、景、物。

还有1987年我曾参加“中央讲师团”到广西百色右江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支教，那时也常常带学生到百色城的老街上画速写。直到2018年偶然的一次出差，得以重游阔别了31年的百色，我还特意抽空来到记忆中的“东风菜市场”。我刚走进菜市场，顷刻间便闻见叫卖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各种蔬菜、鲜果、肉蛋的味道，大爷、大妈、小媳妇、大姑娘、幼童、老妪，送货的、买菜的、卖菜的，各式人等在市场里川流不息，喧闹不已。我情不自禁地站在这热闹非凡的一隅，画了两幅速写。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乘游轮旅行。有一天，我习惯地带着速写本来到休闲区小坐，不经意间看到坐在对面不远处的一对老人，俩人并不说话，可两只手一直握在一起，静静地。我画下了这个令人动容的



情景。

曾有人形容：“旅行，就是去一处对你陌生、而对那里的人是熟悉的地方。”其实就是寻找一段从身至心的一种短暂的体验。走马观花，异域的一切都会令每位旅行者产生新奇感。边走边看，置身于“陌生”的景象中，是最易“刺激”创作的动力。

三年前的暑假，我和家人到法国和意大利自驾旅行。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特意来到闻名遐迩的“梵·高咖啡馆”，它是因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夜间露天咖啡馆》而得名。我们在那里品尝了咖啡，我用咖啡馆里特有的黄色餐巾纸画了幅即景速写，作为特别的纪念。而在意大利威尼斯，则有着数不清的形态各异的桥，这些桥将这座古老的水城连在一起。“贡多拉”小艇载着游客在窄窄的水道中穿行，水边布满了餐厅和各式店铺，在任何一座桥上或水边放眼四周，均是可以入画的风景。当置身于这特定的环境中，笔下的画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这次旅程，我们还游历了法国东南部的古城阿维尼翁（Avignon），著名画家毕加索于1907年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品《阿维尼翁的少女》（又称《亚威农少女》）。由于地处普罗旺斯地区，薰衣草的紫色点缀着这座古老的小城，薰衣草之味弥漫在城中的街道和小巷，透着古朴、浪漫的情调。我在线描的速写画面中特意用紫色渲染了街道边一个卖薰衣草纪念品的小摊，强调了色彩的记忆。

二十多天里，我们穿行于罗马、佛罗伦萨、卢卡、比萨、锡耶纳、威尼斯、西西里、摩纳哥、阿维尼翁、阿尔、马赛……见缝插针地画了三十多幅速写。回



东风菜市场 吴冠英 / 绘

看时，如图像日记般令人久久回味。

在我常用的小书包里，会常放着一个速写本和几支画笔，无论是出门散步还是远足旅行，都会随身带着，偶尔坐下，就本子上画下眼前的景、物、人。即时即地，心有所感，情有所触，笔随心走，不刻意地去东寻西找。以平常心看平常物，所记录下来的平常画面，或许最易触动平常观画者之心。许多年来，我养成了画速写的习惯，它渐已融入我的日常生活，随着匆匆过去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已画满了三十多个速写本。画速写颇似“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一种从艺习武的修行，以使眼、手、心成为一体，在艺术创作中保持敏锐的感悟和灵动的笔触。

（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9月27日）

吴冠英，1955年出生，广东中山人。1982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装潢系书籍设计专业。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之一，2008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吉祥物“福牛乐乐”设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设计师。他也是本刊2020年各期封面绘画的创作者。

□ 荷花池

● 诗词书画选登

沁园春·续谱华章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新声韵）

○徐友春（1970 届精仪）

沐浴朝阳，绽放荆花，竞艳吐芳。聘名教梁柱，辛勤培育，求知严谨，境界飞扬。行胜空谈，报国奉献，学品皆优奔四方。贤才汇，看志存高远，圆梦前航。

兴邦科教图强。立鸿志，泱泱学府昌。造一星两弹，元勋济济，跻身前列，竭力担当。争创一流，弘扬传统，伟绩丰功事业良。雄心聚，把成规摒弃，再铸辉煌。

贺清华大学 110 周年华诞

○傅水根（1970 届动农）

休言苗幼小，终长树参天。
胸有凌云志，长书报国篇。
奔腾大江水，雄伟泰山巅。
实现中华梦，儿女共肩担。

清华 110 周年校庆三首

○王东光（1970 届工物）

其一

斗转星移四万天，黉门毓秀展新颜。
一流大学一流景，水木清华总拔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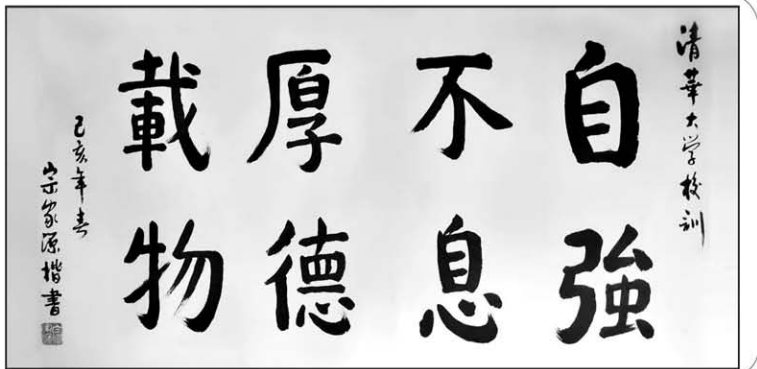
其二

校友名签别在胸，春风满面兴冲冲。
华园变化知多少，迷路不时光老翁。

其三

四月紫荆花盛开，母亲期盼子归来。
清华问鼎儿争气，回报春晖献奖牌。

楷书 母校校训
○宗家源（一九五四届水利）



水调歌头·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庆

○王伯雄（1970届精仪）

立校缘庚子，多难志兴邦。中西合璧，大师荟萃共贤良。莹雪西南坚毅，不辍弦歌高唱，热血救危亡。戮力驱倭寇，奏凯复还乡。

沐朝阳，重德载，更自强。创新求实，文理融汇谱华章。政界菁英领路，两弹一星捷报，桃李万千芳。百十春秋路，无尚颂荣光。

● 珍藏之窗

联大同学旧照

○彭珮云（1949届社会）珍藏



1945年秋，彭珮云（前排右2）与西南联大同学尚嘉齐、程法毅、周幼真、吴达志等在学校门口合影



1945年秋，彭珮云（后排右2）与西南联大同学陈鲁生、谢汉生等合影



1945年11月，彭珮云（前排敬礼者）与西南联大同学田振邦、袁载军、李传信、张魁堂等一起郊游



孙蔼芬、程法毅合影

一九四七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彭珮云（左一）与联大同学潘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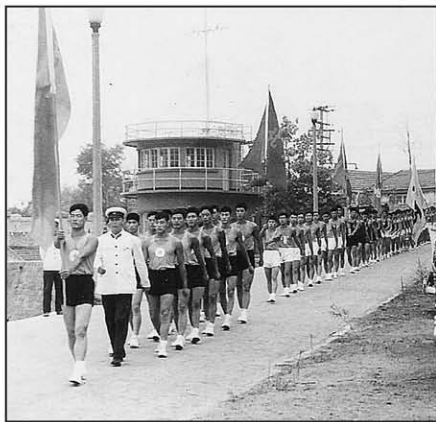
清华航海多项运动队老照片

○毛乐山（1970届精仪）珍藏

清华大学航海多项运动队成立于1958年，曾代表北京市参加过全国比赛，获得过第九名的成绩。此项运动严格讲属于军事体育范畴。其内容实用又丰富多彩，要体力，要技巧，更要精诚合作。此处展示几张当年的黑白老照片，以铭记曾经的青春年华。



昆明湖上荡桨



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锦标赛



使帆训练



旗语通讯



当年亲手修建的静水荡桨台，位置在今马约翰塑像处

《清华校友通讯》基金捐赠录

(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单位:元)

安徽	80	吴莹清	50	周 贺															
北京																			
校内单位	6000	学生部	6940	研工部															
1600 高云生	1000 张光华	周 石	600 唐怀印	500 谢勤龙	400														
张玉琴 300	高力生、田其玉	200 曹永才	陈徐梅	邓元凯	杜立刚	葛书芳													
关 博 何 兵	张久荣 蒋作舟、马华陵	居余马	孔 沛	李凤江	李 伟	李章亚													
刘环元 刘 融	栾兆玉 梁锦祓	武建伟	马青柯	潘占军	乔 木	沈乐年	宋耕福												
唐虎元 陶家东	王建安 王秀山	吴鹤华	刘裕品	郑人杰	夏武祥	谢宏毅	杨传利												
姚云飞 俞静澄	张崇实 张文强	张泽生	郭元静	施正宁	150 苏云清														
100 程鸿时	郭 杰	80 曾 铮	陈 爽	董延平	韩 江	黄金生	李文喆												
李金洲 蒋孝煜	庞 朋 史 杨	李毅军	刘秀文	刘珠峰	罗京全	马甄卫	彭晓强												
山秀明 苏劲松	王 浩 王可菊	管立虹	刘儒义	杨自觉	夏柏秋	王 晔	魏赠应												
吴景龙 杨建伟	杨相声 岳本锋	张兴胜	赵 佳	赵元康	周 繁	祝守宇	陈维嘉												
袁 彦 常俊英	南和礼																		
50 蔡乾煌	曾美玉	孔凡文	尚 焱	徐 臻	虞锦晖	周扬胜、宋文革	刘 豪												
福建																			
1000 陈松青	200 陈世钦	程书强	王伟明	张应新															
80 何 敏	陈民强	廖律超																	
甘肃	200 巨宝庆	100 孙勋先	80 魏仲生																
广东																			
2020 凌桂生	250 刘玉堂	200 安仲岩	蔡畅奇	陈岸明	傅 光	黄耀寰													
黎贵犹 连果义	李玉林 王文权	袁德赞	李春树	莫国兴	林万里	麦继谦	庄宗穆												
肖 斌 荆高飞	100 张木欣	黄冠雄	80 丁华丽	胡家华	李 军	高国龙													
李 纲 林 龙	刘恒宇 马俊杰	文 侨	袁修侠	梁荣林	胜永攀	谢词龙	李 阳												
王雯莹 何 浩	50 张鸿庆、王 明	周有训																	
广西	500 吴彭年	280 刘阳乾	200 陈丽生	周水祥	谢荣福														
100 裴文珑																			
贵州	200 赖庆文	杨兴华	海南	80 田国强															
河北	200 杨焕峰	100 田雪棠	80 李 埏	赵利民	50 蔡丙辰														
	陈树清 程占威	耿 云 潘家华、陈冠卿	孙小平	王贺敏	赵文鸾														

河南															
	6000	河南校友会	200	江长荫	林家和	肖广为	100	刘珉	80	李方					
湖北	200	王才顺		李乾南	80	石一辉		史爱章		杨阳		张若然			
湖南	200	宋友海		翁柯		肖明光		周志刚		朱渥恩		余家骏			
	80	江欣		叶益聪											
吉林	100	韩英淳		80		黄明									
江苏															
	1400	谢庭霄	200	曹森尧		陈洁		顾战生		贺光涛		黄宏庆	李明源	李仲平	
武效萱		张其威		赵甦		石志扬		宋炳炎		徐爱成		严国绪	杨泉生	姚德禾	叶红耘
	160	朱静		牛耘	80	高洁		胡振亚		李国华		彭晓星	钱炜坤	王孟和	
吴彤		张俭		周煜中		姚国樑		吴锦明	50	费登科		张永			
江西	200	陈春明		80		周捷		刘德速							
辽宁	280	刁廷礼		200		杨越宁		姚致华	100	刘志会	80	崔高峰			
		石奇忠													
内蒙古	100	丁昕		80		王维珍		周骥							
山东	200	傅良友		王拱奎	80	田伟									
陕西	200	高旭东		耿宝林		贺洪义		汤瑾	100	马学尼	50	聂尔瞻			
上海	1000	蒲小平		500		邵正德		王九松	200	胡宁		胡嗣云	蓝荣香		
		林国经		刘维烈		刘勇军		沈耀		宋建锋		杨胤轩	俞保安	张未名	章镛初
		周在熹		任增义	100	傅春常		邵克仁		郑华山	80	彭瑜	王尧凤		
		王晓睿		王延岭		杨道刚		高猛	50	曾庆贵		刘克立	吴迺申	宋兆华	
四川	200	陈炯		邓之兵		段隆焰		孙鑫							
	80	陈让文		崔总合		林军		陈诚							
天津	360	董贻正		200		冯养浩		杨文坛	180	杨肇键	100	董孚允			
	50	季步鹏、		庞玉荣											
新疆	200	孙勤梧													
云南	80	黄鑫													
浙江	200	陈信汉		董景塘		肖珍平		朱国瑞		徐坚		朱正光			
	80	柴志峰		陈德奉		谢迪克									
重庆	350	苗思定		100		张尚元									



▲ 科技部、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共同举办长城工程科技会议首次特别会议



▲ 清华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研究院揭牌成立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20年会议举行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2020年会议举行



▲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成立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



▲ 清华冰球队获2020年全国大学生冰球锦标赛全国四强



▲ 第三届清华全球发展论坛举行

▶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SC20总冠军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暨2020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2020年12月19日，清华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暨2020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主楼举行。18位常务理事、42位理事出席会议。



▲会长邱勇讲话



▲副会长史宗恺主持会议



▲副会长袁弼出席会议



▲秘书长唐杰作工作报告



▲郭谦发言



▲杨士强发言



▲詹玉荣发言



▲理事会会议现场



▲常务理事会议现场



◀与会理事合影

校友联络



▲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学习日两周年暨2000届校友秩年论坛成功举办



▲ 清华校友总会院系分会、专委会2020年校友工作交流会举行



▲ 校友总会召开三创大赛秘书处工作会议



◀ 美院召开1960届毕业60周年、1970届毕业50周年校友座谈会

▶ 微纳电子系举办“2020清华校友集成电路论坛”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 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后排左3）出席广西选调生座谈会，为校友颁发启航奖



▲ 广州校友会喜迎2020届新校友



◀ 上海校友会汽车专业委员会&材料专业委员会2020年度论坛暨年会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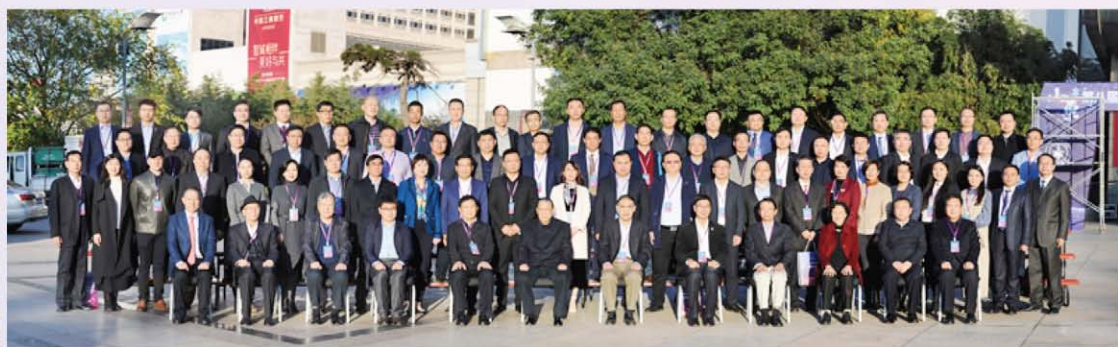
▶ 河南校友会庆祝母校109周年华诞并召开2020年理事会、迎新会



▲ “全球同跑接力，母校百十献礼” 汕头站启动



▲ 2020深圳清华校友迎新日成功举办



▲ 山东校友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



◀ 石家庄校友会举办迎新座谈会

▶ 第六届“苏沪杯”清华校友乒乓球比赛在江阴举行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纪念刘仙洲先生诞辰 130 周年

刘仙洲（1890—1975），生于河北完县。著名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从1932年起，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等。



▲ 1933年在清华任教时的刘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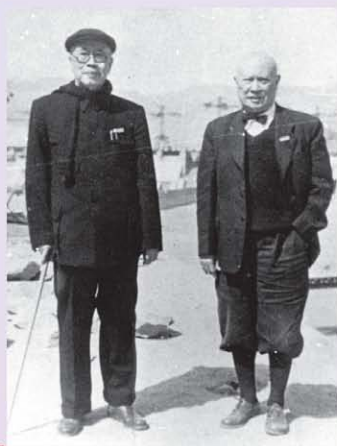
▲ 1936年，刘仙洲（前排右3）与清华机械系原动力组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 1943年，刘仙洲（前排右2）与西南联大机械系1943届师生合影



▲ 1952年，蒋南翔（右）、刘仙洲（左）和苏联专家组组长萨多维奇研究工作



◀ 1960年，刘仙洲（左）、马约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三门峡水利工程



▲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刘仙洲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聪明在于学习 天才由于积累

——纪念华罗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清华工作、生活了近30年，对清华充满深厚的感情。



▲ 1931年在清华



▲ 1936年华罗庚（左6）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图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清华学子在CAMBRIDGE的牌子下合影



▶ 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



▲ 1962年在颐和园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交流



▲ 1953年访问苏联与梁思成（左）、赵九章（右）合影



◀ 1982年4月，华罗庚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图为1984年4月华罗庚出席该院新院士典礼，用中文在院士名册上签名